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权力伙伴—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美国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导读

秉承调查记者最优良的传统，罗杰·莫里斯由表及里，深入探查美国政治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将那一次次标志着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崛起历程的道义妥协——列举出来。历经三年艰辛的调查和上百次采访，作为获奖的历史学家，作者准确地剥离和揭示出这对儿当代最有野心的政治家许多引人注目的、闻所未闻的细节和秘密。

从旧南方客栈里的暴民政治开始，《权力伙伴》一步步将读者引人那个导致并说明克林顿政权如何产生的，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裂痕的，有时还是见不得人的隐蔽的大背景中去。莫里斯将三个主题连缀在一起：克林顿夫妇政治目标的一致和生活中苦涩的相互关系；华盛顿两党制的混乱实质（最高当局的共谋文化如何击败变革思想）；最有的可讲的，是一位总统产生时发生在幕后的故事，这是一种贿金和偏袒畅行无碍的，有钱人的利益和被这种利益牵着鼻子走的政治家的假民主。

通过难以数计的丑闻——不论是见鬼不见人的契约、金钱往来或利害“交易”;“白水纷争;滥用手中权力掩盖自己的私情;拍成小电影的‘晚会”;文森特·福斯特的悲剧；以及金额达几十亿美元的阿肯色军火走私；与哥伦比亚卡特尔毒品走私集团牵连；中央情报局、两任共和党总统和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暨后任总统有组织的犯罪——莫里斯对权力攀援过程的回顾是对现任美国总统真实面目最公正、最全面、最无畏的揭露。

对一直有着致命弱点的美国政治体制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之后，《权力伙伴》对当权者组成的政府，最终也是对人民仍寄予厚望。作为一本第一夫妇的双人传记，它所涵括的几乎是当代美国政治的全部，这种政治性的叙述在传记文字中是史无前例的。

序　“美梦成真时”

他们耐心地、安静地等待着。在弗吉尼亚中部徐缓的河谷地带，高速公路旁散落着一座座小房子，有人就坐在自家的门廊上，还穿着睡袍，手中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飘进略带凉意的晨雾中。另有一些人则更靠近公路，他们手擎小国旗，为让孩子们看得更清楚，把他们举在自己的肩上。

这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国家。有些州镇和市县的选民是以压倒多数支持争取连任的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的。就像另有些地方有 20%的票投给了那位怪异的独立竞选人罗斯·佩罗一样。那些写在纸板甚至床单上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内容有请求、警告和祝福：“信守诺言”,“小企业和农业需要帮助”,“爱滋病病人不能再等待了”,“不要忘记波斯尼亚”,“我们就指望你啦”。在库尔佩珀岛上空，一架小型飞机拉着一幅最后通牒似的标语飞来飞去，上写：“紧缩开支，否则 97 将是罗斯的天下”。一位沿华盛顿 26 大道行进的妇女手持的标语牌上只有两个词：“慈悲，怜悯”。

此时此刻，选票和忠心似乎都无济于事了，当由公共汽车组成的宣传车队疾驶而过、那些门廊上和道路旁的人们摇旗欢呼的时候，也有人痛哭失声。“我们应当给这个人一个机会”，报道说，这是来自麦迪逊县一位中学教师的意见。“他将是一位全体人民的总统”，一位长期的共和党选民对身旁的陌生人说，好像这是一句让人安心的话。

阿肯色州的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正在去华盛顿赴任第 42 届合众国总统的路上。自他出生在阿肯色西南一个小镇上之后，这次他真地在自己的大客车上挂上了“希望 1 号”的驾驶执照。这位据说出手非常大方的年轻州长，号称来自新南方的新民主党人，是时隔 12 年后代表他的党人主白宫的人，46 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最年轻的国家首脑。

从他法学院毕业以来，在笔直的 21 年政治生涯里，他从来就不是单枪匹马的。从一开始他身边就有那位现已做了他 18 年妻子的女人。比新总统小一岁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也在这一刻使自己生动的过去焕发异彩。如果新总统有希望，那她也一样，这是英年志满的妇女平等的象征。至少此时此刻，在她丈夫就职典礼的前夕，她已准备好做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也是最重要的第一夫人。

l 月里的那使他俩进军华盛顿美梦成真的一大，不但充满戏剧性而且“极富象征意义”，1993 年的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如果回顾他们走向首都的道路的话，一直可以追溯到 1801 年第一任民主党人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克林顿的车厢里，总统专用的现代化保密通讯系统已安装就位，特制的电话使他可以方便地了解来自世界的每一端，如索马里或波斯尼亚的内部消息。但在车厢外，这支车队正在向历史、传统和正统打着招呼。这趟行程最原始的动力也许是来自 18 世纪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风光如画的种植园。

车队在狭窄的乡村公路上调头向北走了 120 英里，穿过弗吉尼亚起伏的乡野，拍内战题材影片的外景地，布兰迪车站，这里原是北方那些最惨烈的战事发生的地方，葛底斯堡，马纳萨斯，布尔溪，这里的土地都曾被鲜血浸透过。

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路旁那些自发聚拢来的人们。大客车过去之后，谷地上三五成群的人们才慢慢地。

不太情愿地各奔东西，汽车构成的长蛇阵远去了，有所期待的宁静再次降临，他们似乎还在盼望着什么。

＊＊＊

当天傍晚的时候，克林顿夫妇抵达林肯纪念堂，光临有电视转播的盛大庆典，现场鼓乐齐鸣，空中有飞行表演，地上有秉烛游行，更有名媛俊彦捧场助兴。摇滚明星们演唱了《我们是世界》，当选总统听得津津有味。随后他还操起自己喜爱的乐器，与十位萨克斯管演奏家一起合奏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伤心旅店》，这还只是经过周密安排的四天日程的头一天，这种好莱坞式的庆典要到就职仪式时才达到高潮。在一个适当的时刻，在市中心某个广场晚会现场，比尔·克林顿将在电影明星和歌唱家为他献歌时动情泪下，就在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她那首最热门的歌曲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念念有词。《哈泼斯》的主编写道：“电视台的摄影师适时地把镜头从史翠珊身上移向新总统沾满泪水的脸，发现他在像品尝什么美味似地在咀嚼着歌词。”

除了精心安排的表演，在远离这些临时搭起的舞台、闪光灯和话筒的弗吉尼亚，路旁也有类似自发活动。在风和日丽的周日下午，人们向映照着

纪念碑倒影的水池边聚拢，原本平整的公园土路在踩踏下成了稀泥塘，可人们还在不停地向表演场地涌来。尽管人多嘴杂，但人们心情好，彼此出奇地友善。正如现场一位观察员所描述的：“放眼望去，有黑面孔、黄面孔和白面孔，但没有推搡拥塞。”

“愤世疾俗的人是不会来捧这个场的”，一个连续参加了八次就职典礼的人在日记中写道：“但这并不妨碍仍有人美梦成真。”

在华盛顿的特定礼拜日里，人群中亮出自己民主党身份的多了些。但更多的是纯粹凑热闹的，只是觉得这种党派间的此盛彼衰自有其诱人之处罢了，在共和党总统把持朝政 12 年之后，许多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前几位总统的富有的支持者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权利及其内涵也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前只有有钱有势的才能参加就职典礼”，克林顿的一位支持者、有两个幼子的工人这样说。“今天我们也做一回这样的大人物。”

要说民主党自家真正的大人物都已到场那才是千真万确的。“这些天里，国家的心脏里处处可闻奉承之声”，一位记者这样写道。2oo 多家大公司以及几位著名的私人捐助者向这次好莱坞设计的庆典活动提供了将近 2000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另有 2500 万美元是以政府政策调拨的名义向公益事业认捐的。

就像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任期内的就职典礼期间一样，机场的柏油停机坪上，一排排地停放着公司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乔治敦那漂亮的狭窄砖石路也被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车拥塞着，许多来向新总统朝拜的人们随身都带着五光十色的珠宝和黑貂皮大衣。“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没什么两样”，一位社会版记者发表观感。“两党这时候在风格作派上已不分轩轾”。

甚至民主党突出的种族主义倾向也受到整体利益的制约，“那么多黑人雅皮士出现在克林顿——戈尔的欢庆盛会上就很惹人注目，这些人大多衣着华丽，开着加长的轿车”，说这话的是黑人专栏作家考特兰·米洛伊，他就是因为来自一个仍未摆脱贫困和歧视的社会群落而对眼前这种奢靡的大场面持排斥态度的。他接着说，“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并非布什独有。它由整个白人群体所共享。黑人如果认为民主党人在白宫，权力就会发生质变那就太蠢了。”

仅克林顿的车队到达的那个晚上就有四个不公开的宴会，每张门票 1500 美元，《华盛顿邮报》称这样的场所为“华盛顿的新王朝”。许多受到邀请的客人都曾向克林顿捐过大小数目不等的款项，有的甚至高达百万——这其中也不乏曾向共和党捐过款的人。

“这些人都为比尔·克林顿的当选做出过很大努力，我们来此就是为了彼此打个招呼”，一位民主党政治家解释说。“这些人——大型法律事务所、各种学会社团、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才是这里永久不变的统治阶级”，华盛顿一家名为公众诚信中心的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刘易斯如是说。“他们都是脚踏两只船的家伙……这会儿能捐出点钱来，那是因为他们日后会得到十倍百倍的回报。”

尽管这样的场合警戒森严，记者是很难进入的，但某个与会者会复述当选总统到场后说过的话，这种有他的富有的赞助人参加的宴会，他至少要亲临其中的一个。“你们是我的朋友”，克林顿一再向他们保证，“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在他做各地党组织的巡回访问时，各处的会场外都会有纠察队员，而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属于一个叫做民主党助选阵营的集团，他们大

多聚居在新英格兰的约克夏山一带。他们的发言人说，“白宫的脸面换了，但幕后操纵的人没有变”。

克林顿的阵营一直是由代表并服务于执政与整体利益的人通过旧有的权力淫媒来控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人选新内阁的竞选总管米基·坎特和民主党主席罗恩·布朗，作为由分布于华盛顿K形街上的有影响的法律事务所和强大压力集团代表的院外活动家中的成员，可谓是既有官运又发横财。这些得分领先的人构成新的领导层。

从事政治活动和人主官僚体制，在这两者之间的转变当中，像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直率的政策专家，也不免受到统治者的等级特权的伤害，而他的忠告在克林顿从得到提名到当选的漫长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受薪于同一利益集团，但他有时会突然点破华盛顿政权在什么地方撒了谎。在就职典礼前夜，在没能为年轻的竞选工作者拿到他要求的 50 张音乐会票时，卡维尔大发其火。“我是给年轻人要的”，他对记者说，“我要票时他们回答说‘那好吧，你可以拿6张’，我就知道他们是要向K形街令人恶心的基金会进贡。”

正是在卡维尔的指点下，克林顿赢得了绝大多数 30 岁以下的选民——这是一个也曾支持过里根和布什的年龄段——以及传统的民主党人中的 60%。而当选总统自己所属的这个年龄段的 7000 多万选民却给了罗斯·佩罗强有力的支持，佩罗享有的支持率与克林顿和布什几乎相当。最后，今天这位当选者在全国投票中只赢得了43%的选票。

在这三人的竞争中，佩罗拿去的19%主要是对布什不利。

比尔·克林顿是少数派总统。是求变本身赢得了62%的压倒多数。

在他的就职典礼前夕，民意测验表明，华盛顿的街头巷尾洋溢着信心和希望。大多数美国人都指望克林顿在经济、医疗、保健种族关系、环境保护、教育，尤其是在率领政府为国家需要而不是为即得利益的资产阶级和权势集团服务方面，能有“实实在在的改革”。《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共和党人对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在就职典礼前的那些欢庆之夜里，在豪华饭店或私人宴会上，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是一丁点儿也见不到的。

距白宫仅一箭之遥，八个设在一国之都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里已人满为患。在芒特弗农，为等一个过夜的床位，下午两点就排起了长队。离政府所在地只隔一个街区，拥挤的大众诊所一直开到深夜，以接待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来求医问药。

学生们被从附近的中学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拉来，去参加比尔·克林顿的庆典游行，可回去后他们面对的还是可怕的警告：不要沾走私来的毒品和武器，在美国首都相对肮脏和拥挤的那一部分里所存在的各种各样凶兆面前，独行者会畏葸不前。就在就职典礼举行的当天上午，市区里有 1／4 的学生都经过了金属探测器的检查。据统计，坐在书桌前、走在操场和门廊里的学生所受枪伤致死的可能性要大于内战时的军人。左轮手枪和自动武器现在已成为导致美国年轻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凶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开始也是这个国家许多孩子生命的结束。

前来参加就职典礼的人中有戈登·布什，东圣路易斯市的市长。他是自己掏腰包来的，因为市财政担负不起机票钱。东圣路易斯市的大部分市民都接受各种形式的援助，失业率达 50%，是流行病的重点防治区，债台高

筑，几乎没有税收来源，而谋杀率却是美国最高的。市长满怀希望，一心想为本市的学龄前儿童做点什么。“等孩子们 13 岁时就太迟了”，他说。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在想到自己的生活若有所失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城市败落的迹象——贫穷和暴力。而这种世纪末的状况，就像对新总统寄予的厚望一样，也是全国上下普遍存在的。在选举开始后的 11 周里，衰败的情况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仅这 77 大里，虽然报上说经济增长了 3%，商人的信心增强，股票和债券市场受到鼓舞，但大大小小的公司却先后宣布失去了 30 万个工作岗位，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不会失而复得的。撇开城市暴力的滋生蔓延不谈，致命的病菌已侵害到国家的精髓部分，影响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中产阶级，一度曾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可今天也吃到了苦头。

“我毫无疑问地是要有所区别的”，克林顿在 1 月 19 日国会图书馆的午餐会上对他的治国班子的同仁说过这样的话。他的真诚和专注早先曾明显地盖过了公众对他个性所持的怀疑。投他票的选民中有将近一半人在最后进行的民意测验中表示仍认定他是个“说谎的人”。“但起码他不是那个不曾允诺任何变革的布什”，分析家在解释公众为什么做出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选择时如是说。“在竞选接近尾声时，克林顿开始触及人民真正的疾苦以及他做出的拼争，这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位竞选助手说。“他们的痛苦成了他的痛苦，所以他也暂时参加到他们的斗争中去了。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证明他是个动真格的人。”现在，在他就要宣誓就职的前一大，人们对这位新总统独特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危险，仍有挥之不去的疑虑，“未能赢得真正的信任，太多的希望寄予他人，他是在这样的重负下开始干活儿的”，史蒂文·埃里克森为《洛杉矶时报》写道，“在这样一种不明朗的状态中，民族精神像空气中的一缕轻烟。”

沿着国会大厦和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有一个由布鲁克林的艺术家组织的“美国市政厅特展墙”，这是个由 8 根柱子支撑的结构，上面随处贴满过往行人粘上的小纸片，纸上都是写给新总统的话，称得上是“希望和绝望的大杂烩”。一时衣着华丽的夫妇闲逛至此，止步细读良久，面露愕色。男的对女的说，“我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这种人”。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光顾这里的那个下午，在保安人员清道时，她曾在一个贴有留言纸条的台面前略作逗留。一个带小孩的妇女与这位即将进入角色的第一夫人握手时轻声说道：“我们需要保健和教育，克林顿夫人。保健和教育。

别让你的丈夫被什么人糊弄了。”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只是向她展示一张四四方方的纸片，上面简要地写了两个字：“勇气。

☆☆☆

就职典礼这一天晴朗无云，一轮南方的冬日很快溶化了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一层薄霜。在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大厦，克林顿是以总统每天例行的情况通报会开始这一天的，这时是早晨 6 点 30 分。也就是在这个上午，布什的一位助手郑重其事地介绍那个可下达进行热核武器攻击命令的小匣子——“足球”的使用方法。那枚能够打开密码箱的电子卡片，从中午他宣读过誓词之后就将交到他的手上，直到他任期结束的最后一刻。这种对外政策的秘授过程也是这位新人的入门仪式的一部分。

这是个充满激动情绪的早晨。在富有历史意义的，曾经是逃奴地下交通网一站的非美会教堂参加早礼拜仪式，克林顿听布鲁克林协和浸礼会的加

德纳·泰勒牧师以所谓当代美国的“高洁与污秽”为题做的动人的布道。在背诵圣经时，当选总统在他的包厢座位上前后晃动着身体，轻轻擦去了脸上的泪水。当独唱者依次演唱传统的福音颂时，他再次落泪。比尔·克林顿是个“感情充沛的人”，他工作班子中的一名成员事后说，“也是最容易投入感情的人”。

教堂里还坐着一位与比尔·克林顿感同身受的人物，他们是一段折磨人的感情历程的共同经历者：弗吉尼亚·凯利，他的母亲，今天也在五月花饭店她的套房里早早起床，按照这个 45 分钟仪式的要求梳妆打扮，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抹上我的油彩”。她仍然把新总统看成是那个在酒精中毒的和脏话不离口的继父抚养下长大的孩子。“当他思考问题时”，她这样说她的比利，“他还是我的小儿子，只是头发变成灰白的了”。在华盛顿的地下，人们还在乘地铁向会场赶来，大家都是那样相敬如宾、不争不抢。此刻从弗吉尼亚驶向市区来的橘线列车上，年轻的姑娘们随着车厢轻微的摇摆柔声唱道：“昆巴亚，我的神，昆巴亚，有人在向你祈祷，神，昆巴亚。”挤挤挨挨站着的乘客们一言不发，起初有一阵尴尬，然后彼此相视一笑。

与此同时，一万多名特勤警务人员被从各处抽调来充实到华盛顿的大街小巷，迎候克林顿和涌来的人群。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楼顶上有高射炮和射手，地面上所有下水道的井盖都被封闭起来。整座为就职典礼而焕然一新的一国之都，今天也体验到了官方所谓“胡作非为和暴力犯罪增加”是怎样一种概念，手持武器的年轻人称霸一方，史密森学会的游览者遭到抢劫，另外几座国立博物馆也有游客受到袭击的情况。

典礼过程中没有出事，在一篇言词恳切但却未必多么出色的演说中——由一位老朋友起草，后经写作班子做最后润色加工，像其他重要讲话一样，经希拉里·克林顿过目——总统谈的是选他为白宫主人所带来的希望，“呼唤变革的美国人民今天欢庆一堂，你们可以异口同声地高声宣告”，他对着从装饰一新的国会大厦绵延至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华盛顿纪念碑的人海说道。“美国安全无恙”，他向人群做出保证，“这一点不会因为做于美国有益的事而有所改变”。

庆典之后，有人说它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时间包裹”，还有人说它是“个人与风云际会的天然契合”。克林顿对乔治·布什“半个世纪来对美国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而在这礼仪性的姿态后面，失败者本人是心怀怨怼的。布什在飞回休斯敦时招待了他的老朋友和早期的支持者而没有邀请那些惯于追踪落选总统踏上归程的记者们。这是“一个信号”，《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布什在为连任失败而向媒体泄愤。”

这时的克林顿已依照惯例来到国会所在地，风光地接受国会领导人的宴请，一位英国记者在简要地与别人交换了一下看法后写下了自己的发现，新总统焕发着“审慎的，也许是故作姿态的，使人甫信又疑的魅力”。而当参议员和众议员开始喋喋不休时，克林顿立刻又缩进了他的面具里，变得心事重重，眉头紧皱，这些表情虽然是稍纵即逝，但却难逃观察家的眼睛，暴露了他“稚嫩和易受惊吓的一面”。

他毕竟才当上美国总统一个小时。从下午到晚上，媒体已多有老百姓为他们国家的新领导人秉烛祈祷的报道。“我们现在对克林顿的感情投入已到了吓人的程度”，一位记者写道。另有一位作家称这是“这个国家最冒险

的举动”。

当晚有十几个官方和非官方的庆祝舞会，受到邀请的有富甲一方的赞助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动物权利维护人，男女同性恋者，甚至还有几百位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已被事先关照：穿上“最好的教堂服装”。克林顿总统仍然是依次造访各个舞会现场，吹奏他在阿肯色州温泉城上学时就已吹得很好的萨克斯乐曲，和朋友们拥抱问好，用那种“非常见效的和蔼可亲”招呼人群中的每一个人，他就像一位作家所描述的，是个“赢得好感的熟练工”。他现在的总统车队已增加到 16 辆车，配上了 22 名保镖，有特工的“战车”，上有特殊装备如便携式的穿甲武器，有一辆是专门载记者的，还有就是那位永远和足球铐在一起的军事副官了。

在这些宴会上，他们或迟或早总要演奏新的政府班子的主题：“要不断为明天考虑……昨天已经过去，昨天已经过去”。这曲目是在竞选之初由克林顿在小石城的助手偶然选中的，这首歌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的阿肯色舞会上演唱，没有比这更具有尖刻的讽刺意味了，70 多位总统的故乡人聚集在此，全是热心的“比尔的朋友”。他们为胜利欢欣跳跃，打心眼儿里为自己的州骄傲，因为以往更多地是受到外人的忽视和嘲弄。“现在谁都知道阿肯色在什么地方了”，一位家住帕拉古尔德的妇女说道。“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位来自小石城的妇女宣布。这里面贡献突出的人，或在华盛顿游说有功的人，都有可能接受总统委以的重任，他们分别欢聚在被阿肯色的一位记者称做“权贵人物”的上百个宴会上，其中包括在《华盛顿邮报》所有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宅第举办的晚会；由阿肯色的泰森食品公司提供鸡肉的蓝布牛仔舞会；在格兰德·海厄特，就是阿肯色的驾照可以当入场券并由总统那位欢蹦乱跳的同母异父弟弟罗杰·克林顿的乐队做政治性特色助演的地方举办的招待会。

在这样的夜晚里似乎不会有任何凶兆，但是在幸福的阿肯色确有几位随着新总统的就任而祸从天降的人——第一夫人的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和最亲密朋友：文森特·福斯特，她的另外两位法律事务合伙人韦布·哈贝尔和比尔·肯尼迪，小石城的商人、克林顿的财务顾问戴维·沃特金斯，白宫助手布鲁斯·林赛和帕齐·托马森。出现在华盛顿另外一些舞会和晚宴上的若干新政府成员也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陆续走下历史舞台或蒙羞遭贬——农业部长迈克·埃斯皮，财政部副部长、后任部长的罗杰·奥尔特曼及其几位助手，白宫法律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将是同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之所以受到追究并非因为新政府班子开始工作后发生的事，而是要追溯到阿肯色过去的十年甚至更远。他们因此而同病相怜。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命运将由这些往事决定。

☆☆☆

新总统简短的就职演说中只一带而过地提到在一路招摇的赴任、庆祝活动和系列舞会之后等待他的工作。“要振兴美国就要赋予我们的民主以新的活力”，他在演说过半时说道。“这个美丽的首都，像所有文明降临后的首都一样”，他继续说道，“历来是进行谋划和算计的地方。权势人物施谋用智，无休止地为他人的上下进退操心，全没把用血汗辛劳换来我们今日之欢的那些人放在眼里……所以我要对大家说，让咱们完成彻底的政治改革，以使地位和特权再也不能压制人民的心声……让我们把这个首都交还给拥有它的人民吧。”当总统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落地时，全场猛然爆发出他宽选以来从

未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从举行仪式的平台一直传到林肯纪念堂的倒映池。

在仪式和庆祝活动中还有数不清的发言，但都对克林顿允承变革之言与具体兑现诺言之间的反差——或者说是背离——未置一词。为颂扬克林顿的洞察力，《纽约时报》对即将进入华盛顿的新主人发出忠告："那是个公众利益在贪欲的旋风中飘舞的地方。"他们提醒他别以为"仅仅确信会达到目标就能达到，要紧的是不要自以为是或急躁"。

打类似预防针的还有伦敦的《经济学家》，他们劝新总统小心自己所依靠的民主党人，"在你身后也许才是捅刀子的好位置……"那些用他们的钱或选票，或者兼掏钱、投票两任于一身的，把克林顿推上宝座的人们，今天己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权力的门槛前聚齐。甚至选自马阿·安杰洛的庆典诗——那是经由克林顿认可的——也预言："……面对你冥冥之中的命数／我的翼下已寻不到你的港湾／再没有地方给你躲藏。"

庆典结束。正像有的人回忆的，当人们逐渐散去时，围绕在倒映池周围的一些人还在唱国歌。沿着弗吉尼亚大道等车的人也是一样，他们等的车一辆辆开过去，可他们迟迟不愿登车离去，踏上归程。

但他们在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故事需要追溯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月光之夜，那是在密苏里一个遥远的角落，一段高速公路的转弯处……

一　赛克斯顿——"笑意写在脸上"

约翰·莱特和切斯特·罗德姆都是密苏里布特希尔人。

这是一个闷热的周末之夜，在他们向南边的赛克斯顿驶去时，先是听到了前方转弯处一辆加长的红褐色轿车后轮胎爆裂的声音，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那辆别克车在剧烈的摇摆中偏离老旧的 60 号高速道狭窄的路面，侧身滑行，冲过排水沟，伴着泥土与钢铁碰撞出的闷声，整个车身一翻再翻。

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最后，那辆车仰面朝天躺在了苜蓿地的边沿上，车内的收音机在突然降临的静寂中播放着乡村音乐，前灯的光柱则执拗地穿透黑暗射向前方。

莱特和罗德姆先靠向路边，然后又向那堆变了形的东西凑近。莱特事后对他妻子说，他们当时"吓得要命"，车门关着，驾驶位的车窗是摇下来的，奇怪的是车内空空。车后座上倒是有一箱波旁威士忌，但酒瓶都已破碎。他俩心惊胆战地在黑乎乎的地面和沟渠旁搜寻。又有一些驾车人在好奇心驱使下赶来，他们的手电光在暗夜中迅速移动着。

有人已赶去赛克斯顿向州警报案。

"最后我们不得不向沟渠里去寻找"，莱特回忆道。他们在三英尺深的臭水中用脚探着。这时有人听到路面上有某种声音，这人事后说那像是"瀑漏流水或迸溅的动静"，但不像是来自很近的地方。所以，他们继续又在播着音乐并射出幽光的仰躺着的车身周围去寻找。

这时已是 1946 年 5 月 17 日的午夜，美国即将迎来新的一天。三个月前，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那封夫于苏联人背信弃义的厄兆似的"长电"，这给那些容易认同苏联威胁论的华盛顿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月的时候，在赛克斯顿北去不远的密苏里的富尔顿，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中以类似的预言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举国上下，权势利益集团用金钱赞助了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在国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扣红帽子行动，这里面既包括塔夫托-哈特利法案（TaftHart1eVAct：该法案名曰“劳资关系法”，而实际上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比如说，该法规定：工会领导人必须进行宣誓，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人。——译注），也包括好莱坞十人案以及海斯案。5 月的这个周末本来也是全国范围铁路罢工的最后期限。引发劳工不满的部分原因可追溯到二战期间，这次酝酿中的罢工可以被看做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繁荣进行的一场争取经济民主的先头战。然而，没出几天，强硬的哈里·杜鲁门总统将铁路收归国有，使罢工不攻自破，他以本能好恶决定采取的这一历史行动大大加速了变革。一改迁就调和的一贯做法而使他和其他民主党人成了力量的象征，由此开始了美国的战后时期。

在密苏里东南靠近阿肯色边界的 60 号高速道旁，人们还在搜寻那不知名的男人。当他开着那辆闪亮的 1942 年产别克车疾驰而过时曾有人瞥了他一眼。“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另有人事后说，“像是行色匆匆……不认路的生人”。

☆☆☆

他的名字是威廉·杰弗逊·布莱思二世，以区别于与他同名同姓的父亲，威利，一个尖脸、瘦长的男人，在靠近田纳西边界的密西西比的蒂帕县娶了一个名叫卢的 13 岁女孩，然后乘大篷车穿越阿肯色，最后在炎热多风的北得克萨斯平原地带安定下来。9 个孩子中行四的 W．J．出生在那所用帆布和纸墙隔成四间的农舍里，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电，靠近红河的 40 英亩贫瘠棉田和稀疏的草场座落在谢尔曼和丹尼森两镇之间。

总是入不敷出的生活一直压迫着他们，痛苦的美国乡村又多了一家受苦的人。到 30 年代初，北得克萨斯衰败的农场已奄奄一息，威利也一样，结肠癌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W．J．作为长子仍留在家里，凌晨 3 点就得爬起来，为的是让农场再维持下去，每天放学后还要到附近的阿施伯恩牛奶公司干 8 小时活儿，以微薄的工资换些剩下的牛奶和黄油回家。他的姐妹回忆道，他的床是放在农舍的起居室里的，进出就在靠近门口的那一小块地方，可他仍然难得有时间在上面睡上一会儿。家里一直没钱给威利买药，住院治疗就更别提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的父亲就躺在农舍背阴的房间里，在一次次的病痛发作中颤抖呼喊。每当这时，W．J．就会把跛足的妹妹和其他人带出门外，然后再返身回去给病人服些吗啡，几分钟后出来告诉大家没事了，“他总是面带笑容”，兄弟姐妹回忆道，“不管他内心如何或遇到什么为难事，他总是不慌不忙”。

这样过了两年，威利也在受尽了痛苦后死去，这家人依靠从新政的农业规划中申请来的特别贷款勉强度日。1939 年夏，只分两次领到不足百元后银行通知：那笔贷款已不再归他们所亨。W．J．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年寡妇去谢文曼的一家饭店做清洁工——而她的孙子却在她这个年纪，即 47 年后成了美国总统，“布莱思家‘除了穷’没有任何过错”，一位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亲友追述道。“是赤贫”另一位补充道。

但 W．J．并非除了贫穷和痛苦之外别无所有，说到他也决不仅仅是一

个试图拯救农场。关心破败的家庭的年轻人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在这个多愁善感的男孩心里也有雄心大志。除了那个不谙世故的清纯男孩的形象外，还另有一个善于利用他人并从他人的不涪世故中渔利的男人形象在逐渐形成，“他压根没想过一辈子只当个农场主，更不想受穷受轻视，”这是他姐妹中的一个亲口说的，他们失去农场后举家迁往谢尔曼，挤在一间破烂的公寓里。18 岁的 W．J．很快就离家，开始了赴俄克拉荷马甚至更远的地方推销汽车零部件的生涯。

他上完八年级学业就从白石中学退学，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受过更高的教育。现在他自称比尔·布莱思，靠着伶牙俐齿的大生的聪明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这是他的职业恰应必备的素质——及无往不利的交际魅力，他在做业务性的拜访中发现，自己正实践着美国两个世纪来的传奇性生活方式，旅行者和巡回推销员，正如一位乡村幽默作家所言：“那是一种能在谈笑间宰你一刀的人。”

比尔·布莱思着实招人喜欢，那么真诚，那么平和，甚至平和到使他的推销事业——以致后来的受挫——不受重视的程度。人们也回忆了他与人接触的方式，总是要扶着或拍打着朋友或客户的后背说话，有时是用双手，尤其是在仔细听对方说话时就更是专心致志。“一个彬彬有礼，按良心办事的漂亮人”，这样的评价也听到过。而他的家人则说，“他是那样急于使人愉快。他推销的简直就是自己。”

对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成败就在自己的推销区上。走到哪里都是开辟业务的战场，顾客有好说话的也有难缠的，有的挥金如土，有的锱铢必较，竞争对手有诚实的也有搞歪门邪道的。正如人们部可以看到或想象的，某些行业是有自身不与外人道的内情的，从业者有自己的偏好，排他性和垄断性。行商很早就发现这行里见不得人的秘密，同行是冤家，彼此严守各自的秘密，把它们当成私人财产，既不让别人知道也不让别人利用。

推销员的固定客户往往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上的尽头，有它少受拘束的自由，也有残酷无情的冷漠。“什么时候当这些人也不报以微笑了，那就说明要天下大乱了”，这一行里的一位著名人物如是说。“你若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那你便死定了。”

成熟的推销员对这个敏感的容易砸锅的行当并不想进行什么变革或做出什么反潮流的挑战；他们只是游戏人生、浪迹江湖，至于推销手段没有什么软硬区别，有的只是巧拙之分。只有经过磨难才能有所收获。和油腔滑调的人一扯就是半天，对方是城里人你也得有说不完的话，对什么新鲜玩艺儿都得略知一二，让每个顾客都感觉到和你有共同语言，但决不能因有层次上的差距感而把对方吓跑。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比尔·布莱思在中西部和中南部各州为孟菲斯的 J．H．佩利乌设备公司推销汽车测试仪器，在各商家之间往返奔波，不管是大城小镇，大饭店或小旅馆，随时都得拖着自己全部的谋生家当。有的客户戏称这种拖车本身就是一台“前后平衡调节器”。有的客户认为，这是一种白领阶层的职业生活，开着公司的车，挣着大钱，“吃不完的美味佳肴”，有各种各样的人等着你去见识，其中一些还会成为朋友，尽管不会太亲密也不会太持久，其实，如果把窗户纸捅破的话，应该说，大部分行商都是孤独的，永远处于奔向下一站的状态，永远有跑不完的路。“这种生活没有实底”，阿瑟·米勒就是这样写他那位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把镙钉拧进镙帽这样的

事他都不会做，不会引章摘句地讲法论规，更不会给你开灵丹仙九。他就是那么个人，随时会皮鞋锃亮，一身蓝装地面带笑容出现在你的面前……这全看他的推销范围有多大。”

☆☆☆

也就是说，正像民间广泛流传的，也正像许多以推销员为题的荤素笑话说的那样，这里面还有女人——尤其是对比尔·布莱思而言。

他父亲死后不到一年，W．J．多少有点偷偷摸摸地驾车穿过州界去俄克拉荷马成了家，新娘是他在谢尔曼认识的 18 岁的阿黛尔·加什。不久他们就与另一个已婚的布莱思兄弟挤住在那间旧农舍的小房间里。“我从没有住得那么窄过”，她说。后来 W．J．又没能如约陪她去达拉斯探望她的姨妈。“我知道这事完了”，她说，“我把自己的衣服收拾了起来”。1936 年底，他们离婚了。其时，刚做新郎不久的比尔·布莱思还在路上奔波着，离婚后他还经常去找阿黛尔，转年春上，他做了阿黛尔第一个男婴、生于 1938 年 2 月的享利·利昂的父亲。随即阿黛尔和她妹妹一起，带着孩子迁往北加州，有一段时间与比尔彻底失去了联系。“他是个漂亮的美女般英俊的人”，阿黛尔曾对家人这么说过。“他是那么想让别人高兴。确实没人不喜欢他。”

40 年代初，在密苏里与内华达间的一间路边旅馆里，他偶遇 17 岁的黑发美女瓦内塔·亚历山大。她是附近一个属堪萨斯的小镇的流动唱诗班的成员。“那天我站在一台投市唱机边时，一个年轻人过来请我跳舞。但我没跳。可这时，那首叫《亚历山大格拉泰姆乐队》的舞曲响了起来。

他再次邀我。“这回你该愿意和我跳了吧？’我回答说，‘是的。’”。那时他是粗壮身材，不足 5 英尺 10 英寸，体重 l80 磅，蓝眼睛，黑褐色的头发直直地向后梳去。他在瓦内塔眼里是个“活娃娃……长得好看，衣着得体，聪明，乐天”。后来的一年里，他们经常在堪萨斯城的荷兰饭店见面，在比尔奔波于密苏里西部和堪萨斯时会留在城里度周末。“我们从这家饭店转到那家餐馆，然后再去舞厅”，她回忆道。“他很棒，慷慨，风趣，随遇而安。”

1940 年底，瓦内塔怀孕了，而比尔·布莱思则去了加州，也许是去探望阿黛尔和他的头生子。“他和孩子一起嬉戏，好像多爱他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本性一点没变”，有朋友这样说。没几天他就带着阿黛尔年轻漂亮的妹妹明妮·费伊私奔了。“W.J．娶费伊是因为他把另一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而又不想负责任，”亲友中有人这样解释。“他是个旅行推销员”，另有一种说法是，“而实际上他就是向女士们推销自己”。

比尔和明妮·费伊·加什于 1940 年 12 月 29 日结婚，地点在俄克拉荷马的杜兰。但这次婚姻的寿命不长。“费伊给加州的阿黛尔打电话，说自己一定要回家。”她的家人在回首这段往事时都提到了比尔·布莱思这位魅力无穷、情难自禁的勾引者。“但当事人还是大说他的好话，就像被勾引的不是自己。”

在亚历山大家人的压力下，他与明妮·费伊的婚姻于 1941 年 4 月在小石城被公告无效，不出一星期，堪萨斯城杰克逊县法庭裁定，他应娶瓦内塔为妻。他在婚礼举行前一刻才冒雨赶到现常八周后，也是在他出外奔波时，新婚妻子生下一个女婴。他们给她取名叫沙罗恩。“我很高兴你们母女平安”，他在拍给医院的电报中说。“孩子好吗……我永远爱你。爱你的 W．J．布莱思。”

那年的夏秋两季，他驾着蓝绿色别克车，带着瓦内塔和女儿，从密苏

里南部到俄克拉荷马旅行了六个月时间，喂奶和换尿布就在车后座上完成。有时他们会在路易斯安那的门罗小住一段，据瓦内塔回忆，他们暂时栖身的公寓只有“垃圾筒”那么大。不出半年，瓦内塔也走了，带着孩子回到堪萨斯城。“比尔一直耍弄我”，她说。“我知道他在每个夜总会里都有女人。”

接下来的一年中一直到战争开始，比尔·布莱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他是正赶上大批征兵的适龄青年，尽管他已有妻小。“战争快把我逼疯了”，他在 1942 年春写给瓦内塔的信中说。“向各位问好，替我吻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他经常有信来，既得操心工作又得考虑服兵役，海岸警卫队也在他考虑范围内。“我很高兴从这里（原文如此）给你”，他在 1943 年 1 月的信中说。“我还准备去加州。如果你那时乐意，那我们就一切从头开始，爱你，比尔。”

6 个月后，在一个闷热的夏夜，他和一位住在路易斯安那什里夫波特的女士一起外出时，这位女士突然犯病，他把她送到三州联合医院，在病人接受治疗的同时，一位漂亮动人的实习护士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来自阿肯色州南方一个小镇的弗吉尼亚·德尔·卡西迪。当时她不到 20 岁，大眼睛，丰满的红嘴唇，一头乌油油的长发，她那动不动就笑声成串的大性以及那旺盛得大地都盛不下的精力与她的年龄和籍贯都不相称。虽然她当时已与高中的情人订有婚约，但这并不妨碍她立刻被比尔·布莱思那惹人注目的外表所吸引。推销员本已打算离开医院了，可他犹豫片刻还是返身回去，一直走到年轻的护士面前，问起她戴的戒指。她毫不犹豫就回答说那毫无意义，自己也被这回答吓了一跳。

当晚他们一起出去喝了冷饮后吻别。他在什里夫波特租了一间公寓，并且找了一份卖汽车零件的工作，一次她的密友打电话来找她，比尔随口说道：“是的，她就躺在我身边。”

速战速决，弗吉尼亚用一句西部广为流传的民谣歌词形容求爱的过程。不久，她开始就结婚的事情向他施压。他还没告诉她——也许压根没想告诉她——他已有妻室儿女。

比尔·布莱思并没有诚实地对待这次婚姻，弗吉尼亚又是不能拒绝的。就在这之前不久他还匆匆写信给瓦内塔，说他“在路易斯安那认识了一个护士，想要娶她”。堪萨斯城那位年轻的母亲表示同意，并在当年夏天就签了文件。

瓦内塔后来表示过，“他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爱过的。”1944 年 4 月 13 日，密苏里法院判离婚成立，要求缺席的威廉·比尔·布莱思每月付孩子抚养费 42 美元。即便如此也已太迟。1943 年 9 月 3 日，在他们短暂的夏日恋情之后，比尔·布莱思被特克萨卡纳的治安官判定为：与弗吉尼亚·卡西迪的事实婚姻中犯有重婚罪。

在正式娶弗吉尼亚只五周时他入了伍并被派往海外。

他在汽车维修营里当修理兵，先在北非服役，后来参加了解放罗马以及向阿尔诺河以北推进的血腥的意大利战役。战时，布莱思的一个侄女曾致信给他，要一片欧洲的树叶，好完成学校布置的功课。“对不起，树上没有树叶”，他回信说，“它们都被弹雨冲掉了”。事实上，他是把部队配发的香烟卖掉寄钱给弗吉尼亚的。她刚刚结束实习，回到阿肯色的霍普镇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回信说她记得“每一天”。

1945 年 11 月。作为上士修理兵，他带着嘉奖令退役。

回国后他去看望了瓦内塔和女儿，她还记得他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他甚至拄了一根拐杖，好像那就是他的军功章。

“这年轻人也算是大难不死 ”，家里一位老人这样说。

据弗吉尼亚回忆，比尔回来就想图清静，探望瓦内塔母女也只是出于怀旧，他们只在霍普镇小住数日就一起搬到了芝加哥。比尔在那里找了一份为伊利诺斯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做推销的工作。他打算在芝加哥永久定居下来并开辟自己的事业。弗吉尼亚几乎立刻就怀孕了。这段时间是战后的生育高峰，她的孕期恰与这个高峰期吻合。

那年冬天他还继续着每天驱车不下两百英里的生活，当他深夜回到洛普附近的公寓时，他那位阿肯色乡下来的妻子也正一脸惊异之色地从外面转悠回来，她是在对这座大湖之滨的繁华都市进行徒步踏勘。仿佛是他那痛苦过去的重复，弗吉尼亚 2 月里到得克萨斯去护理比尔濒死的母亲，但是，卢·布莱思还是在儿子赶回来之前死去了。

他们在森林公园附近买下一间小屋，就在芝加哥的西郊，交割手续办起来出乎预料地慢。她的预产期是 8 月，早上时不时要有一阵妊娠反应，所以她决定先回霍普镇的家，这样他俩都可以在小屋清理好之前喘口气。

他们为告别陋居与朋友们一起庆祝，就在那大夜里，夫妻俩曾在夜总会里一本正经地照了张像。后来他们在照片上签名分送亲友，“ 献上我们所有的爱，比尔和弗吉尼亚 ”。

她涂着黑唇膏，戴着假睫毛，身着紧身胸衣，抹着指甲油的手指上还夹着一颗香烟；而他则身着一身整齐的外套，口袋上插着带白点的手绢，一位面颊丰满的 28 岁的推销员，脸上浮现令人安心的笑容。

5 月中旬，森林公园的家已安排就绪，家具也搬了进去。比尔驾车在密苏里的夜路上飞奔就是去接她，还给岳父带了一箱威士忌，轮下的道路以前已走过无数次了。

☆☆☆

事故发生两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其实就在残骸几码远的浅水中头朝下趴着，这块被忽略的暗处正是有人隐约听到潺潺水声的地方。也许是被甩出车外的，也可能是爬出来的，他们找到他时，美男子比尔·布莱思的手还深深地插在草地里，显然他是想让自己站起来或再往前爬一爬。虽说身上多处受伤，可他头上却只有一小块青肿，显然他是溺毙在他最后栽进的沟渠中，那些沟渠正是由于施行新政的农业政策在沼泽地带特意开挖的，开挖它们正是为了向他上辈那样贫苦的得克萨斯农场主提供更多土地。

此处离阿肯色州界还有 40 英里，离霍普镇还有 300 英里。

弗吉尼亚的满腔热情和希望顷刻间变成一声悲鸣。家人和亲友、前妻和儿女都十分悲痛地为英年早逝的推销员举哀，也把种种不愉快的记忆一风吹荆 3 个月后，一个对这一切全无所知的小生命来到人间，正是这个继承了比尔·布莱思姓名的婴儿日后成为了美国总统。不但这许多他想不到，而且他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到。

但是，正是这一点非常重要，推销员之死决定了这个将来大有出息的男孩不是在芝加哥而是在阿肯色——受另一个父亲影响即在另一种师承中——长大直至成为总统。

到了 1993 年，亲友们还经常猜测如果推销员还活着会对眼下的局面怎么看，他们对比尔·布莱思的政治观点有着相互矛盾的记忆。有人认为他是

罗斯福的民主党人，也有人说他是商人，所以是共和党人，其实还是拿推销员的尺度衡量他最合适，他真正的政治，说到底，就是推销。

一位既参加过比尔·布莱思的葬礼也光临了他儿子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的亲戚说过："这次我是觉得好过一些。

但是，你要知道，对 w．J．你永远别想整明白。别想。"

二　霍普——"聪名伶俐的小孤儿"

他们把比尔·布莱思葬在了霍普镇的玫瑰山。在古老的橡树和浅紫色的木兰花掩映下的公墓算是小镇最古老的圣洁之地了。路对面不远就是弗吉尼亚父亲的杂货商店，再过去一些就是朱利亚·切斯特医院，1946 年夏末，弗吉尼亚将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孩子。

星移斗转，南方的小石城历来就是交通要冲。以路易斯安那的珀切斯为起点的西南边界线，就从离这里几英里远的地方穿过，快到得克萨斯州界的地方收住，这条线是最早的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分界，而华盛顿小道上的阿肯色不仅有为戴维·克罗克特和萨姆·休斯敦搭建的小屋，为詹姆斯·鲍伊锻造那柄名刀的铁匠铺（SanHonston（1793—1863），DavyCrockett（1780—1836），JamesBOwie（1796—1836%）都是美国历史上开发边疆、扩张领土的代表人物。——译注）而且还有墨西哥战争中美国入侵军的陆军司令部，一度虽是南部邦联的临时首都，更有北军为在战斗中抓获的拒降邦联军士兵设立的集中营。此地的政治和政治家，传奇色彩浓厚，争议颇多，但也严酷得出奇，从南北战争前的一无所知党到在阿肯色占主导地位的分离主义者，莫不如此。据当地文献记载，当亚伯拉罕·林肯 1860 年当选的消息传来时，当地人认为"那无异于敲响了我们的丧钟"。

战后不久国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从这条小道旁通过。那些在原居住地听任命运摆布的人们于战乱后在开罗／富尔顿和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铺轨的地方聚集起来，霍普就是在筑路过程中在地图中被命名的。这个地区的居民多是从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亚拉巴马有种无收的棉田区迁来的，作家曾称他们为"西行的南方人"。霍普和整个享普斯特德县也带上了永不消失的边境风味——不光是地上的铁兰和只有东南部广袤大地上才能见到的植被，还有那些被来访者注意到的"宽边牛仔帽和牧工靴，都在提醒我们，这里离一直绵延至格兰德河的大草原已经不远了。"

移民们在朝西南流向比尔·布莱思故乡谢尔曼的红河沿岸的森林和草场盆地定居下来。他们相对隔绝，彼此不相往来，好像是土生土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迁移的过程中，人们按照对新教的热情程度划分开来，常能见到温情脉脉或生离死别似的家庭聚散，人们只能勇敢地——或无可奈何地——面对在美国最贫穷的角落里遭遇的一切。

他们中只有少数是商人或有技能者，绝大部分是贫贱的农民、职员和其他卖苦力的，他们自己和后代很少逃脱穷命的，有的甚至变得更穷，那种由贫富划分的不平等似乎要成为阿肯色的百年忧患。

20 年代的一位推销商出于推广最新杂交西瓜种子的需要奖励当地广种水果的农民。

由于硬性在一般种子中搭配了将近 200 磅杂交种子，霍普很快成为阿肯色的西瓜之都。这种人工培育的西瓜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声誉，但宣传得很不够。到 1946 年，这些西瓜已成为本地经济的象征和希望，而当战时军用设施和试验场撤离后，霍普的 7500 居民发现自己仍生活在只生产些棉花和水果的穷乡僻壤，战前的地方工业少得可怜，一家砖厂，一家锯木场，一家家具和板箱厂，再就是一家专做手柄的作坊。

带嘲讽意味的是，霍普的黑人群体倒风光过一阵，这和整个密西西比三角洲和阿肯色其他地方的非洲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白人殖民者为开拓局面带来一些黑奴。而除了收益分成的耕作制，铁路也为黑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

早在本世纪初，霍普就已作为吸引这些打工者的磁石，很快，新的气象就出现了，黑人拥有的买卖以及非洲美国人开的店铺一般都开在东街区或者更远。就算是在大萧条时期，下城旧砖路上的往来车辆和采购者也比其他地方多些，黑人新贵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然而，到了 40 年代，随着铁路的衰落和大公司对本地企业的蚕食或兼并，这段好日子也就寿终正寝了。“那是个去而不返的霍普”，旧报纸上有过这样的说法。尽管黑色人种占全镇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大大高于全州的比例——到 1946 年，他们又退回到霍普东南部传统的贫民区里，白人又开始称那里为黑区。

☆☆☆

霍普一直从更小的城镇吸引外来人口，弗吉尼亚·卡西迪就出生在附近的另一个小镇鲍德考的埃比尼泽社区。

她的父母是第三代阿肯色人，像许多奋斗的移民家庭一样，往往是女人强悍，男人畏缩。她母亲，伊迪丝·格里沙姆·卡西迪，坚持把家搬到霍普来养育他们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女儿，在厨房的条案上坚持学习函授课程，成为一名实习护士。伊迪丝的丈夫埃尔德里奇什么活儿都干过，门把儿厂、小酒店，在从本地有钱人那里借到钱办起自己的杂货铺之前，还干过推销冰块儿的工作。各方面的说法都印证了这样一点，这对夫妇尽管干得辛苦，能挣到手的钱却不多。

在卡西迪的家里还有更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和气、随和、爱逗乐、爱讲故事的父亲，有时会因为无法满足她们母女的要求而黯然神伤。“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在一年的复活节前，那是因为他不能给我买节日穿的新衣”，她回忆道。而真正的烦恼是来自他们生活中的那个女人。用弗吉尼亚的话说，“她一天到晚都是气哼哼的”，而直接承受她的怨气的就是她的丈夫和女儿。

她是体态丰满、令人过目难忘的漂亮女人，一头浓密的卷发和一双的人的黑眼睛——“那是一双能把你看透甚至溶化的眼睛”，这也是她女儿的评价——伊迪丝·卡西迪的强悍也体现在很多不那么厚道的行为中。弗吉尼亚清晰地记得小时候频频遭受毒打的情景，比如那些专门用来当鞭子使的有树刺的树枝留在她小腿上的血刺。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对父亲的训斥。从中既能听出强烈的占有欲也能感到某种尖酸刻薄，伊迪丝指责她那对谁都很和气的丈夫勾搭每个买他冰的女人，而且她坚信这个家庭的贫困全是他的过错。在那彻夜不休的泄愤中，埃尔德里奇经常挨打，尽管他已谦恭到不能再谦恭的程度。在弗吉尼亚的印象中，这种充满暴力的日子大约持续了十年。而那个分享这份屈辱，黑夜中被隔壁的暴虐声吵得无法阖眼的女孩，只好以

她自己的方式承受这身心两疲的伤害。12 岁不到的她已经学会如何享用她“黑暗中的秘密”。

尽管如此，外表看起来弗吉尼亚是个快乐成长的少女，乐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浑身洋溢着炙人的欢乐。她就这样生活在阿肯色乡下，一直到 40 年代前，她的消遣方式都很普通，当然也有出格之处，比如对道德观的蔑视，性自由，性放纵，促成她我行我素的性格，在什里夫波特的那个夏夜强烈吸引比尔·布莱思的正是这种特质，“一个傲气的，自以为是的女人”，熟人中有的这么评价她。

1946 年，在丈夫暴亡、孩子还未出世时，弗吉尼亚己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留给父母去新奥尔良学习一年，以取得胜任报酬较高工作的资格，比如说麻醉护师。怀孕期间她就经常为如何照料孩子而苦恼，做出离家求学谋职的决定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尽管不时可以安排些你来我往的相互探望，但母子撕心裂肺的分别给幼小的生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母亲的哭声，有时她哭着跪在铁轨上”，他对发生在新奥尔良火车站上的那一幕还依稀记得，当时他只有两岁。“外祖母告诉我‘她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他的全名是威廉·杰弗逊·布莱思三世，可家里人都叫他比利。四岁以前他就住在赫维街上卡西迪家那座两层小楼里，南方的静夜中，纱门一响狗就叫，他的外祖母伊迪丝，他叫她“猫猫”，仍然在深夜里大声数落她丈夫，尽管再没有她女儿充分领教的那种残忍的体罚，但是，这位连目光都燃烧着愤怒的女人却是他童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

在母亲于新奥尔良求学期间，甚至在她刚回来不久，伊迪丝·卡西迪把她的孙子从头管到脚，极尽娇纵溺爱之能事。这种隔辈人的过分关爱使得做女儿的虽为人母却不请为母之道，即使是做了母亲四年之后，深情有余但耐心不够的弗吉尼亚仍感到进入不了角色，“像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一直到 40 年代末，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感觉不到霍普有什么变化。“我们打发长夜的方式不外两种：看球赛或是密苏里铁路公司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卡西迪和格里沙姆两家的亲友从一开始就非常宠爱比利。“招人疼的小孤儿”，有人这样叫他，到他会走路时，男人们就开始带他到处跑，去得最勤的地方当然是埃尔德里奇那有着长柜台的杂货铺，在那里他目睹了南方特有的商业：并不富裕的白人怎样把东西卖给更不富裕的黑人。

很久之后，比尔·克林顿还能回想起在杂货铺里看到的和气生财和诚信无欺，还有他的家人是怎样向身无分文但又被农时所迫的黑人农民赊帐的。但要说这一家人全都是种族和解的模范那倒也不见得。说到底，赊帐也是谷物分成制（这是新政的组成部分，即租地的农民可用谷物抵租。）的一部分，收获季节几周后就可以清帐。

除了杂货铺，比利也生活在邻里中间，但只限于与白人孩子一起玩耍、上学。在后来的竞选年里，他曾偶遇一位童年在霍普认识的至今仍是单身的黑人妇女奥德塞，卡西迪家以前的女佣。他对记者说，“记得我曾在她家的门廊上跟她跳摇摆舞”。但他不记得她姓什么了。

他记得更清楚的当然是家里跟他说话最多，讲故事最多的人。这里面有外祖父、外曾祖父，还有她母亲特别亲近的舅舅，奥伦·巴迪·格里沙姆，一个平凡、善饮、随处受欢迎、满肚子下流笑话永远讲不完的人。这位只上过 4 年学的乡巴佬几乎可以说是阿肯色同类人中卡通化的幽默大师和土专

家。他们的话题有时也涉及政治。卡西迪一家历来是南方的民主党人，随着新政的日得人心，他们必然越来越支持以前一直支持着的党。

阿肯色的男孩从小就被灌输那种“好刀、真枪、睡觉也得睁只眼”，善恶报应、有勇有谋的处世哲学，这是了解内情的人发出的忠告。在那里能侃会编是有本事的表现。

卡西迪家的邻居有个叫文森特·福斯特的孩子是比利幼时玩耍的伙伴，他的老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如果说他是块有魔力的磁石，那孩子们就像磁粉一样聚拢到周围来。

一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一种总觉得自己倒霉或受骗的人格时说过这样的话：“天高地远的阿肯色人就崇尚一种什么权威都不迷信、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人生态度。”在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中，主角或正面人物都有那种见风使舵的灵活性，只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需要就是理由，人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就更不在话下了。

卡西迪家对比利寄托着莫大的希望，鼓励他超脱阿肯色人世世代代的自卑感，力争上游，出人头地。“从我记事起”，他承认，“我就是在执意给我灌输这种思想的人中间长大的。”而这种启发教育又与当地人信奉的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滑头策略有所抵触。这也许是做推销员必须掌握的，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聪明人却不是指责别人的不是，而是把这不是学来去制别人。“阿肯色人就是有这种天性”，加里·威尔斯剖析道，“这使他们从生活中（而且也从政治改革中）大有收获”。

在 40 多年后即将就任总统的前夜，这个在哈维街的小屋和那间杂货铺里领受教诲的男孩——后来也以一州之长或一国之尊的身份把那些经过消化吸收的教诲表达出来——称赞他的爱讲故事的外祖父和舅公是“影响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人物”。在他的记忆中，舅公巴迪·格里沙姆“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男人”。

☆☆☆

但霍普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但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故事更有警世的作用。

罗杰·克林顿也是苦出身的阿肯色人。他是在 20 年代温泉城的一个穷苦家庭里长大的，孩童时饱受煎熬，他父亲曾是一位假释官，后来成了个体肉铺老板，他母亲，克林顿妈妈，有股说一不二的专制劲头，很多地方让人想起卡西迪家的女户主。作为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动辄得咎，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仍像乖宝贝一样生活在继承了母亲遗风的自信的兄长雷蒙德的庇护下，亲友们都说雷蒙德是罗杰的“后盾”，也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周围的人都认为罗杰·克林顿是那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即使是闲逛他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总是往角落里钻，这样，他连高中都没毕业。“罗杰无所事事的时间太多了”，有熟人这样说。“他为了找工作，整个温泉城都跑遍了，可就是没人收留他。”

战后，他给已经成为温泉城的成功的别克车经销商的雷蒙德于了一段时间。然后，40 年代初，雷蒙德通过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让罗杰取得了在霍普开自己的别克车经销点的特许权。罗杰得到的这个差事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其意义远非兄弟情谊可以概括。尽管这个家里的小儿子从未想过要背井离乡，但他决定抓住这个模仿很有威信的兄长的机会。他在霍普销售处为客户和朋友举办排场的圣诞晚会，和雷蒙德每年在温泉州举办的一

样。

年轻的汽车推销人更给这个铁路小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讨人喜欢，出手大方，高高的个子，一头黑发又浓又密，服装既整洁得体又做工考究，再加上一双双色的鞋子，这一切在沉闷的霍普非常醒目，而且也看得出来，克林顿对自己英俊的外表也颇为自得。

难怪他的朋友都叫他衣裳架子。当然，他最突出的身份要算是晚会明星，对年轻的女性，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但是，除了微笑和双色鞋，罗杰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喝酒不要命，赌钱没够，动不动就跟人家动手打架，对循规蹈矩不屑一顾，可偏偏当地那些违法犯纪的事都和他沾边，其实他在这方面的名声在法纪不严的温泉城时就已传出去了。他在那里的一家台球厅里斗殴时曾重伤了一个波多黎各男孩，要不是雷蒙德出面干预，他也许早被关起来了。后来罗杰在霍普设赌骗钱，“不小心”，有人这样说。

“骗到当地一个权势人物时，又是他大哥救了他。”

战时亨普斯特德县禁酒，罗杰贿赂当地警察和官员，把他们从本地酒贩那查抄的私酒买了下来。在那些乱哄哄的私人宴会上，他贡献出度数很高的威士忌，并且还向女朋友吹嘘酒的来历。他最亲密的朋友加贝·克劳福德，也是后来的一位主要资助人，在阿肯色开有药品连锁店。当他 40 年代末在霍普开分店时，罗杰与他合伙从温泉城购进三套赌马系统和好几台吃角子老虎机，就安装在新开张的药店后面。这可让相当一部分霍普人开了眼，通过这些来自温泉城的新人物，他们知道了“药铺”该是怎么个开法。

连玫瑰山的杂货铺也有了变化，除了向度日如年的黑人农户放贷余账外又添了一些新业务，哈维街上的小屋也不再是比尔·克林顿从政后称其为“我的小木屋”的儿童大堂了。早在罗杰·克林顿进入弗吉尼亚生活之前，老顾客已经可以在这里买上一两瓶喝的，而不必驱车三四十英里跑一趟特克萨卡纳。弗吉尼亚的父亲并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贩私酒的，镇上的人还记得，他那位令人生畏的妻子伊迪丝，在做钟点护士之余，也从哈维街的家里往外鼓捣威士忌。

然而，什么也不能改变罗杰·克林顿经营汽车必然失败的命运。霍普的市场压根不像雷蒙德预期的那样，即便是在战后出现了购车高峰时也仍然不行。到了 40 年代末几年，罗杰开始在圣安东尼奥的狂欢周末舞会上肆无忌惮地挥霍批售车款，有时他直接从车行的钱柜里拿出上万美元，还说这是他的工资，正像车行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的：“这等于是自己偷自己。”亲友中也有人这样说：“他永远也长不大，好像什么对他都无关紧要。从心智上讲，他仍是个孩童，从没有真正成熟过。”

1947 年，罗杰·克林顿遗弃了结婚十四年的妻子，妻子的娘家人怀疑克林顿早已与霍普那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寡妇弗吉尼亚·布莱思有染，据亲友判断，在弗吉尼亚把孩子留给哈维街的父母时，他们已经同居了。比尔·布莱思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开始和克林顿交往，有时就留住在罗杰在霍普的公寓里，还经常去温泉城共度周末。这时他已 30 多岁。

比那位活泼快乐的护士大得多，她是被镇上这位车行老板挥金如土的派头吸引住的。

他们经常出入的喧闹场所很多，弗吉尼亚还不时在温泉城的夜总会上登台演唱些应景歌曲，要不就在加贝·克劳福德的公寓高唱她自创的歌曲：

“我是亨普斯特德县的傻瓜”，这些都变成霍普镇街谈巷议的内容，那的确是个“谁都知道谁”的地方，据一位战后在那里长大的人说，“你要是干了什么坏事，在你到家之前你妈就知道了”。

他们的感情历程是起伏跌宕的，有几次都是因为他与别的女人藕断丝连闹得不欢而散。有时弗吉尼亚会示威似地把三岁的比利带到克林顿的住处，小男孩看着他母亲一件一件地把别的女人的衣服物品捡出来，还把那些贴身内衣挂在外面，向那些以卫道士自居的邻居们展示。当然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弗吉尼亚有两次从新奥尔良飞回来看儿子都是克林顿付的机票钱。回到霍普做独立的麻醉护师工作后，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而罗杰与旁的女人来往便越来越少，“他俩也算是物以类聚”，一个朋友说。

伊迪丝·卡西迪可不是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她一边抱怨罗杰·克林顿爱惹乱子，一边也密切注意着自己不安分的女儿正在往再婚的路上走，那样的话，势必会把自己当成第二个孩子抚养的孙子从身边带走，所以她在 50 年代初就告诉弗占尼亚，她打算通过法律途径争得对比利的监护权。

做女儿的认为，母亲“心里的阴暗面是永远也照不亮的，那股生来就有的怨气使她看什么都是阴暗的”。一时间，哈维街的那座小屋里吵成一片，弗吉尼亚又是大哭又是尖叫，抓着自己的儿子不放手，而做外祖母的倒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沉着，伊迪丝只是咨询了当地的律师，并未把针对女儿的监护权讼争诉诸法庭。

在 1950 年 6 月一个气温不高的午后，罗杰·克林顿和弗吉尼亚·布莱思结了婚，这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只有几天。

婚礼有意安排在霍普以外的地方，就在他们常去的温泉城一家赛马场附近的牧师寓所。加贝·克劳福德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罗杰的侄女——与他们在一起。双方的家人一个也没到场，比利仍由那位生闷气的外祖母照管，而克林顿的家人根本就对这次婚姻持保留态度，因为罗杰在与霍普的布莱思的遗孀来往时仍是有妇之夫。很久之后弗吉尼亚才知道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经常拖欠法庭判付给前妻和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还有，他的别克车早在 1948 年的离婚诉讼中象征性地成为抵押品，到 1952 年他已拖欠了 2200 美元，接近他年薪的 1／4。

克林顿把新娘及其 4 岁的继子安顿在东 13 街一座有 6 个房间的平房里，这里位于镇子的边缘，是新辟出的住宅开发区，所以房子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当他们去温泉城赌钱饮酒时，仍把比利留给外祖父母。搬进新房不久，弗吉尼亚正式和比利谈了一些他生父的情况，谈到比尔·布莱思是个多么有魅力，多么可爱的人，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如何受到军方的嘉奖，以及他怎样在回来接他们时死在密苏里的高速公路上。比利像往常一样，听得聚精会神，以后也一直被父亲的淬死和传奇所迷醉。但是，比利也高兴另一个男人来填补很久以来一直空缺的位置。从一开始他就叫罗杰·克林顿爸爸，上学他也乐于使用比尔·克林顿这个名字，不单为了方便，也是欢迎新父亲的姿态。弗吉尼亚还记得新家的后屋是专门辟出的娱乐室，罗杰为他的继子安装了莱昂纳尔牌电火车系统，两人一玩起来就没够。像别的家庭里做母亲的一样，弗吉尼亚怀疑两个人中谁更喜欢玩具。

前次婚姻中也出现过这种继父与继子其乐融融的景象。“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继子之一说，但是，罗杰·克林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喝上了酒，也开始虐待前妻，如果不包括孩子的话。在她的

离婚诉状中指控丈夫用拳头打她，用靴子后跟踢她。现在，搬进 13 街不久，新的婚姻也已开始遭受他酒醉后暴力的践踏。

就在弗吉尼亚要带比利去探望濒死的格里沙姆祖母的那天，他咆哮着拔出一支以前一直隐藏得很好的手枪，醉醺醺地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墙面。母子俩跑到街对面的邻居家打电话报警，五岁的比利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他的新爸爸逮捕。听到风声的雷蒙德当晚就赶到了霍普，以为出了人命，听了弗吉尼亚的陈述后他仍想以行为不检为由将罗杰保出来。但这一次，本地警察要保护霍普的姑娘，完全站在弗吉尼亚的立场上不予通融。不管雷蒙德怎样狂呼乱叫，罗杰到底还是在霍普监狱里关了一夜。这是一次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记忆的事件。“墙上有一个枪眼，子弹完全有可能跳飞，伤着我母亲或是我”，比尔·克林顿在 40 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仍记忆犹新。“我跑出了房间，但那枪眼将伴随我一生，我会每天都看到它。”在那次可怖而又危险的事故发生后的一周里，他和弗吉尼亚离开了罗杰，但是，母亲告诫吓坏了的小儿子，再见到父亲时还是要跟他说话并且仍然要尊敬他。

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开枪事件使“霍普这个造谣市场，更加活跃起来。多年之后，当克林顿夫妇已经成为名人，大部分住在 13 街的邻居们，除了枪击和逮捕事件，对罗杰耍酒疯虐待妻子的其他事已不记得什么，只记得在把角的那座小房子里，夜间经常有吵闹声传出来，罗杰大叫大嚷，指责在外工作的妻子对他不忠——她管这叫做“他的发作”——很像伊迪丝·卡西迪对埃尔德里奇通宵达旦的训斥。有些邻居还能像目击者那样生动地回忆起，那个头戴着牛仔帽脚蹬牛仔靴的小男孩，在忍受了整夜不眠的吵闹后，怎样紧绷着小脸，从那所白色的小房子里走出来，他像是在自己的脑海中飞行，产生千奇百怪的想象。“他会骑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在人行道上不停地上下……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布拉克·申克，这位从窗子里就能望见克林顿家的邻居回忆道。“斜刺里冲上人行道，再旋风似地冲下来，骑得要多快有多快。”

☆☆☆

置身于溺爱他的一大家子人中，尤其是伊迪丝，比利三岁时就开始识字，1951 年秋，弗吉尼亚让他上了玛丽小姐的幼儿园。对着东 2 街的人口有一座仿乡村学校风格的白房子，有钟楼和教堂尖顶，这座由民居改建的幼儿园是镇上最受尊重的标志性建筑。一间独立的大教室，课间活动的庭院，端庄整洁的女教师，玛丽和南尼·帕金斯嫫嫫，教导着一群五六岁稚童如何彼此相处并适应社会。纪律虽然严格，但执行者却是温和的，爱国主义当然是近 40 名学生必修的品德课之一，他们个个举止得体，衣着整洁，当然，他们清一色地全是白色人种。每天都凝视他们的是一幅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乔治·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比利的同学中有人把画像上的人当成了威严的玛丽小姐，这也难怪，玛丽小姐确实有一头珍珠色的浓发，有几络垂在她削瘦而尊贵的面颊上。

比利 1951 年至 1952 年班的同学乔·珀维斯说，“自由世界的”未来领袖是应该在玛丽小姐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这是大家公认的。“玛丽小姐开办的奢华的幼儿园接收的稚童都是来自镇上中上层商贾新贵较好的家庭。”和比利同学的棕发男孩托马斯·F．麦克拉蒂三世，即小麦克，日后继承了南部最大的一家汽车租赁和经销公司。还有以忠诚著称的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父亲的品行端正的文森特·福斯特，后来成为阿肯色最成功的地产商。他

家的草坪与比利外祖父母家的后院相连，可是，正像有人看到的，“前者的院子能容一支管乐队做行进表演”而后者的院子“只够扯起一根晾衣绳”。

尽管对这座除了西瓜便无所长的铁路小镇的闭塞和死板多有不满，但这些童年时期的朋友，不管是作为小石城的行政官员或是开业律师，反正都有了自己赚钱的买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这个由财产和权势构成的世界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个非同一般的幼儿园班集体，不管有着怎样或隐或显的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这位头发卷曲，笑口常开的比尔·克林顿带来这样那样的名声，如果不是财富和运气的话——他们都记得，为了把事情一一摆平，他确实尽了最大努力。

比利是非常念旧情的。“他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如果他想接近的一伙人中有人不喜欢他，那他会坐立不安的”，同学乔治·赖特说，“那会迫使他反躬自省：为了使其喜欢我，我还能做些什么？这一点我在六岁时就已有深刻体会。”由于比同龄人更壮实高大，他显得有些笨拙，“和我们这些人有些不一样”，另有同学说。他以他的能力和乐观性格——“永远是愉快的，友好的”——去弥合任何争议。“一个和平的营造者”，乔·珀维斯说。“与大多数男孩子不同，他不喜欢看到争吵和打闹，他充当的永远是劝架者或息事宁人的角色。他要让每个人都满意，过得愉快。”“比利·克林顿五岁时就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了，”乔治·赖特这么认为。

在玛丽小姐幼儿园同学几十年之后，他还强调一句：“现在听到有人说他坏话，我很不舒服。”

由于管理不善和监守自盗，罗杰·克林顿 1953 年终于失去了别克车的特许经销权。

雷蒙德虽想挽回，但最终也只能让失败的弟弟回到自己蒸蒸日上的车行里当个部门经理，比利正要升入二年级的时候，罗杰突然向弗吉尼亚和他宣布，全家搬到温泉城去。就弗吉尼亚而言，不说是兴高采烈也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这可以远离熟知他们糟糕的婚姻状况的家人和朋友。尽管小镇上的许多人都对她讳莫如深的事实真相一清二楚，但她仍认为离开霍普就能保全家人的面子。

那以后的好几年里，比利还经常乘灰狗长途车回霍普探望母亲一方的亲友，有时还留下与卡西迪夫妇和其他人共度周末。“每当置身于那个大家庭中”，他都感觉到“被巨大的爱包围着”，他曾对弗吉尼亚这样说。作为一个阿肯色人，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他仍能把小镇奇迹般的西瓜吹得天花乱坠。作为政治家他也不可能不提自己的出生地：“我仍然信仰一个叫做霍普（希望）的地方”，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不知多少次这样说过。

三　温泉城——“蓄势而发”

美国这样的小城不多，到处都是温泉疗养院。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温泉或罗斯福故乡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温泉以及别的有温泉资源的城镇也都很有名，但没有哪个能与阿肯色的温泉城相比，换句话说，这里吸引人的决不仅仅是温泉和美景，而巨还有那些可以胡作非为的地方。

“给你一个休养生息之地，养精蓄锐之所”，当地流传这样儿句话。“哪怕是病人膏盲，奄奄一息的人，只要洗了温泉，就能横着来立着走。”两面长满林木的山坡之间，洗浴设施顺着 47 条冒着热气的溪流的走势而设，每天从远山深处流出的有疗效的泉水难以数计。慕名而来的游客发现，“这个南方的景点……到处能看到幸福的笑脸，花丛中有鸟在鸣叫。”而《哈泼斯》的一篇文章则做出相反的判断：“这里是江湖骗子大行其道的地方”，尽管美国政府自称已剪除了这种弊端。在布满温泉浴室的山坡上面是一座十层的塔楼，旁边就是建于上个世纪，又在大萧条之后重修过的有五百张床位的陆军海军综合医院，到 50 年代仍住着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伤残军人。

1953 年，当罗杰·克林顿把家搬来时，座落在沃希托山脉中的小城已有“几分大都市的气象”。战后兴起的制药业虽有取代温泉疗养业的势头，但仍然有追求健康的人出入那些已日见破旧的浴室——那些富有的名人权贵从他们的高级轿车钻进浴室，而在他们身后也有一些无依无靠甚至还有残疾的穷人赶来，因为国家公园服务处的广告说“这里有为穷人免费开放的浴室”。人们汇聚此地不光是为洗温泉，还为了季节性的旅游高峰带来的热闹。夜总会里贴满巡回演出的招贴画，预告着泽维尔·库加特的拉丁乐队、流行歌手帕蒂·佩奇和乔治亚·吉布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米基·鲁尼即将到来，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以及跑马尝打靶尝鳄鱼塘和鸵鸟饲养场，不管你有什么喜好，这里都安排相应的节目，所以，这里才全年游客不断。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旅游经济，其实市政当局也鼓励附近的农户和定居者兴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实业。市中心街道两旁既有低矮的平房也有英格兰风格的大宅屋。当地中产阶级人士喜欢模仿庄园主那种俗艳的装饰，他们的日子显然比大部分阿肯色人好过得多。

比如说在温泉城东南的 5000 名非洲美国人中，大多在旅游设施中做护工、清洁工。

厨师和侍者，靠日积月累，他们已拥有了自己的饭店、医院。

学校，当然，还有浴室。然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还有另一个温泉城，与城市不可分割的已不是温泉浴，而是它藏污纳垢的另一面。

本土作家迪伊。布朗曾经指出，“当地姑息养好的传统由来已久”。近一个世纪以来，群山怀抱的这座小城可以说是民风不古和官僚腐败的发源地，赌博、卖淫、包庇不法以及各种形式的谋取不义之财的活动，构成了隐藏在兴隆的温泉浴生意后面的更兴隆的黑色经济。20 年代，称霸一方的江湖好汉曾宣告此城中立，把它当做自己独享的休养地。

据说，座落在市中心的很有气派的阿灵顿饭店 443 房间就是阿尔·卡彭①长期租下的，即便在他被关进联邦监狱时，那个套间仍给他留着。然而，到了 50 年代，腐败早已不限于赌博和招妓，当地的黑势力当然会因分赃不匀而开战。

就像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温泉城的恶势力变得越来越有团伙性，与此同时，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官商勾结的牟利活动最终控制了赌博业和其他赚钱的黑市交易。

“私酒泛滥、极有吸引力的奥克朗赛马、设赌场营娼寮，这一切都是在官方的眼皮底下繁荣起来的”，这是罗杰·克林顿的新家搬来以后，当地报纸上的一段话。一个与比尔·克林顿同辈的人回忆说，“每家店铺的后堂密室都设有赌桌和吃角子老虎机”。

一份 60 年代司法部门主持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风光如画的温泉城有着全美国“最大的非法赌博行业”。威廉·哈普这位当年《哨兵纪事报》的记者说，“只要讲得出来的东西，这里都能买到”。

固定的客户就是政客们自己，行贿受贿、拉拢选票、弄①Alphonse（1899—1947）：美国著名的黑帮首领，绰号“疤痢脸”。

虚作假、挥霍浪费，什么都干。娼妓和鸨母每个月公开向官员纳“娱乐税”；这些人在警察的护送下定时到加兰县法院交纳协商好的回扣。30 年代时，每个妓女五美元，鸨母则十美元。1946 年，退伍军人发起了一嘲老兵造反”，推举他们自己的代表锡德·麦克马恩做温泉城的市长，甚至州长。然而，变革是一闪而过的事，而政治家们则是江山永固，阿肯色历来如此。而 60 年代当本地一位老鸨从本市最大一家妓院退休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对战后发生的这次变革从轰轰烈烈到一切照旧的始末做了生动的描述。好像是有意证明什么，这个女人丰富多采的历史遭到本地图书馆的抵制。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的温泉城最富刺激性，弗吉尼亚·克林顿在谈起往事时说，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全城上下对赌博这类恶行简直“着了迷”。

“就罗杰·克林顿的生活而言”，弗吉尼亚说过，“温泉城是这么一个地方……为所欲为者如鱼得水，规矩定出来是为了让人破坏的，金钱和权力——只要你能抓到手——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最终尺度”。在许多方面，成功与否取决于虚假的真诚，取决于遍布教堂和公众俱乐部的清白的温泉城与以州府小石城为代表的更广泛的腐败势力在共谋大业上能否合作愉快，当事人之一回忆，温泉城的政客定期向“一大批州官”行贿。

弗吉尼亚·克林顿在谈起她温泉城一位最亲密的朋友时说到这样一个情节，在州政府加强整肃时期眼见她“给州长办公室背去一个装满钱的褐色提包”。

一位在这个时期里在温泉城长大的律师说，“这一切人人心里清楚，作为浸礼会教徒的阿肯色人只是装做不知罢了，很多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这座比尔·克林顿成长其间的城市在一位欧洲记者的笔下被归纳为“南方圣经地带（BibleBelt：指美国南方主张固守《圣经》的教派，信徒以是否严格遵守《圣经》互相监督。——译注）的一个腐败缩影”。

如果你更深入观察还能发现更可悲的情况。城里有为数不小的一批年老力衰的赤贫者。离疗养区不远有供人们寻求刺激的夜总会，包伙食公寓昏暗的后门廊是那些面色茫然的夜游女的留连之所，城区边已废弃的汽车旅馆成了精神病患者的聚居区。一位本地人士在回顾战后岁月时说，“泉城人永远是以低级趣味娱乐自己，真是可悲又可怜，历来如此。”

这样一种地方免不了要给人不安全感，雪莉·阿博特名为《制书人的女儿》的回忆录对人们价值观的冲击力更大。最后，她认同了已有许多人得出过的结论：泉城从上到下的腐败“宣告了美国道德梦的破灭，也证实了辛苦工作才能成功、民主进程、美国特色的小城镇生活等等，全属无稽之谈”。

罗杰·克林顿是从生活实践中深刻领悟这一切的，尽管他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的远房兄弟罗依，朋友们都称他为“黄狗民主党”（“YellowdogDemocrat”：意即不登记的民主党党员。——译注）。曾在 50 年代当选过阿肯色州议会的议员，克林顿家族这时已是温泉城的一股势力，小比利·克林顿很乐意干那些分发竞选宣传手册的差事，到他自己也从政、回乡探望霍普的舅公巴迪时，还做过让罗依叔叔做他的政治顾问的努力。但

是，在这么大的亲戚圈子里，真正有政治实力的一个也没有。在政治上，和在家庭生活中一样，在幕后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雷蒙德——正是这位伟大的雷蒙德伯父才是比利那次对故乡做礼仪性孝道回访时就政治前途等问题虚心向其请教的人，只是做得很谨慎罢了。

雷蒙德·克林顿是个出众的人物，一位高大的美男子，脑筋灵活而又盛气凌人，他对克林顿家族的小辈人期望最高。弗吉尼亚和其他人都承认，是他让软弱得多的罗杰也过上温泉城高水准的生活并赢得城里权势阶层暗中的照顾——尽管他远非小城的主宰而是受害者。雷蒙德小时候在那家紧挨着不名誉的南方俱乐部的药店里工作过，经常能看到阿尔·卡彭在前后左右的保镖簇拥下从人行道上走过去（“你要想不注意他是不可能的”，雷蒙德曾对一位记者这样说过）。30 年代，他找了一个合伙人投资汽车买卖，然后，他很快将合伙人挤走，自己取而代之，克林顿家的别克车行很快成为“温泉城宫场政要的汇聚之所”，正如有人描绘的那样，这位“很有魅力”的老板成了这伙人的召集者，当他在电话里安排一切时，罗杰就在他身后的柜台旁垂手而立，雷蒙德把卖车的赢余投入不动产，酒馆和其他实业，出入那些他认为值得加入的各种俱乐部，广泛结交志同道合者。“他要的是门路、交情和影响”，家人这样说。

像温泉城别的商人一样，雷蒙德·克林顿也以广开财源著称，“明面上”的买卖或投资只是他收入来源的一部分。

“他经营的吃角子老虎机散布在全城各处”，联邦调查局前任探员兼加兰县警长克莱·怀特说。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

这位成功的汽车商与有组织的犯罪以及令人闻风丧胆的阿肯色三 K 党有牵连。像温泉城许多同类人一样，他的这种双重生活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雷蒙德的家被人扔了燃烧弹，富人区的邻居们怀疑这次事件就是他明人做暗鬼的结果。“我们中很多人都认为，那件事不是三 K 党就是黑帮干的——也许是合谋，反正是为了雷蒙德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当地一位熟识他的心理医生说。

克林顿家族的一家之长在尝到权势的甜头时不得不承受它带来的风险。而兄弟之间的关系在雷蒙德填补并继承了克林顿妈妈的权威地位后有了微妙的变化。然而对罗杰那生气勃勃的继子比利，雷蒙德一开始就喜欢得不得了，把他当亲侄子而不仅是被保护人对待，关心他，甚至想法防止他受到爱喝酒的罗杰·克林顿的虐待。“其实罗杰倒是很注意，不在克林顿家人面前对比利动粗，尤其是在雷蒙德面前”，一个亲戚说，“我就好几次看到或听到老雷蒙德悄悄地或大叫大嚷着把男孩高高举起”，大家都看得出来，男孩的反应是喜悦的、报以亲情的。后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与保守的家长之间虽产生了观念上的分歧，但这丝毫不妨碍比尔·克林顿对雷蒙德给予的庇护和所起作用怀有刻骨铭心的感激和敬重。“在任州长期间”，一位专门采访州议会的记者写道：“比尔·克林顿总是把雷蒙德·G·克林顿当成他生活中最有主见的人来请教的，有时简直就是把他当父亲。”多年以后，一位家住温泉城的老辈亲戚看到克林顿白宫的混乱后深有感触地叹息道：“他需要一位雷蒙德那样的朋友，可他没有得到。”

有人认为这位有权势的长辈早就看出了比尔的政治才能，也许已把他内定为已开始筹划建立的雷蒙德王朝的继任统治者。“雷蒙德想利用每个人，包括像比利这样他真心喜爱的孩子”，一位对他知之甚深的女人这样说。

他的责任感似乎永远不出自私自利或自家合适这个范畴。弗吉尼亚记得他曾支持过一位老朋友竞选县治安官，然后又因此人竟然与他强劲的对手结成儿女亲家而放弃了支持。到了 60 年代，雷蒙德·克林顿在温泉城以外也有了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在出类拔萃的民主党政治家中，他选择了阿肯色出身的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给予慷慨的资助，而同时他也是亚拉巴马顽固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长乔治·华莱士的积极支持者，无论何时造访阿肯色都是由他亲自驾车接送。“他与政界有着莫大的关系”,一个侄子说。“如果你想做出某种安排，交给雷蒙德大叔办就是了。”

☆☆☆

刚搬回来时罗杰·克林顿携妻儿住在距温泉城几公里外属加贝·克劳福德所有的一个占地 4oo 公顷的农场里。

自从贪杯误事毁了霍普的买卖后，罗杰尽量拖延回到兄长公司上班的时间，这时他突发奇想，自以为可以务农谋生。

这位花花公子每天早晨穿着那双两色靴子和皱皱巴巴的裤子去照看牛羊。但环境的严酷，住室里的穿堂风，干不完的户外劳作，马上就让他领教了厉害。当他把回到雷蒙德处作为“新机会”告诉妻子后，全家搬进温泉城，住进克劳福德家正待出售的一套两层结构的旧房子里，这里位居城北，离市中心也就是 1 公里。

这所都锋式建筑就座落在一个高坡上，再往上就是狭窄的七号高速公路，从这条被称做公园大街的地方往南转弯就可以直达阿灵顿饭店和温泉浴疗养区。室内布局与他们的生活品味和泉城整个气氛都很吻合。穿过装修了粉红色墙壁的亮丽的起居室就是比尔的卧室，紧挨着的是弗吉尼亚和罗杰的带一间侧厅的卧室，床头摆了一张用来玩牌的小桌子。据弗吉尼亚回忆，楼上是一个没有隔段的大通间，可用来开晚会，家具是墨西哥式的，墙壁上挂的是带神话色彩的小狗打牌的图画，一个嵌入式的酒巴台，绘有条纹图案的那面墙上是一面大镜子。弗吉尼亚觉得这一切“正是他们三口之家所需要的”，她老早就希望罗杰能从他们的朋友加贝·克劳福德那里，用从药店和赌马中赚到的钱做抵押，买下这所房子，为此她甚至把自己挣来的钱也交给丈夫以支付房款。可到头来，像以前别的事情一样，这所房子还是由雷蒙德·克林顿悄悄地买下，罗杰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继子，只是成了房客。

弗吉尼亚先在教会办的圣约翰学校为比利办了注册手续，本来不愿把他放在名声不好的公立学校，那里面的教师到 50 年代仍未拿到大学文凭。而实际上他不得不先在公立的兰布学校的红砖教室里上了两年的学，那里的学生每天早晨要在礼堂的木地板上排好队，“发愿、祈祷、唱圣歌”。

在这里，像在霍普一样，比利仍受白人基要主义多数派思想的熏陶（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是指基督教内部在神学上持保守态度的一批会派，反对自由派迎合新科学而放弃福音。——译注）。相对开放些的温泉城零零星星地有几个犹太家庭和天主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教会学校。50 年代在小石城爆发种族主义危机时，那里的几个白人家庭曾把他们的孩子送到 55 公里外的温泉城来“避难”，原因就是这里严格执行种族隔离政策，有非常传统的南方学校。

管家换了一个又一个，有白人也有黑人，父母不在时，比利就由他们照料，他们都说比利乖巧好带。特别爱给小主人做美食的厄尔莱恩·怀特回忆道，“让他高兴很容易，用不着糊弄，拿他当孩子就是了。”另一位管家从

他与别的男孩大异其趣的能言善辩中看出他有从事宗教复兴事业的领袖气质。“你有没有考虑过？”她曾对弗吉尼亚建言，“也许该让他来给那些不知基督在哪里的人带路”。做母亲的本人不常去教堂，但不管是在霍普还是温泉城，她却常带儿子去主日学校。在他 6 岁时已开始显露出对宗教的狂热，星期天早早起身洗漱，自己打上领带穿上外套，独自走过四个街区，来到这座执行种族隔离制度最坚决的城市中的浸礼会教堂祈祷，在那里，他初次“明确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有人记得当时受洗的情景，在布道会上特设的水池旁，象征性地行了浸礼。家人送给比利的那部《圣经》也被带到教堂，上面写的名字是“威廉·杰弗逊·布莱思三世”。

他亲善安宁的举止早在霍普的玛丽小姐幼儿园时就给其他孩子留下过深刻印象，“我从未见过比利和什么人打架”，一位同学回忆。差不多整个童年时期都与比利共同度过的罗斯·克兰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诚恳的人。”在公园大街高坡上的家里这段时间他发育得很快，就实际年龄而言，他长得恐怕过于高大了。罗斯看到过这个十一二岁的胖男孩怎样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心情照料生于 1956 年的小弟弟小罗杰。多少年之后她仍清楚地记得，比利·克林顿是怎样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被别人所需要的，比如说在朋友聚会时播放受欢迎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唱片，他看到谁受到冷落就去招呼谁，他甚至会蹲下来和她的小妹妹跳舞，因为她太矮，得不到别人的邀请。

光是一味克己本身并不可龋进了圣约翰中学，他的操行分数并不高，但老师赏识他的能力，要求他学会跑前先把走练好，争取抢在别的同学之前回答老师的提问。家人回忆，有一段时间比利变得非常早熟，自以为是，实际上已到了弗吉尼亚不得不经常采取些措施“遏制这种势头”的程度。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比利是很难压服的。”一、般来讲，做母亲的更多地是为儿子感到骄傲而不是担忧。在她的记忆中，小比尔总是尽其所能免受惩罚，因为那大有损尊严。她曾用夸耀的语气讲自己 10 岁时就懂得为别人分担责任，“母亲，如果你用这个”，他听了故事后指指自己的头，然后又摊开巴掌说，“那你就用不着这些了。”

比利在温泉城完成他的中学学业时，弗吉尼亚正是三十几岁、需要对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做出自我估量的世俗的女人。她利用雷蒙德的影响，打破当地排外的医疗体制，很快赢得了一系列麻醉师的业务合同。因为随时会有人来请，她养成了不卸妆睡觉的习惯，后来改成早上用 90 分钟化妆，下午再用 45 分钟卸妆，罗斯·克兰从自家后窗经常看到仔细化妆的弗吉尼亚·克林顿，穿着浆得雪白的挺括的护士制服，更衬托出一头浓密的黑发，脚上穿的不是护士鞋，而是亮闪闪的皮便鞋，连精心修剪的手指甲都光洁异常。

有时她会在医院轮班，中午回家时，如果是夏季她肯定会换上短裤和颈上系带的三角背心去修剪花草。然后美美地喝上几杯，在院子里一把躺椅上伸开四肢晒太阳——像她自我描述的那样，“黑黑的四肢、肚皮和乳沟，描眉，长长的翘起的睫毛，黑眼线，唇膏要光洁亮丽的，还有手指甲和脚趾甲，一切都要像我花园中的花一样生机盎然”——这一切当然受到邻居和过往行人的注意，更不用说她儿子以及其他孩子了。“她总是那样惹人注目”，克兰说，“总是精心修饰自己，讲究式样”。除了挺括的制服和花园背心，弗吉尼亚有时也喜欢穿一件自己改制的男式睡衣，踏一双毛绒绒的拖鞋，一根接一根地吸铁圈牌香烟，用略带粗嘎的嗓音给儿子和儿子带来的同样年龄的孩子们讲些诙谐的笑话。

当时在场的孩子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其中就有人说，“那是一种真正的好莱坞气派。

她是一位长得很好看的女士，经常逗得我们笑疼肚子……她可以说是女中威尔·罗杰斯。”(WillRogers（1879—1935）：美国幽默作家兼演员。——译注)。

她和她的丈夫，就像当初相爱时适应霍普一样，现在已经与更热闹更有诱惑力的温泉城融为一体了，他们开着车到处跑，只要与克林顿车行有关的地方都去。像高塔俱乐部、观景台、大车轮和南方夜总会，他们经常光顾，有比较重大的演出时，弗吉尼亚肯定盛装前往，对枝形吊灯、红色的天鹅绒幕布，她有一种天生的喜爱，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密室里，吃角子老虎机，双骰赌台，轮盘赌和二十一点，各种玩艺应有尽有。

有时他们也会成为奥克朗的赌客，因为泉城只用运动场内的小高尔夫球场赌马。有一段时间，罗杰甚至还买下了一匹良种马，尽管它一次也没有赢过。在赛马季节里，弗吉尼亚尽量把她的时间安排好，赶在中午以前到达赛场，很多人都见过她在班上读赛马小报。她总是从工作岗位上直接奔往赌场，把比利留给管家或别的什么人，或者干脆在他的脖子上挂一把钥匙——后来还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弟弟——自己则每天准时在奥克朗赛马场的两元窗口前报到。

她给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是，在花哨的外表下面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很认真的，颇有心计的，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当时的妇女中并不普遍。家人和邻居都知道，她作为麻醉师挣的钱比她丈夫挣得还多，所以很明显，她对家庭所负的责任也多些。亲友中有人评论道：“比尔是由一个真正挣钱养家的女人带大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人。”罗斯·克兰则深有感触地说：“在我看来，弗吉尼亚·克林顿是个非常有力量的女性。”

母亲与长子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温泉城的家人和朋友都记得她是怎样把仍然幼小的比利当“成年人”对待的。“在把比利当大人对待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含糊过”，她说。连同辈人也经常注意到这一现象：比尔几乎从不做杂七杂八的家务事——“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一团糟”，有人说——“他似乎总有足够的时间自己来支配”，另有人回忆说。

小男孩已迅速成长为可依靠的同盟者和伙伴。“即便是在未成年时”，做母亲的回忆，“比尔在家里既是父兄也是儿子。”

通常情况下，弗吉尼亚从医院或赌场归来先煮上咖啡，兴致仍然很高地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打开话匣子，说的是她看到、听到的，当地医疗界以及其他她必须打交道的领域里发生的大事小情。话题基本不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多是街谈巷议的家长里短。

只有八九岁的比利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后来他也开始发言，有时还争论。童年朋友戴维·利奥波洛斯说，“高中时他们母子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而且“双方各不相让”，“出现过那种红头涨脸的场面……但不好说谁更占上风……分不清谁对谁错。”

据说他也和温泉城其他男孩一样，在密室里尝试过吃角子老虎，“但由于手头不宽裕很快就不玩了。”他还和朋友们一起给当地很出名的一位老鸨打专线电话，主要是听她在电话里说脏话”，他后来说。“我们都从未听过一个女人使用那样的语言。”年轻而又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在这座颓废的小城里既不能说一尘不染也不能说是完全无知的。

作为未成年人，当比尔第一次被弗吉尼亚带到她热衷的赌场和剧院看赛马或听著名的杰克·蒂加登演奏，后来比尔自己也学着吹奏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时，他感到很不舒服——觉得不体面，如果还说不上是耻辱的话。“这是天下最愚蠢的事”，刚跑完第一圈马他就嘀咕着要离开奥克朗。弗吉尼亚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蒂加登的表演刚一结束，比尔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要离开。

她觉出比尔对这座开放城市的腐败深有恶感，但她认为“这种对奢靡的反应对他的成长也有帮助”。也许这种厌恶使未来的总统更有家庭观念。一位作家写道，“他把事分得很清，她生活方式中的某些部分并不当然就是他的。”儿子虽亲，但有自己的主见，他开始慢慢地、心地、不留痕迹地把自己与这个家庭区别开来，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离开并重返阿肯色，除了那些他无力控制的事情。

☆☆☆

罗杰·克林顿的脾气随着酒量增加而变得更加狂暴。

搬家后不久，他不但打妻子，而且开始打继子。到温泉城的最初几年，弗吉尼亚经常在她应诊或值夜班时把比利带在身边，不让他和醉得很危险的继父待在一起。尽管罗杰已多次提出要正式收养比利，而且孩子已改姓克林顿，但做母亲的却迟迟不履行法律手续。

比利在霍普的同学乔·珀维斯回忆，“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是在朋友家里度过的。”50 年代初的那些周末，当他母亲和继父忙着赌钱、饮酒、吵嘴打架时，比利经常自己搭公共汽车溜回霍普，周五晚上来，周日下午回。虽说外祖母在哈维街的家也有吵嚷，但还是被他当成避风港。可是除了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无处可逃。弗吉尼亚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母于在公园大街家的厨房里等罗杰回家，听到他的车开过来停在门外，两人就会“紧张”起来。刚到温泉城在一次吵闹之后，弗吉尼亚收拾行李带比利到朋友家住了几天。在那恼人的夜晚里儿子不安稳的哭闹声，仿佛 40 年后仍响在她的耳边。

罗杰仍然爱在公共场合滋事，以前往往是为了他那位密室朋友加贝·克劳福德，他偏偏爱打那种只靠自己打不赢的架。可现在更多是为了吃弗吉尼亚的醋而发生肢体冲突，有一次在高塔俱乐部她和别的男人跳舞，结果，据她回忆，罗杰差点儿把那家伙“揍扁”，那一段他“总和我过不去”，她回忆，他的生活越是混乱，他倾泄给妻子的愤怒也就越多。她后来承认，自己有时是故意在夜总会或赌场里用与别的男人调情来报复他，而实际上，酗酒带来的问题以及夫妻之间别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就是没有外力触动也随时会爆发事端。

夫妻之战会从夜总会一路打到睡不着的男孩的卧室门外。“那些夜晚，我们的家庭混乱局面会从半夜持续到天明”，弗吉尼亚回忆说。从 8 岁到 10 岁这段时间，比利躺在床上经常能听到母亲列数罗杰·克林顿的桩桩罪行：“不忠、酗酒”，一夜一夜地争吵，时时发生肢体冲突或亵读行为。

每次吵架都能听到母亲影影绰绰地提到霍普的一个小姑娘以及什么人用老婆与小石城的州长换房子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是，差不多 40 年后，华盛顿的记者也用混乱这个词形容克林顿政府做出的杂乱无章的决定。）祸不单行，5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比利又经历了一件与一向很有威信的外祖母有关的事。在他们搬离霍普不久，伊迪丝挨了一次打，在神志不大清醒的情况下被送进当地医院，因为她表现得非常狂躁，不大负责任的医生开

始用吗啡使她安静下来，很快她就上了瘤。没等痊愈，卡西迪夫妇也搬来温泉城住进一所离公园大街不远的小公寓，为的是离女儿近一些。此时的伊迪丝已有很重的毒瘾。在万般无奈之下，弗吉尼亚安排她住进设在本镇的阿肯色州立精神病医院，那里距温泉城 30 公里。“天呐，那个地方糟透了”，弗吉尼亚在写给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的信中这样说，而且直到比尔·克林顿几十年后自己当了州长，那里仍然是全州最糟的地方之一。伊迪丝·卡西迪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1955 年里，有好多个周末弗吉尼亚都带比利去探视，两个女人总是争论不休。满头白发的伊迪丝在无边镜片后面的人的目光瞪着女儿，乞求或说服弗吉尼亚让她离开疯人院。

出院后，她的吗啡痛得到了控制，可见她有着惊人的毅力，从此，伊迪丝重新成为她外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经常光顾公园大街的女儿家，提醒他不要忘记殉难的比尔·布莱思以及她有多恨罗杰·克林顿。别的孩子也记得她经常抓住机会展示照片或颂扬“比尔生父”的许多优点。

l955 年秋天，弗吉尼亚又怀孕了，她和丈夫都想再要一个孩子。尽管她也知道这对改善他们的境况恐怕没多大帮助。她这时已开始悄悄存钱，“每周我都像松鼠一样做些贮藏工作”，这是为了必然会发生的离婚做准备，尽管她不愿这一大到来，因为她觉得那太丢人，而且经济上也不合算。在 1956 年 7 月罗杰·卡西迪·克林顿出生的那个夜晚，做父亲的丢下九岁的比利出去喝酒庆祝。弗吉尼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给被抛下的长于打电话，后来只好再通过电话让雷蒙德·克林顿过去照看一下。这都快成老套了：罗杰·克林顿时不时地会突然消失好几天——他父亲死的那天夜里就是在他女朋友家里找到他的——回来后用来搪塞的理由荒谬得可笑，连自家人都讥笑他。而比利和家里其他人都知道，高做的弗吉尼亚·克林顿从不盘问也不打听。丈夫的背叛已司空见惯，让她有了某种免疫力，连常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孩子们也觉得这是正常的了。“那种到处找自己的丈夫担心他于这干那的女人简直要我的命”，弗吉尼亚晚年发表的许多看法都很有份量，不管是针对自己那位著名的儿媳的还是针对其他人的。

小罗杰，人们都这么叫他，出生后，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到附近一家旅馆避难。弗吉尼亚发现自己的出逃已被其他男人所注意，这里面就包括赌场上结识的一个朋友和为她做头发的理发师（未来的丈夫）杰夫·德怀尔，后来证明他还算是一个守信用的骗子。

罗杰这时已改用大杯喝酒，车行的买卖也快完蛋了，连在家里他都会有不堪的举动，甚至在孩子们的生日晚会上都会口出秽语。公共场合他对弗吉尼亚连踢带打，要不就把她掀翻在卧室的地板上用她的鞋打她。

即使受虐待的妻子在回忆过去时加以掩饰，但城里亲近的朋友和儿科医生的病案中都记着这样的事实：比利和罗杰受父亲的打骂远比别人给他们的多。朋友们回忆，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诊所为两个孩子处治伤情的次数已记不清了，“家里人也有人赶上这种情况，临时给他们的伤口上点药什么的”，温泉城的一位律师说。可弗吉尼亚却千方百计要把那些就诊记录抹去，生怕日后受窘。而且看得出来，每次比利受到伤害时在报不报警这个问题上都是几经犹豫的。弗吉尼亚经常央告医院里的护士保守孩子受到虐待这种不光彩的事，一位当事人说，“她自己似乎应付不了那一切。”

1956 年里，警察两度光顾公园大街的家。有时在夜间会听到小罗杰为找妈妈而哭喊，比利在觉察到有某种危险时曾给母亲的律师打电话叫警察，

罗杰本人又因为舞枪弄棒被捕过一次。酒醉中他不服从警察让他穿好衣裤的命令，结果就身穿裤衩背心被带上警车，1959 年 4 月，弗吉尼亚愤然提出离婚，但旋又在罗杰要求给他改过自新的恳求中放弃了。

比尔·克林顿平生第一次挺身抗暴是在他 14 岁时，那是 1960 年，作为高一的学生，体重已超过两百磅，身高已接近 6 英尺，实际上他的块头儿已经比继父还大。那一夜当父母的卧室里又传出母亲遭殴打的声音时他破门而入。

“我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他回忆说。“爸爸，我有话要告诉你，我要你站起来听。如果你站不起来我可以帮你”，他对瘫坐在那里的克林顿说，“我再不允许你在发酒疯时动我母亲一指头，否则你就要小心我了。”这次，弗吉尼亚还是报了警，大罗杰又在监狱里过了一夜。

“克林顿家有三件事是受到城里大多数人称道的”，罗斯·克兰念旧地说。“一是随时都有货的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二是可兑换证券，三是克林顿妈妈用来待客的鸡肉馅饺子。”羡慕他家的邻居们回忆往事时都注意隐恶扬善——那些夜间的打闹和报警都闭口不提——那些恐怖事件更是讳莫如深。罗杰·克林顿即使在醉得路都走不稳的时候，只要碰到克林顿家的人，哪怕是接家里人打来的电话，也会变得步态正常且说话连贯。

他妻子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戳穿假象，而且警告孩子们不要把家丑外扬。“我母亲最能把苦水往肚里咽”，克林顿自己在 l992 年对一位作家说。“许多事情都是悄悄处理的。”

但是，若把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情况汇总后可以这样说，少年比尔·克林顿之所以给人留下讨人喜欢、活泼开朗的印象，那是因为他一直戴着一个看不透的面具，“现在我才知道发生在他家里的事”，一个朋友说，“我被他的不动声色所蒙蔽。他把一切都深深地埋在心里。”很早以前，这位将来要当总统的少年就有后来角色所需的生活在双重世界中的本领：人前人后两张脸。像许多生活在嗜酒家庭的孩子一样，他也学会了不说实话，”一位冷眼旁观者说，“而且没有任何愧疚感”。他的家庭，很多人在回忆中证实，有大多不为人知的事，有些事被说得天花乱坠只是为了误导外人，未必真实。

中学时代，或者说刚升中学时，他就很有迷惑人的手段了，说的话都是人们爱听的——而且用的是最亲密的家人之间才用的语气。“现在我们也只能猜测当时的他是多么憎恨那一切”，一个几时的亲密朋友说——“那位继父，也许还包括他母亲，对事情负责的人，以及家里帮不上什么忙的人，他们构成的整个生活是充满谎言的，但也是真实的，而总而言之又是不得不遮遮掩掩的。”直到 1992 年总统竞选班子成立，比尔·克林顿才开始在公开场合讲他幼时所受的折磨，他的顾问班子认为应该有一个去留适度的版本，那些虐待和言行失控是令人痛苦的，但人格化的故事以及动情他讲述则肯定会成为一笔无价的政治财富。

60 年代初，当弗吉尼亚偶然得知公园大街的房子将归雷蒙德·克林顿所有的“毁灭性的”消息时，了断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她决定一旦攒够另起炉灶的费用立刻就走。这个被她称之为“可怕的”决定已在她心里徘徊了两年。“罗杰曾经是那么甜蜜、风趣”，她回忆道。“我总想他会变好的。”

1962 年 4 月，她鼓起勇气向克林顿宣布她要离婚，这无异于点燃了一颗炸弹的引信。

第二天，母子三人收拾行李，最后一次离开了山坡上的家。

用自己这些年的私房钱，她在温泉城南郊的开发区新置了一个家，并且逞强地把孩子送进当地中等的——还不是最好的——学校，“那是我用眼泪挣来的”，弗吉尼亚承认。房子则是 50 年代最先进的，全电气化。这座红砖结构的建筑属于那种草原小屋的风格，玻璃窗很大，窗框是白锻铁的，整所房子装有值得夸耀的中央控制的通风系统，每个房间都有排风道，主卧室很大，有带镜子的梳妆台，人地式的浴盆，宽大的储物间，另外还有两间小卧室。与房子相连的是个两车位的车棚，正好停放弗吉尼亚开惯了的软篷车，比尔上高中后经常开这辆黑色双座的别克车，罗杰和弗吉尼亚到处跑时用的是一辆旧的福特车，顶蓬可以拆去改装成软篷车，夏天的时候比尔也开它出去过。

这个住宅区房子很多，车道在其中纵横交错，有些人家的门前立着铁制的黑仆模型，这种笑模笑样的人形作为上流社会的标志在白人中间挺受欢迎。邻居们的档次也比公园大街的要高些。拥有温泉城商业区大部分不动产的惠特曼家就在这个区里。近邻是肃穆的浸礼会牧师寓所，其主人对弗吉尼亚的四季装扮给予适度的关注，她的园艺工作是全方位展开的，包括三角背心、紧身短裤、暴露的上腹部。

她对自己在社区以及牧师心里搅起的波动颇有些得意。作为新住户，他们很快就与三家近邻熟悉起来，因为他们几家茂盛的玫瑰、石竹和黑紫色的牡丹已先于侍弄它们的主人打成了一片，每年的母亲节他们都向镇上大量供花。在朋友们看来，这真是一首田园诗。比尔·克林顿的一个同学在看到他在斯卡利街的新家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真不错！”

但这些对改变家庭的内部气氛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春天里，母子二人还要在离婚诉讼中作证，揭示那些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暴力。“他不停地对我和我儿子比利进行肉体伤害，一喝酒就对我动粗”，弗吉尼亚作证道，其余的由 15 岁的比利做补充声明——主要说的是在他站出来保护母亲时罗杰·克林顿做出的过激行为，尽管他已比继父高大，从 1960 年事件发生后，虐待和打骂一直持续不断；1962 年 4 月，就在他们离开前夕，比利又一次报了警。“他经常恐吓我母亲，他怨恨我母亲，和她争吵，我可以肯定他说她是不幸福的，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用律师提示的语气他做出郑重声明。他还补充了一个真实的细节：“我最近一次救助我母亲时，他威胁说要打烂我的脸。”

1962 年 5 月 15 日，加兰县法官在温泉城开庭判准离婚。有一段时间，比尔陪着他情绪不稳定的母亲在当地各个夜总会乱转。“我感觉他是在扮演四五岁时扮演过的角色”，一位密友说。“但现在罗杰已出世，比利临时担当起父亲和丈夫之责。”这段时间并不长。一夜之间瘦了许多，变得憔悴苍老的罗杰·克林顿不久就开始出现在斯卡利街，把车停在路对面，直到无可奈何的弗吉尼亚出来和他说话。

在这期间，充满了乞求和解的哭闹，他经常一个人在驾驶座上过夜，看上去“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回忆道。

克林顿家人也来诉说罗杰·克林顿是多么难过。出于怜悯，她早晚会接他回来，甚至比尔对这次离异也是“心情矛盾”的，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是坚决地抵制了任何形式的妥协，他料定继父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据一位朋友说。在闹离婚期间，比尔和大罗杰曾开车到城外单独谈过一次。儿子认为那是“一次真正的谈话”，讨

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肯定触及到罗杰·克林顿的愧疚。但即便如此，比尔也不为所动。“是弗克尼亚不顾比尔的反对回去找他的”，这是朋友中的一种说法。

他们显然再没有讨论过和解的事。“鉴于罗杰已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不可能说服弗吉尼亚与他复婚”，此事已广为人知后，一位心理咨询专家说。而比尔再次把自己的恼怒放在一边，尽量让母亲满意，“她大概觉得小罗杰必须有父亲”，比尔后来的这种解释有意避开了旁观者做出的另一种判断：“真正的原因很明显——弗吉尼亚爱罗杰。”

弗吉尼亚经常把那年夏天比利主动到温泉城法院把布莱思的姓改为克林顿的事挂在嘴边。这可以说是为了和弟弟有同一个姓，也可以说是为了向他仍然爱着的继父做出的一个姿态，弗吉尼亚是这么解释的。后来被记者问及此事时，比尔自己无论如何想不起采取那一步骤的准确时间和原因了。事实上，阿肯色法院的记录显示，是弗吉尼亚·卡西迪·克林顿申请变更的——1962 年 6 月 12 日，也就是离婚后一个月，罗杰开始以哀求的姿态出现在斯卡利街上时。

不顾比尔·克林顿的反对，弗吉尼亚和罗杰于 8 月 6 日复婚，就在他离异 83 天后。但这次大罗杰重新入伙后，和弗吉尼亚住进门厅旁的小卧室，因为家里显然已经有了被公认的“第三位成年人”。那间壮观的主卧室现在归 16 岁的比尔所有。

从这一天起，一切恢复原样，占据了主卧室的男孩又开始在外边强颜欢笑掩饰自己内心极大的痛苦。像从前住在旧房子时那样，他把朋友们召来练习乐器，组织其他活动，有时自己也不知道把他们召来的原因是什么。那位比邻而居的浸礼会牧师担心自己的女儿与这样一个父母都能饮善赌的家庭做伴是否安全。而比尔的朋友们看到的多是少年比尔正常的、开朗的、甚至兴致很高的一面，他们尤其喜爱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对小罗杰来说，比利是巨人普巴，一切都有主宰—在外面，他是宽厚仁爱的、循循善诱的大哥哥，在家里，他又是父母的替身和暗中的保护人。对这一点毫无异议。

弗吉尼亚现在天一亮就把小罗杰带到学校去交给看门人代管，避免他单独与父亲在一起。复婚后时间不长，罗杰·克林顿在洗衣间打弗吉尼亚，并把剪刀抵在她喉咙上，小罗杰撞见后跑到邻居牧师家找他哥哥，歇斯底里地叫着：“普巴！普巴！爸爸在杀妈妈。”接下来又是一场鸡飞狗跳，最后的结局是比尔把醉成一滩泥的继父拖出门外。

在高中同学的记忆中，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小型福特车、一顶巨大的四角阔边帽、再加上他的能言善辩和热情奔放，是辨认普巴·克林顿的标记。几乎没有人觉察到他内心掩藏的忧虑，某一段时间内，他会急不可待地往家里打电话了解母亲和弟弟的状况。

幼年的时候他曾是“很幸福”的，比尔·克林顿在几十年后就是这样自我评价的，可当被问及对继父有什么温馨的记忆时，他顿时无语，离开霍普后就没有过那样的时刻。

“有一次他送我上去圣路易斯的火车”，长长的沉默之后，他解嘲似地对记者说。“只是这样的事情次数不多。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很怀念这仅有的一次。”

“我认为那使比尔变得坚强起来”，他母亲指的是那些狂暴的恐怖之夜。一般来讲，做长子的也同意这种说法，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她确实给

我以教益，让我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都受益不浅”，他这样说过。“靠她给我这些教益我撑过了许多艰难时刻。”其他人也从别的方面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他总是关照自己的小弟弟，因为大罗杰根本靠不住，所以他不在家时经常打电话回去，唯恐出乱子”，认识他们全家人的一个朋友说。“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比尔·克林顿根本没工夫做少年。”在面具的后面是内心激烈的冲突，这冲突造就了一个年轻人，在他紧绷的神经下，潜藏着崩溃的危机，时时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有可能波动起来，越是想让诸事顺遂、大家相安无事就越是如此。“我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首要问题是”，他在偶做反省时说，“该怎样在不丧失原则、不大动干戈、不费尽口舌的情况下化解矛盾。”

最终的丧失莫过于死亡本身，死是最好的老师。“我时时都在思考这件事”，谈到生父的死亡事故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抓紧时间，因为我对人终有一死有过切身的感受”，多年之后，在一个竞选旅行之夜他透露了年轻时的一次伤心经历，那就是他朋友的哥哥神秘的死亡，那是一个与比尔·克林顿有相同遭遇和追求的年轻人。

“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漂亮……聪明……有人缘，人人都爱他”，说话人的语气令听者难忘。“他前一天晚上睡下，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什么前兆也没有。就那么说死就死了。”

同是一个比尔·克林顿，小学时是个有问必答的规矩学生，升中学后，心气儿都用在娱乐和争强好胜上。由于身高体笨，他有意不参加靠体力取胜的活动，而是在音乐和学识上力争上游，除了功课他还做一些难度很大的事，通过参加奥扎克夏令营，他逐渐赢得全州最佳少年萨克斯管演奏者之一的声誉。作为乐队首席，他以学校音乐计划的名义举办募捐会，平生第一次接触到非洲美国人，“他们成了克林顿尊重的黑人”。他组织的爵士乐队很成功，最终获得全州大奖和音乐奖学金，正如一位成员说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全州范围内结识了许多朋友。音乐一直是业余爱好，虽有时也会成为主业的很好陪衬，但比起学校无处不在的政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谈及个人他极为谦虚，几近自卑，有很多事可作为他这种不自信的旁证。比起别人来他更需要有人来说他做得好”，这是小石城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对他的评价。另有人说，“他对自己的声音歉疚，对自己的脸型歉疚。反映这种歉疚的笑容常常挂在他的脸上。他对自己的存在都感到歉疚。”

温泉中学的校长约翰尼·梅·麦基，可以说是除雷蒙德之外的头一个支持他从政的人。二战使她守寡，但她仍干劲十足地在退伍辅助军人协会工作，每年的国旗日都组织庆祝活动，像学生们回忆的，她善于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表达她的爱国热诚”。当护旗队没有照规定走过雨水浸泡的球场而是绕边走时，这位身躯胖大的女人会大呼小叫着冲到那群怕弄脏衣裤的护旗手跟前，“你们不是美国的热血青年吗？立正！”克林顿的朋友卡罗琳·斯特利在论及学校生硬的规范时说，“来自上方的姿态就是最高的命令，愤世嫉俗被视做不受欢迎的冲动。”

麦基毫不犹豫地把全校首席少年萨克斯手推上了众目睽睽的中心位置，因为她很快看出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负，所以她乐于栽培。这时的克林顿似乎想成为每一个他参加的组织的一号人物。嘲笑中带着怨妒，同学们给他起了个“比尔·竞绚克林顿”的外号。

最后，他那旺盛的攫权欲触动了领袖欲也很强的麦基，结果，她对自

由参加的课余活动小组数量做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不然的话，比尔会成为他们大家的校长的”，她坦诚不讳。事实上有许多学生认为，学校的体制是由不运动的、有“爱好的”、像克林顿这样的学生“操纵的”。“对此我们曾在礼堂举行过静坐示威。”啦啦队长佩吉·詹斯基觉得比尔这类人“好得不真实”，代表校方过多，而不是做学生的代言人。“我认为麦基夫人是在迎合比利”，多年后她对记者说。

他确实有争强好胜的一面，“我在数学竞赛中击败了吉姆·麦克杜格尔！我在数学竞赛中击败了吉姆·麦克杜格尔！”卡罗琳·斯特利对克林顿在赢得那次比赛第一名后“欢呼雀跃”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担任着二、三年级的学生会主席的情况下，克林顿曾与一个老朋友竞争四年级的主席职位，投票时，他相当严肃地对对手说，“如果你击败我，我将永远记住你”。他输了，他们仍然是朋友——但她再也没有忘记那几近狰狞的、冷不丁发出的警告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快。

比尔善于与别人打成一片。亲近的朋友中很多人是因为他的才智而敬佩他，有的人则喜欢他的坚定和热诚。当全州和全国性的报刊就谁将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家进行问卷调查时，回答可谓五花八门。在克林顿当选了美国总统，实现了少年时代就开始规划的宏伟蓝图时，一个土生土长的温泉城人说，“我们中不少人的确小看了他，不管是在可能帮他还是在可能害他的成年人面前，他都应对自如，他总能巧妙地掩饰自己真实的感情”。

也有人在克林顿由于厌恶或反感继父的酗酒恶习而对酒精和毒品所持的拒斥态度中看出了类似的性格特征。“他不过是不想上瘾罢了”，一个和他一起长大的人说。“比尔只是不想听到不赞成他的声音，他不想冒失去未来政治前途的风险。”从小到大，他性格特征中的矛盾在朋友和熟人中一再酿成冲突和嫌隙。

“放学后总有姑娘帮他拿书回家”，弗吉尼亚向一位朋友夸耀。而实际上，至少在刚进入少年期那几年，在这个粗壮的男孩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对女人多么有魅力的男人，“我感觉当时的他有好几年都因自己太胖受排挤而不快活”，一位同学说。

克林顿自己的某些表现似乎也印证了他自己确有这方面的困惑。为了鼓励自己政友的儿子克服羞怯心理，当时的州长在小石城的某次晚宴上曾把这个少年招呼到身边。“我是个小胖子，姑娘们都讨厌我”，比尔·克林顿极其坦率地对州长说。“可是看看您，几乎皮包骨头，但她们都爱您。”

中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长高，不再显得那么胖了，这时的他似乎急于把过去的损失弥补回来，凡有舞会他必到场，夏天的长夜里他开着软篷车做环城巡游时总有姑娘做伴儿——只是这种活动并不经常有。“比尔的品味有非常显著的变化，这是一种我完全赞同的意向”，弗吉尼亚的行文也像她浓妆艳抹的美容术，“我喜欢那种我称其为美女皇后——想让自己样子好看的姑娘。”这位母亲后来承认，不论是她还是她那位浸在酒精里的丈夫，从没跟儿子开诚布公地谈过性的问题，他们对男孩子在这方面应具有怎样的伦理道德观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受弗吉尼亚·克林顿的影响，比尔也是个“直性子”，价值观和个性“也大致相同”，这个特点比当时当地大多数家庭更突出一些，男女之间的关系该是怎样一种模式——性、忠诚、责任、公正、平等，以及友谊和爱情——这个家庭里有许多东西都在等着比尔和小罗杰自己去看，去切身体会。

在约翰尼·麦基的怂恿下，比尔在即将升入四年级的那个夏天准备竞选州里的美国军团童子军的首领。出身富贵之家的麦克·麦克拉蒂，比尔幼儿园的同学，已在州童子军会议上被选为“司令官”。就在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场时，克林顿获得提名赴华盛顿特区参观国会会议，那是 1963 年 7 月 24 日，就在约翰·F．肯尼迪遇刺前四个月，这位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握了他的手，并由此产生了一幅隔代的两位美国总统的合影照，一位来自阿肯色的露出羞怯笑容的 16 岁少年，另一位是年纪差不多是男孩父辈的英俊的在任总统，后者的政治风范被后来者在未来的日子里多方仿效。

阿肯色参议员——他伯父雷蒙德的朋友约翰·麦克莱伦以及另外一位偶像兼未来的雇主威廉·富布赖特请他到参议员餐厅共进午餐。他以前曾动过在医务界谋职的念头，“因为他看到过母亲对医生是多么尊重”，一位朋友回忆说。但有那次充满传奇色彩的华盛顿之旅后他决定选择仕途。“他回来时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了这一点”，弗吉尼亚对记者说。克林顿自己也曾向一位朋友坦言：“在见到肯尼迪那一刻我已经确切地知道我要干什么了。”这位朋友还补充了一句：“他总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甚至在知道怎样做之前。”

他也曾向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他的工作班子成员以及中学的高考顾问请教该选哪所大学。最后他选定了隶属华盛顿驻外机关事务局的乔治敦大学，完全是因为它更靠近华盛顿——尽管他并没有从事外交工作的打算。他的决定令高考顾问困惑，本以为他会在“对南方人来说很难考进去的常青藤大学中选一个的”。他在温泉中学 323 班结业，是全国优等生奖学金的竞争者，拉丁语和音乐都获过奖，背诵英国文学作品的能力突出，奇怪的是，并没有见到对他早熟的评语。在他的美国史课本上，佩里·米勒的《荒原慈旅》一章中有这位未来总统的手泽，他把作者对美国 60 年代的乐观、而不是含糊的结语圈了出来：“这将是一个记述社会觉醒过程的年代。”

在斯卡利街的家里，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为他自豪的母亲的鼓励，弗吉尼亚曾把他的奖章奖品和奖状摆在丝绒镜框里，在起居室辟出一角办了个“比尔·克林顿展”，有幸参观过此展的人回忆道，有人说那个展台像个“圣坛”。这更把越来越孤僻的罗杰·克林顿衬得一文不值，到 60 年代中期，他的威信在老朋友和顾客心里已彻底垮掉。“现在回想起来”，有人这样说，“弗吉尼亚肯定是看不起丈夫的，她在很多场合数落过丈夫酗酒的恶习，这实际上是一种姿态，表明比尔才是她真正引以自豪并寄予厚望的人。”她用家庭摄影机记录下儿子在公共场合的频频露面，并且对亲友说他早晚会当总统的。

她还把他即将在毕业典礼上的答谢词仔细打好复印，分发给亲友和有关人士。在熨平他的毕业礼服的过程中，激动的泪水一直在流淌。“我为他自豪死了”，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她祈祷儿子在礼堂的演讲能成功并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那将是他最荣耀的夜晚”。

乔治敦大学于 1964 年夏录取了他。温泉城在他离去的那几年里，在州长温思罗普·洛克菲勒 1967 年至 1970 年期间推行的改革中，一大批非法的赌场被关闭了。有一段时间，市中心的某些店铺门面被钉上了木板，拉皮条的人和贩毒的人都被挤到了街上。但地方特色没有改变。旅游收入并没有因密室里赌具减少而下降，因为那些神奇的温泉水仍然在日夜流淌。就算是在整肃最严的日子里，几家著名的温泉疗养院，每家的年收入都不少于 50 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内部的人向联邦官员透露的。雷蒙德·克林顿以及其他一些有势力的老温泉城人又找到了新的聚敛财富和施加影响的渠道。有组织的

犯罪也适应新的变化继续存在，阿肯色成了毒品贩卖的中心，就像它从以前的一个单纯的温泉疗养区变成一个度假胜地一样。

比尔的离去，用弗吉尼亚的话说，给她和比尔的弟弟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块“空白”。

8 岁的小罗杰“觉得能保护他的人没有了”。比尔刚去华盛顿时，弗吉尼亚把母亲接来一起生活。但双方很快又都后悔了。

在比尔童年生活过的那个小镇上也有很多成绩优异的同龄朋友，有些还是他的师长，这些忘年交也是在他年幼时彼此接触中培养起来的。这里面也包括一些商界人物，在他们中间他也算是知名人物，比如基瓦尼斯俱乐部，慈善互助会和西维坦俱乐部，他获得过“本年度最年幼商人”、共济会主持人助理以及别的不容易获得的美誉。“他总是彬彬有礼，表现出适度的尊重和良好的举止”，他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崇拜者说，“得到他的同学、老师甚至本地政要的喜爱。”

他对这些人却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即将离家赴学之际，他精挑细选拉出一份温泉城通讯录，上面有几百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简单的个人状况——这些都是为将来的投票竟选机构和各种基金会的建立做准备的。

四　乔治敦——“他们会知道我所为何来”

华盛顿西北，湍急的波特马克河上游，有一块占地 100 英亩的校园建筑，那就是乔治敦大学。从远处眺望，首先看到的是艺术和科学学院的华丽的哥特式锥形塔楼的尖顶，而显得朴素一些也新一些的驻外使领人员学院的教学楼，背靠第 36 大街林荫遮蔽的圆石马路，与商业和语言学院一道，构成东校园的一部分。总之，这所耶稣会创办的大学与威斯康辛大街上时髦的商业大厦、高低不平的殖民地时期的砖路、平房、外表简陋的豪宅和木屋相映成趣，构成华盛顿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比尔·克林顿所在的 1964 届的课程设置完全是为培养使领人员和处理国际事务人才的需要，四年里的必修课大多是社会科学的内容，相对而言，选修课很少。也许更多地被当作业务培训基地而不是一所文科大学，驻外使领人员学院“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训练国务院官员的军事部门”，一个毕业生说，“只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军事条令罢了”。60 年代的在校生约 900 名，它之所以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全赖耶稣会的巧妙宣传。然而，尽管如此，在国内同专业的院系中，它从没被排在前列过。

与那些学费高开销大的名牌大学比较，乔治敦的学生男多女少，且多来自中上等阶层的天主教富裕家庭，而且还有不少来自海外的有钱的留学生——“学校的真正财源来自海外”，一位毕业生说——多数是被拉美或中东国家的统治者送来的。按照一位教授的说法，这是“一所一日三换装的学校，比起同是教会办的福德姆、波士顿、圣十字等地方性穷校来，乔治敦大学要正规且富有得多。驻外使领人员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年轻绅士们都一本正经地穿外套打领带去上课。许多人就在与校园毗邻的专为男士开设的商店里购物，不太宽的人行道旁停着他们开来的一辆辆跑车。

这所大学在 60 年代中期仍带有非常明显的保守主义和贫富等级观念。“那种求索的怀疑论思想在耶稣会这里可吃不开，如果说 1964 年的乔治敦像个高尔夫球场的话，耶稣会的会士们就像是管理人员在这块宗教阵地上警惕地守望着”，克林顿的同学罗伯特·萨巴格写道。“在乔治敦，钱和社会地位——就像它们在别的地方一样——是携手而行的。”“与别的地方比较，也许除了旧南方，乔治敦是彻头彻尾的保守学校，”当时的学生乔·汉密尔顿说。克林顿这一届正赶上国家的多事之秋。1964 年，一项重要的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东京湾问题的秘密解决为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铺平了道路，林登·约翰逊又发出令人欣慰的“向贫穷开战”的豪言壮语（此时越战尚未把国库吃空，也还没有向引发激烈对抗的地方经济政治权力发起挑战）。这些重大事件构成比尔·克林顿在未来 10 年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正像一系列反叛、战争、对抗构成他在未来 30 年中作为政治家将要面对的美国一样。

那年秋天，弗吉尼亚·克林顿陪着她热心政治的儿子来到乔治敦美丽的校园——即将培养出未来总统的地方，下车伊始，他所受的阿肯色地方教育立刻挨了当头一棒。

“看在圣父面上，一个不懂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到耶稣会学校来干什么？”报到时面带微笑的牧师严肃地问道。“别担心，”她的儿子告诉她，“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所为何来。”

刚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即开始着手竞选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这一决定”，他的室友汤姆·坎贝尔说，“早在离开温泉城时就做出了。”

当年的大一新生约翰·卡莱尔对那个高个的乐天南方人怎样把同学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信任他的小团体”记忆犹新，他总是先伸出手来自我介绍，然后立刻就问：“要不要在请愿书上签个字，你不觉得这一层的休息室里该配一台电视机吗？”许多人与卡莱尔一样有同感，觉得他“很有干劲，而且看上去也真诚”。而坎贝尔和另外几个人则对这位不知害羞为何物的新生怀有一种敬佩之情，他“那么喜欢搞政治活动，和每个人讲话，听每个人的意见，想方设法让别人向他的立场靠拢。”他似乎对每个人都深有研究，就是那些偶然相识的人，多年以后也能叫出名字，谁都不记得的往事他还能细细道来。“他时时刻刻都在耍他那套小聪明”,同学中有人这样说。“那就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坎贝尔说，“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体育馆的常客，打篮球时他会连续几个小时练习单手投篮、勾手投篮或运球。”

克林顿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学生活动分子鲍勃·比林斯利给他写了竞选大学生会主席的演说词，就在宿舍的楼顶上开始排练。他把施政纲领认真打印了数百份发出去，“每个条目的可能性都经过仔细推敲”，他向投票人保证，要发行一份快报，改善校庆彩车制作和 1968 年毕业舞会的水平。他虽然赢了个十拿九稳，但从此之后，从学生宿舍到入主白宫，他不断尝到允诺不能兑现又不得不做出解释的尴尬。“大学头一年还不是进行十字远征的时候，但却给将来准备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他获胜后对学生杂志发表谈话，那语气如果不是以攻为守就可以说是得意洋洋了，“在你能改变规则之前你必须先熟知它们”。在对旧的政治规则语有不敬之后，他还是把比林斯利和其他支持者安排到最重要的学生委员会中去。

同学中有人很快意识到比尔·克林顿是个很会“做表面文章的人”，他只干了些往可乐杯里倒几粒咸花生这样的琐事，但他吃到的却是最大的馅饼

和花生-奶油-香蕉三明治。

“从外表一点看不出他惦记家里”，同室中对斯卡利街那令人不安的状况一无所知的同学事后说。“他完全做到了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从一入学他就经常和来自新泽西的身段苗条的金发美女丹尼斯·海兰出双入对，同学们都认为他们会是将来“铁定的一对儿”。但大家都不讨厌他和谁都能打成一片的本事——靠不停他讲阿肯色的故事。

到他的宿舍去总能碰上他那个核心圈子的人在聚会，比尔“款待他们的永远是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谨慎的、对周围的事缺乏敏感的乡下男孩，甚至可以说是个土包子。他说话确实带有罗伯特·萨已格记忆中“鼻音很重的阿肯色口音”，只有那坦露无遗的野心能立刻把他与那些故作高深状的同学区分开来。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干脆对首都政坛上的你来我往持一种不耐烦的厌恶态度。那是一个“对政治几乎全无兴趣的学生集体”，其中一员这样说。“那年头竞选什么学生会主席可不时髦……起码可以说明争暗斗不如笑脸相迎公开拉选票来得时髦”，同学德鲁·巴克曼回忆说。

“可阳光般天真的比尔·克林顿却偏偏喜欢这个。”他一望而知的坦诚在充满狡诈的校园里给人鹤立鸡群之感，但这也正是他很快取胜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成了学校里的红人”，乔·汉密尔顿说。“但他经常停下来和你聊天不让你觉得那只是一种看重你的姿态。即便你明知那是政治，但你不会以为那是不真诚的。”

克林顿主动报名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习齐步走和向后转，一轮下来就穿上了制服，由于计划半途夭折他没能得到军衔。乔治敦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虽是个军事单位，但已满员，像许多其他 1964—1965 届大学生一样，他得在服兵役这件事上碰碰运气，虽说名额极其有限，但总有让大学生缓役的例子。“乔治敦头一年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汤姆·坎贝尔说。朋友们经常结伴去看篮球或马球比赛，还经常往那些“女人很多的专科学校”跑。坎贝尔，毕业于耶稣会高中的纽约人，在入校时以为这个名叫“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准是个黑人。”后来才弄清楚，这个叫比尔·克林顿的南方白人“是我碰到的最不傲慢的人”。克林顿给人的印象与旧派南方人不同，丝毫看不出他是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来的。他“是与穷苦黑人一起长大的”，有人记得他曾对大家讲过这样的话。“任何偏见都会令他不快”，坎贝尔说。当时公共权益法案还没有提交讨论。在一些古巴政治流亡者的怂恿下，他们曾去包围苏联大使馆，抗议俄国人出现在古巴的土地上。但克林顿和他的朋友从不参加针对美国政治的示威活动。而且 1964—1965 届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总体来说，属消极被动的一类。

“真正的激进分子”，有人回忆说，“是那些高年级学生，他们深入南方，作为自由之旅示威者和巡讲牧师，进行那种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旅行。”

巴克曼和其他一些人看得很清楚，这位来自温泉城的友善的年轻人“决心把一切经验和知识尽收心底”，他做事的“热情和兴致之高对那些自信心还不及他的人是很有感召力的。”他对大一的一门必修课：文明的进化，表示出持久的兴趣，其中讲授欧洲历史概论的卡罗尔·奎格利是乔治敦有色人种教授之一，学生们都知道，他讲完古典政治理论部分时总要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其他不在教学计划内的杰作做些炫耀性的讨论。

奎格利无所不知地解释了金钱、技术、阶级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在历史上并非一目了然——比如欧洲贵族兴起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矿开采的技术难题怎样促发了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他的最后一讲总要落在他所谓的“西方文明成功的关键”以及欧美双方的“优先选择权”这个话题上——正如一个学生在回忆中总结的，“那意思就是说，牺牲今天来保证明天会更好……选择明天胜过选择现在。”教授想要告诫他们的是，公民们有为后世建设的“道义责任”。

奎格利的“未来优先选择权”也回响在比尔·克林顿后来的讲话中——“那些基本的原理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指南”，他这样说。1992 年克林顿在得到总统提名时还讲到过这位教授。但奎格利也是一个对美国政治不抱幻想的人。作为空间计划、五角大楼和史密森学会的顾问，他写了一本 1300 页的书，冠以一个巨大的标题，《悲剧与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吹捧，对民主党的大众消费政策更是赞赏有加，但同时也指出了它们都服务于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本质。政党是“被利用的组织”，他写道，“自 1900 年开始，大财团就是各党派的主导力量。”“说两党代表相反的理想和政策……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正相反，两党几乎一模一样，以致美国人可以闭着眼睛投票而不必在意政策上会有多么巨大和深刻的不同。那些有活力的，于国家有益的政策未必导致重大分歧，只是在细节、程序、时间先后或方法步骤上有商榷的余地。”

奎格利对以前的外交政策决策颇有好感，因为那时英美在经济和精英人物方面不分彼此，他称当时“伦敦和纽约之间的权力结构已浸透到大学生活、新闻出版和外交政策实践之中。”威信很高的外交学会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会商的——如果不是共谋的——国际网络。他对学会的“巨大影响”和“在美国历史上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深表赞同。

“他欣赏它的目标，也同意它的行事原则，”学生中有人这样概括。但他夸大了学会本身的重要性，就好像撇开社会学的本体去奢谈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但他那些莫测高深的学问的确赢得了许多在知识心理上有认同感的老派人士的心，他们的社会等级观念和正统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即使不能在某件具体事务上合作，也不妨碍因共同的利益而暂时走到一起。

研究生哈罗德·斯奈德说，克林顿很喜欢听奎格利“才华横溢、魅力无穷、令人振奋的”课。“奎格利博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奎格利认为，60 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班子里有“很多牛津出身的人”，是华盛顿上层的幸事，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学生能做好准备。像克林顿这类好学生经常受到他的鼓励去争取罗兹奖学金或类似的机会。

可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这位古怪的乔治敦教授直到 90 年代才从那些衣冠楚楚地出入各个竞选班子然后又上了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任命名单的志同道合者那里得到已不再需要的重视。“如果说他也是可以信任的”，一位从前的学生在 1992 年大选期间议论起已故的卡罗尔·奎格利时说，“那 11 月 3 日投谁的票也就真的无所谓了。”

☆☆☆

根据教务处的记载，克林顿的大一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各门功课的平均分数是 3．57，已初具入选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资格。在寄给温泉城的朋友帕蒂·克里纳的信中，他说学业实在很吃紧，尽管他的程度已与那些已通过大部分课程考试的学生相当。本着替校方分忧的精神。他自愿把部分时间

投入学生组织的戒酒诊所里，还真诚地帮助双目失明的哈罗德·斯奈德在校园里认路并记住周围建筑的位置。

说是天生的性情也好后天培养的志向也罢，始终不变的还是对政治的兴趣。那年夏天，汤姆·坎贝尔和比尔·克林顿一起回家，造访了雷蒙德伯父位于温泉城附近汉密尔顿湖畔的别墅，他们在那里滑水嬉戏，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穿越阿肯色全境的长途旅行”，那么多朋友，“在那个州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认识克林顿的人。”另一位室友汤姆，卡普兰也记得大二复活节访问温泉城的事，开着时髦的别克敞篷车到小石城机场来接他们的仍然是好客的雷蒙德伯父，当车子在柔和的晚风中驶进温泉疗养区时，路边的孩子几次叫道：“瞧啊，比利·克林顿回家了！瞧啊，比利·克林顿回家了！”卡普兰多年后对记者说，“那个星期里不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学校里跟他一起去过阿肯色的都相信这一点，他是天生干大事的材料。

克林顿 1965 年秋返回乔治敦校园后顺利过渡成为大二学生会主席，在“解决校园停车问题”时他有过几次演讲，颇得好评，还有同学记得他的基调发言：“把住校外的同学也考虑在内，让每个人都参与决定的做出。”那年秋天他还说服耶稣会管理层降低学校食品的价格。在见过后来被刺的约翰·肯尼迪之后，他又设法见到了罗伯特·肯尼迪，以学生会主席身份邀请这位参议员和前司法部长到校演讲并自豪地陪同肯尼迪参观校园。

但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似有过分谦恭之嫌，“于学校当局不利的话一句也没说”，坎贝尔说，“也没提越南战争”，而这个问题已很快成为校园和华盛顿的热门话题。

60 年代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已经揭开了学生骚动和变革的序幕，1963 年声势浩大的民权游行更给中西部乃至全国各大学的民主社会激进学生发出了行动令。牺牲在东南亚的生命也激起普遍的抗议。离乔治敦校园只几分钟路程的华盛顿市区有 25000 学生参加了 1965 年 4 月间的反越战示威，就在克林顿春天入学的那一年，东南亚的美军已达 20 万人。

1965 年 10 月，全国 90 个城市有 10 万人参加到反战游行的行列中去。1 个月后，一名年轻的反战主义者和一个有 3 个孩子的父亲在五角大楼前自杀，几周内，华盛顿特区又有 4 人游行。“只要不装聋作哑，年轻人反叛的迹象随处可见”，一位当年的参与者这样写道。然而，根据坎贝尔的回忆，这些社会动向尽管如此激烈和明显，“但对乔治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到克林顿进入大二的那个年末，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已将近 40 万。而此时的克林顿正急于加入各种学生联谊会，它们以政治色彩浓厚、竞选活动频繁著称，这期间还回阿肯色参加了一个竞选班子的工作，当地的政客甚至已经给这个班子贴上了州长“核心候选人”的标签。

这位候选人就是 J．弗兰克·霍尔特，前任司法部长和州最高法院法官，他被对手称做“快乐的植物人”。在 1966 年的二次预选中，霍尔特最终还是输给了种族主义者吉姆·约翰逊，就是有民主党保守派，特别是威特·斯蒂芬斯，即在小石城经营着那些对全州政治经济都有很大影响的证券。

银行、控股联合企业的斯蒂芬斯公司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也无济于事了。年轻的比尔·克林顿那年夏天全力为霍尔特拉票，虽只是竞选班子外围的一名志愿者，但却在州里各方政要面前做了个漂亮的亮相。像弗兰克·霍尔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早晚也要和斯蒂芬斯帝国打交道的。

竞选最重要的是影响力和赞助金，这一点克林顿算是领教了。尽管在乔治敦能拿到一些奖学金，而且弗吉尼亚的补助也很慷慨，但他仍需要在华盛顿打工挣钱以应付大三以后日益见涨的费用支出。现在，通过霍尔特的侄子和竞选班子总管的介绍，他在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找到一份差事。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助手对他说有两个时段的职位供选择。心急的克林顿口无遮拦地冲口而出："我两份都做"，办公室的人答应了他，他立刻返回华盛顿开始工作。

"他们在我什么都不是……还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的情况下给了我那份工作，"他后来说及此事时没有提及霍尔特竞选班子的牵线塔桥——还有像雷蒙德伯父以及其他一些在首都与阿肯色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固关系。

从 1966 年秋到 1968 年春，他一直是青年实习生协会的成员和国会的兼职工作人员，在参院那座旧办公楼的走廊上和密室里，耳闻目睹的全是越战升级期间各种各样的议论，从底特律到沃兹的种族暴乱，到处都有反战示威者燃烧征兵卡，然后是民主党的分裂，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辞职，最后是罗伯特·肯尼迪和马钉路德·金的被刺。社会学家和这个时期各种事件的见证人托德·吉特林曾经说过，"当历史失去羁绊，现实也变得似梦般虚幻时，一切也就乱了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办公室——而不是自 50 年代起就一直被阿肯色人领导、进行过许多政治活动的参院外交委员会——克林顿在戏末开场前就占据了一个好位置。

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大学法律系教师、34 岁就成为阿肯色大学校长、40 岁已在国会脱颖而出、4 届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是阿肯色州甚至全国的政治奇才之一。

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写作能力著称，而这两样本事在参议院里并非人人皆备，作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 1965 年召集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听证会，自此把华盛顿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批评公开化了。在比尔·克林顿为他工作一年后，富布赖特又推动了一系列调查以及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质询，实际上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成为自己所属政党的对立面，受到白宫主人和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僚们的侧目。

约翰逊总统就曾讥称他做"穷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Fullbright）的字面意思是"很聪明"，约翰逊叫他"穷布顿特"（Halfbrisht），意思是说他不那么聪明。

——译注）。

每日课余他都准时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班，克林顿干的多是些杂活儿，从整理文件到剪报拼贴，而一段时间里干的最多的是把越战阵亡将士名单中阿肯色籍的人勾出来，方便富布顿特向这些家庭发去私人唁电。这是一件令人痛苦而且越于越于不完的工作。

到 1967 年，越南已有 50 万美军，15000 人阵亡，一半以上死在比尔·克林顿在国会山工作的那一年。在一声不响忍耐着处理阵亡名单的同时，他特别注意参议员办公室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想了解政治家们如何处理那些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棘手事务，尤其是富布顿特怎样在经济和机制上为 1968 年在阿肯色争取连任的竞选做准备。

其实，除了比尔·克林顿、雷蒙德伯父以及阿肯色和华盛顿的其他人都很熟悉的富布赖特之外，还有一个不能被罗兹奖学金、大学校长和战争的

批评者完全涵益的非常不同的富布赖特。在他那些囿于已见的阿肯色选民、代表州里大地主利益的富有的右翼人士、种族主义者以及因他开明的反战思想而拥戴他的大学生们看来，他作为一位多才多艺、气质高雅的政治家能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穿针引线实属不易。他也曾在臭名昭著的赞成种族隔离制度的南方宣言上签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凡是民权法案他一律投票反对，他还经常在一些诸如石油补贴和其他行业性补贴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特许权、民权自由尺度以及保护消费之间摇摆，在那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他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且越是在 1968 年这样的竞选年越是如此。

在受到奎格利教授赞赏的民主党东方外交政策的确立者中，富布赖特被认为是喜欢凭“一时之勇出新主意”的“半吊子”，这是迪恩·艾奇逊的俏皮话，“遗憾的是这类新主意也并不多。”当然，在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件和另外一些文件公布后，人们会觉得上述评价放在艾奇逊或他浅薄的同僚身上也许更合适些，在华盛顿那些恶意的倾轧和翻脸不认人的政治游戏中，经常听到对某个人完全相反的评价，有说他极富治国之才的，就有人说他糟透了的，富布赖特最终就栽在了这上面——国家也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种族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上显得怯懦，并不妨碍这位阿肯色参议员在阿以冲突上保持公正，并对越战的结局有先见之明。

当约翰·F．肯尼迪 1961 年考虑提名富布赖特出任国务卿时，哈里斯·沃福德（20 年后比尔·克林顿总统面对的将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沃福德）和其他民主党人鼓动犹太人、黑人和自由联盟扼杀了这项任命，向总统施压，改用了迪思·腊斯克，使其成为越战结局的促成者之一。同样的用人政治在几十年后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也屡起事端，不是弄巧成拙就是毫无效率。

60 年代末在参议员办公室审阅阵亡名单的这段经历有着深刻的讽刺意味，其中更有深刻的教训值得汲泉—那些政治上的妥协、党派间的弱肉强食、高层人物致命的幼稚，应该对克林顿是一种警示。但他离开时是否已经领会或汲取了那些意味和教训呢？至少在他后来的阿肯色和全国的执政中没有表现出来。在以后近 30 年的时间里，从没听他在公开场合说起这位他怀着崇敬之情为之工作的优秀参议员对他的重要影响是什么。1966 年至 1968 年，J．威廉·富布赖特似乎在全力搞一种政治平衡：必要时以学者的身份做个和事佬，更多是作为国会山的人在国内活动。皆大欢喜成了他的追求。“这不是肯尼迪的作风，是富布赖特的，真正的富布赖特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对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这也一直是比尔效仿的”，一位熟识他们两人的阿肯色人士说，“他崇敬富布赖特”。汤姆·坎贝尔根据自己的观察评论道：“他们生活和事业的许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是来自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或许有过这样的念头，总统可能当不上，“但他却坚信”，有人断言，“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地位肯定能达到。”

大三的时候克林顿平生第一次做出暂时放弃学校政治活动的决定，为在国会山多工作，他开始应用向奎格利学来的一晚只睡个把小时就能恢复体力的方法，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应用这种打吨睡眠法。他的室友都佩服他在作息时间上的自控能力，他把小闹钟放在床头，一躺下就入睡，别人起床时还困得东倒西歪，可他已经精神焕发地走出去了。这段时间里他与一直迷恋的政治活动暂告分手，全身心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

但到了 1967 年 3 月，他还是参加了东校园的学生会主席的竞争。此前早些时候，他在学生自办的《乔治敦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已有了应付社会上和大学里混乱局面的新办法。“如果说民选代议制政府有什么意义的话，首先它必须有正视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他写道。“我们不能采取孤立的、只说不干的或使我们的行动失去实质意义的政策，作为学生团体，必须使我们的代言人占据他们最应当占据的位置，播下改革的种子，收获它带来的硕果。这是时代的要求。”

他在全校范围的竞选活动是“一项复杂的运作”，他的室友回忆说，先列出一长串不住校同学的电话号码，然后一一拨打，再手工绘制有“投克林顿一票”字样的圆形宣传品，它既可以挂在门把手上，也可以巧妙对折塞进男士上装的口袋里或成为女士佩戴的徽章。像以往一样，克林顿本人是最积极的竞选工作人员，尤其是对异性工作对象。

“他最清楚怎么对姑娘们说话——就用男人对女人的方式——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情”，一位女同学回忆。“当他跟你说话时会让你觉得很带劲。”这次克林顿遇到的困难仍是资金和知名度不够，还缺乏更好的顾问，只好重复以前的话题：学校伙食——“这才是乔治敦的政治主流”，萨巴格回忆说。

但组织工作和财政支持更逊一筹的特里·莫吉林是大二学生会副主席，他敏锐地抓住学校当局在“财务和行政方面过份膨胀”加以批评，主张学生应在校政上发挥更大作用，他根据比尔·克林顿在校园里已经形成的形象来压低他，称他做常见的“政客”，“学校当局的候选人”，甚至给他起了个“滑头威利”的外号，这个外号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追随着他。从那时到现在，他显然想把自己从这个外号中摘出来，但结果却是旧的没有了又现出了新的，那年他给家里人写信，吹嘘自己在同学们中间如何受信任。

“人们——甚至一些政敌——都对我以诚相见”，他写道。

我们真不知道所谓“以诚相见”意味着什么。“当初我读到这一段时莫名其妙”，一位读过此信的朋友说，“后来我问自己：等等，一个 20 岁的人在谈到他的政敌时应该这么说吗？”

“我在学校从事政治活动时就像后来一样爱争论”，克林顿在后来提到乔治敦的竞选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他 1967 年的竞选就吃亏在辩论题目的选择上，他实际上是在避免争论，而且不敢向以前很权威而现在已大为改观的辩论方法发出挑战。甚至他的个性魅力和好人缘也未能挽回变革的诺言无法兑现带来的败局。莫吉林以总票数 1300 票中胜出 147 票当选。像从前出现过的那样，失利把克林顿打入显而易见的消沉当中。

“比尔有那么一阵子抬不起头来”，坎贝尔说。他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引经据典阐发的道义原则，像一位支持者所言，“失败后就钻牛角尖儿”，琢磨到底哪儿错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那宽厚的微笑和安稳的小睡掩盖下的是他对成败得失的斤斤计较和极度忧虑。不过，“克林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人”，萨巴格总结道。“我们只能看到以后 4 年，比尔·克林顿却把未来的 20 年看清了。”

那年春天的时候，美国空军已有 2000 架次飞机飞临越南，马钉路德·金在纽约 30 万人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讲，60 年代著名的“爱之夏”从旧金山嬉皮士聚集的黑什伯利向四处扩展。1967 年 10 月，克林顿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1000 名激进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举行了“包围”五角大楼的示

威活动，另有 10 万人在林肯纪念堂前进行彻夜默祷。

“我们这些人没有参加游行的，我们一心只想融入主流，不能和那些人为伍”，坎贝尔在解释不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时说，“比尔和基特（阿什比，室友之一）以他们在国会山的工作为由，说不能让雇用他们的人受窘。”

但至少对克林顿来说，这种回避有一种解释不通的滑稽在里边，他拒不参加的运动正是富布赖特参议员出力鼓动起来的。比尔·克林顿的同学认为他不参加是因为他对自己观察到的某些东西不安，可身为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却并不担心什么，他只从中获得乐趣并赢得声誉。

另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准政治家的动机更是直言不讳，“克林顿直到离开大学才参与反战活动”，萨巴格写道，“但他对这一运动的浅尝辄止决不比他对毒品的尝试更多，显然，对后者的尝试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从许多方面讲……”，他们是从自己那一代“分裂出来的一群人”，同学约翰·卡莱尔这样认为，在牧师、修女甚至很有影响的教会学校的师生都走在反战和社会文化改革运动的前列时，处于华盛顿一隅的这所富有的大学里却是一片漠然。“我们应该算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最后固守者”，另一位当事人说。沃尔特·巴琴斯补充一句，学校里的大多数都对时局“无动于衷”。“经商被认为是最佳选择，为政府工作也很实用”，同学中有人就是这样概括大家的心态的。

“当时一些名声受损的人都把乔治敦大学看成是了其余生的体面地方。”

☆☆☆

温泉城那边的情况也不断向这边反馈为消除丈夫的妒火，弗吉尼亚曾向他提交过一份有医院同事签字的文件，上面记载着她一个月来到达和离开医院的时间。但罗杰不理会，仍然做一些危害她和小罗杰的事，知道他们日子仍不好过，身在乔治敦的比尔能做的也就是经常给弟弟写去抚慰和鼓励的信。“要诚实和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尽你所能善待每一个人”，他在信中劝道。当弟弟足球课不及格时，做兄长的除了表示同情之外，还拿自己的胜负经验开导他，“我很遗憾你因悬空球没处理好而未能通过测试……巨人当初也吹牛说两试肯定过关，但实际上我试了 11 次”，他告诉他，“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决心要做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只要你有必胜的信心。”

1965 年，大罗杰被确诊为口腔癌转移。由于爱面子，他固执地拒绝医生建议的面部手术，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往返于温泉城和北卡罗来纳的杜克医疗中心，接受试验性的激光治疗以及其他一些希望不大的疗法。

罗杰病倒不久，比尔给他写去一封绝无仅有的表示同情和鼓励的信，给继父和继子之间充满痛苦的互不理睬的关系留了一份文字记录。比尔认为他现在开始上教堂是件好事。“我相信，爸爸，除非和上帝一样面对生命，否则我们谁都不得安宁，要知道善终归胜于恶，即使死亡也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同情夹杂着心酸，这是一封显示年轻人力量的信，其中甚至还提到了他曾予以抵制的复婚。“你应该放下架子，爸爸。还应该多给我写信。”他谆谆告诫的语气，俨然把大罗杰当成小孩看待。“咱们那次把车停在旧家环形路后面在车里进行的单独谈话是一次真正的谈话。那是 6 年前的事了，当时你和母亲正在闹离婚。后来你又回到我们中间来，我满以为日子会过好，可你就是戒不掉酒，从那以后我再也闹不清你到底要什么了。”

接下来是一个真情流露的段落，每句话都是出于真诚、悔恨、拒斥、内疚和怨愤，这一切相加就是他们共同经受的煎熬。

当然，一直以来我没能给你大多的帮助——或者说我从没提起勇气表露这一点。我现在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忍受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你和母亲仍走不到一起来，我只想在你能做到的情况下帮助你拯救自己。

我想我现在就应该暂时搁笔等待你的回信，但还有几句话还是说在前面好——1．我不认为你已充分意识到我们大家有多么爱你和需要你。2；我不认为你对我们每个人一直以来受到的伤害有了足够的认识……这并不意味着谁要和你过不去。

请快给我写信吧，爸爸——我想听到你自己说……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的问题……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你的儿子比尔

1967 年春，大罗杰又去社克医疗中心接受延生治疗。

尽管国会山工作缠身，下届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即，比尔还是南下北卡罗莱纳探望他病弱的继父，北卡罗莱纳与华盛顿之间 260 公里的距离，克林顿驾驶弗吉尼亚当年送他上学时开的那辆 1963 产别克车往返过几次，坎贝尔回忆说，他有时“周末开车去探望，星期日晚上回到学校后显得精疲力竭”。还是那么要面子，罗杰自己不能处理洗手间里的事但又羞于启口。“比尔还得连搂带抱地替他料理……但又不失他的尊严”，弗吉尼亚回忆说。比尔·克林顿很久以后对记者说，他去看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完全是因为爱他”，“已经再没有什么架可打”，也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了。”在最后一次探望时，罗杰把戒指给了他，“他们终于和解了”，弗吉尼亚说。

他给母亲的信更勤了，“南丁格尔小姐”他这样敬称她。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要让你为我而骄傲”，他指的是学校的选举。“不管输赢，我要把滋养我的荣誉和勇气反映出来”，他向母亲通报探望大罗杰的情况，抓住病情不太严重的时机，他们一起到查珀尔希尔共度复活节，他把详情告之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说出最后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仟悔’”，弗吉尼亚说。

然而，那些寄往温泉城的信虽都是恭顺的，但总能反映出母子之间特殊的关系。

“希望你现在除赌马之外能再干些别的——你大概永远也赢不了那么多的”，这是一句他早就想说的话，不过他马上又说起了别的，“好姑娘！

l967 年秋，罗杰·克林顿回到温泉城度过他最后的时光，藏在斯卡利街那间背阴的卧室里的他，虽然只 57 岁，但已口角流涎，瘦得皮包骨头，还是为了爱面子，谢绝一切人探视，即使是交情最深的朋友。感恩节前夕，弗吉尼亚把比尔召了回来。照做母亲的自己讲，11 岁的小儿子已经祈祷了“好几年”，希望父亲的死把大家的痛苦带走。现在他祈祷这一切快点结束，就像弗吉尼亚·克林顿形容的，病人痛苦的苟延残喘如“恐怖影片的最后一幕”，最后几个夜晚是由比尔陪伴正被病魔吞噬的人。比预计得又拖延了几周，如弗吉尼亚在日记中记载的，小罗杰“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答”。

仅过两个月，66 岁的外祖母伊迪丝·卡西迪也去世了。

这时已回到乔治敦的比尔·克林顿立刻给弗吉尼亚写了信。

“猫猫死时我没能陪伴在你身边，没有比这更让我遗憾的了——现在你可以安静几年了。”这样一来，弗吉尼亚确实可以对她们母女共同经历的一切畅所欲言了，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无论是伊迪丝还是罗杰，“再没

有逃回到黑暗中去的必要了。”

☆☆☆

那年冬人，在富布赖特关键性的支持和推荐下，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地区的竞争中赢得了罗兹奖学金，全国 32 名获奖者，但乔治敦大学只有克林顿一个，尽管早就有奎格利的鼓励，在乘飞机接受最后面试时路过一个机场，克林顿随手抓起一期《时代》周刊，恰巧读到的一篇文章谈的正是面试评议组提出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奖学金是对他骄人成绩、出众才华和独特个性的赞赏，当然，再加上他的运气和无人能比的支持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耀，而已这次与考官的会见也使他与那些对他后来的事业起重要作用的小石城的权势人物有了初步的接触，也间接地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在面试者中就有阿肯色首府罗斯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

赢得此奖在温泉城给他带来更多荣誉和名气，其中就包括家乡帕尔默新闻社的一次采访。“学生们在求知的氛围中聚集一堂，这样的优势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可比”，克林顿对当地记者说。“如果我们获得真知就可以对国际国内事务有一个清醒的观察。我认为更多的介入是必要的。”

相对于“普通老百姓”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什么是他所谓的“观察”也许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让我们在不经意间一目了然，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他此刻对老家的人摆出既油滑调加以讨好又屈尊俯就施以敷衍的姿态，确实没有他后来的“介 4 入”来得复杂。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68 年他大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全国发生了一系列骚乱。

1 月里越南的春季攻势之后是林登·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随后就是马钉路德·金的遇刺。

克林顿对朋友说过，他是支持反战的民主党挑战者、来自明尼苏达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的，另一方面，他像乔治敦大学其他学生一样，一直与举国上下的运动保持距离，直到金遇刺的那个下午以及 4 月 5 日华盛顿贫民区发生的暴乱。

克林顿志愿参加学生救援行动，在他那辆白色的别克车上贴了个红十字就开进了余烬未熄的黑人区，在暴乱发生的边缘地带向灾民分发食品。从温泉城来看他的卡罗琳·斯特利还记得，当他们经过发生暴乱的现场时“被看到的一切吓呆了”，克林顿还对她拿照相机东拍西照的举动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些景象“只是一时的”。回到宿舍后，她感觉到克林顿“很忧郁”，口中还念念有词，仔细听原来是金 5 年前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段落。

他们和其他同学还到楼顶上眺望隔着 30 个街区伴着警笛声冒起的滚滚浓烟。像华盛顿的大多数白人一样，他们害怕暴乱冲出黑人区。而实际上像以往一样，一切只限于黑人住区和他们的产业。但白宫的草坪上还是架起了机枪，军队驻扎在乔治敦体育馆，有人还特意在大学商店的橱窗上涂上“黑人兄弟”的字样，这家奢华的“名牌大学”男士商店“做过不接待黑人的决定”。

届姆·坎贝尔回忆，除了比尔突击性的救援行动之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校园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当动乱刚刚平息余烟未散时他们曾冒险走上街头，又一次被看到的一切震惊。整个华盛顿的东北部几乎已不存在，像是一片战争废墟。克林顿的一位室友说，“城市中的这一

部分我们以前很少注意过。”

☆☆☆

克林顿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即使不是全校第一也是名列前茅。但他获得的荣誉却是本科生里最高的，除了每次都参加竞选外他并不是特别爱交际，大四刚开学他和丹尼斯·海兰保持了三年的稳固关系就告吹了，尽管他还和其他女人一起去看她。

他的业余时间多是和男性朋友在一起，共处最多的要算是与他在波特马克街合租一套公寓的室友汤姆·坎贝尔，他的这位同学对反战示威多有微词，所以很快入伍，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基特·阿什比，得克萨斯一位富医的儿子，去给华盛顿右翼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工作；汤姆·卡普兰，来自巴尔的摩的年轻人，进入白宫后成为一位能干的撰稿人；汤姆·穆尔，来自肯塔基的军人子弟，据说成了一位精通拿破仑兵法的专家。

和在温泉中学毕业时一样，比尔·克林顿给大学里的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是前途远大、能说会道、头脑敏锐——是个政治家的好坯子。“他算是思想的受用者”，乔治敦的一位朋友后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撒网人，对一切巧加利用的人，但却不是（思想的）钟情者，哪怕这思想再好。”坎贝尔还记得他们在波特马克街的寓所餐桌上经常讨论战争问题，说不到两句就扯到政治和务实层面，决不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打圈子。“他的反对理由并不是说美国不道德，而是说我们在犯一个大错误，他奇怪的是伟大如美国者竟能容忍这个错误，他认为美国在浪费自己不可能再有的时间。”

在他们预计在 6 月举行的毕业典礼前 4 大，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初选获胜眼看就要把一国之尊的荣耀罩在头上的那个洛杉矶之夜，被一枪撂倒。毕业的庆典周被突然取消，简短的仪式也被一场倾盆大雨打断。“似乎整整 4 年的经历非要有一个隐喻的结束……当阳光突然又从黑云中探出时”，罗伯特·萨巴格写道，“校园之外的世界发出了一份非常黯淡的邀请”。

五　牛津——“他要想尽一切办发”

他未被征召入伍，只是事出“偶然”，比尔·克林顿 l992 年很诚恳地对《洛杉矶时报》说。“我根本没有做任何手脚或让征兵局对我予以特殊照顾。”但 24 年前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尽管知道的人不多，但阴影在比尔·克林顿离开乔治敦前几个月就已经存在了。1968 年 3 月，温泉城的征兵局根据国家的政策把克林顿的待征等级从缓征 2-S 提升为应征 1-A 这也就是说在他大展宏图之前先要面对可怕的赴越参战的前景以及怎样才能不使自己的名字成为他在富布赖特办公室整理的阿肯色籍阵亡名单中后面的一个。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雷蒙德伯父打电话。

☆☆☆

像阿肯色这样各方面比较落后的州，直到 1968 年春夏之交才对越南战争真正重视起来。

在历次战争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受高等教育者都彼免除了兵役，这次被送到东南亚打仗和战死的多是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政府的秘密文件的记载对这种丑恶现象也有所反映。根据当时大多数当事人的记忆，征兵局乐于免除那些中产阶级和富家子弟的兵役是因为他们多是“正在学习有用的本事”的大学生。于是就专挑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去接受体检。据一位历史学家后来透露，1966 年至 L968 年的时候，这种区别对待的办法“是作为一种特权应用在征兵事务中的”。1／10 弱的大学毕业生会去越南，他们中能接近实战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美国青年高中以下学历者应征人数则两倍于此，上前线的比例也是一样。穷苦人家出身的，特别是非洲美国人，大批地被选进那个无底洞。越战阵亡人员中，黑人比白人多两倍。

阿肯色的情况让人一目了然，这个州的平均家庭收入在全国来讲是接近最低的。越战中美军死亡总数近 6 万，伤者超过 25 万，周复一周，月复一月，阿肯色州所受损失逐渐高过其他州。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乡村小镇的高中里，有的整个年级的年轻黑人全部死光。

就是在相对繁荣些的温泉城，约翰尼·梅·麦基校长情有独钟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也为吊唁立碑这样的事忙得团团转。克林顿一家的邻居，比尔童年的朋友和同学麦克·托马斯虽然给家里挣来一枚金质勋章，但自己却永远躺在了国旗覆盖的棺材里。

到 1968 年，伤亡人数激增，光靠征召穷人，未受教育者和非白人已不再够用。约翰逊政府强行撤销了研究生免征而使很多中上阶级的子弟得以幸免的旧办法。这样一来，逃避兵役就不是躲在研究生院里那么简单了。

当他 1968 年的征兵纪录作为一个问题在 20 年后新罕布什尔候选人初选期间被提出来时，克林顿本人没有交代他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接触和拜访——尽管雷蒙德·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定时向这位焦虑不安的大学生及其家人通报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进展情况。

比较亲密的朋友们都还记得，从乔治敦回家探亲的克林顿，尤其是在快毕业的那年，经常嘲笑他保守的伯父，故意用他的自由观衡量老人的言行，从个人的角度拿雷蒙德那众所周知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见不得人的关系寻开心。

“尽管雷蒙德为他做了那么多，我猜比利并不以他或他的观点为荣”，家人里有人这样说。“我本人肯定是不赞成老克林顿先生的。他是个真正的老顽固”，一位学校里的朋友说，“但比利则一贯采取挖苦的态度。”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喜欢讥笑他的年轻侄子眼看就要被投入到那场血腥的、不受欢迎的战争中去，这可不是开玩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比尔·克林顿第一次政治危机，而眼下也只有他这位虽然是非不分但却很有影响力的伯父是可以依靠的。

他被划定为应征 1 一 A 级是 1968 年 3 月 20 日，雷蒙德立刻开始行动起来。“得知比利要被征召的消息，我们马上着手工作，”雷蒙德开始卖车时的朋友兼私人律师亨利·布里特说。这是一次协同努力，“让比利得遂其愿”，布里特事后说，而且还补上一句，“比利当然知情”。

情况并不乐观。2 月里林登·约翰逊发出除医学院学生外一律撤销缓征的命令。年轻人开始向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预备役军团等单位里聚集，以躲避一阵急似一阵的征兵令，大家都知道，这时入伍的新兵至少有 1／3 要开往东南亚。但雷蒙德·克林顿却知难而上。3 月底他给老朋友，负责地方

海军预备役部队的小特赖斯·埃利斯指挥官打电话。

他要求指挥官“特别为比尔·克林顿安排一个位置或开一个服役证明，”这是一个知情人的原话，“雷蒙德说他有个大学毕业的侄子，军队要征募他，小伙子愿意加入海军”，埃利斯回忆说。但海军预备役在阿肯色的名额已满，而且等候加入的人已排起了长队，埃利斯向雷蒙德保证，他可以负责与海军在新奥尔良的第八辖区的指挥官接洽，看能不能特别安排一个位置。“找我的人很多”，埃利斯回忆说，“我总是回答说看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在拜托这位指挥官的同时，雷蒙德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威廉·s．比尔。阿姆斯特朗，温泉城征兵局主席，他和雷蒙德·克林顿和特赖斯·埃利斯一样，同是海军协会——全国性海军支持者组织——地方分会的基本会员。雷蒙德给阿姆斯特朗施加的压力更大，他强调的是他们对海军承担的道义责任更多，同时也附上了比尔·克林顿的毕业证书和操行报告。“为什么不能给小伙子一个参加海军的机会呢？”

布里特还能回忆起克林顿在征兵局主席办公室里软磨硬泡时的语调。布里特本人建议阿姆斯特朗“给比尔·克林顿开出一份已人征的文件放在抽屉里，过上一段时间后再说。”

连着好几天，雷蒙德和亨利·布里特开着车到处跑，在阿肯色大坝落成典礼上缠住富布赖特参议员，非要让他的办公室给温泉城征兵局过个话。征兵局工作人员中罗伯特·科拉多回忆，在那次庆祝活动过后不久，富布赖特的助手就打电话到温泉城，敦促有关人士“给予一切方便”，以使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得以赴牛津深造。“雷蒙德就像一位资深政治家一样善于两面出击”，布里特解释说。“事情再糟，他也要让比利进海军。

他是想要个双保险。”

温泉城征兵局对比尔·克林顿要去牛津深造这一点印象深刻。“按照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是首批入伍的”，征兵局的执行秘书奥佩尔·埃利斯说，但“我们也为温泉城的子弟能成为罗兹学者而骄傲。”但即使有千条万条理由，威廉·杰弗逊·克林顿都不应迟于，%8 年夏应征入伍。但是，威廉·阿姆斯特朗迫于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根本就没有把克林顿的材料放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我们要给他去牛津的时间”，科拉多记得主席是在离疗养区不远的办公楼里一间小办公室里这样通知他的。

这时，埃利斯指挥官也在与新奥尔良的指挥部联系破例安排海军预备役职务的事，并且很快就打电话给老朋友雷蒙德·克林顿，问“那小伙子的事怎么样了？”汽车商含糊其词，“别担心。他不会走背字的。各方面都有关心他的人。”

比尔·克林顿最后还是被安排了体检时间，不过是在 1969 年 2 月，地点是在英格兰的美军基地，这就与他按期入伍的分配方面完全相反了。他的应征期与他的体检时间的间隔“比别人长了两倍”，也有人说，“这样的间隔比大多数地方长了 5 倍。”在血腥味最浓的 1968 年被阿肯色定为 1—A 级的适龄青年中，延期如此之久的只有比尔·克林顿这一个。

雷蒙德伯父和其他人的幕后活动使他得以离国赴牛津去完成他头一年的学业，正式撤销缓役的命令在他身上没有执行，应尽的军事义务也没有荆这个足够长的间隔使他置身于战争之外。“征兵局对他宽厚到了极点”，奥佩尔·埃利斯事后承议，“我们超额满足了他的要求。”

☆☆☆

在 l968 年秋开往英国的合众国号轮船上，比尔·克林顿很快成为全船最受欢迎的人。

同赴英伦的美国研究生中包括克林顿 25 年后工作班子的成员。刚一离开哈德逊码头，他就开始在甲板上和娱乐室里用吹奏萨克斯管或讲阿肯色的故事来招待同行的大学生们。

就是风狂雨暴，大家因晕船躺在狭窄的舱房里时，他也像亲人似的嘘寒问暖。

呕吐不止的人里就有他后来的顾问和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他还记得“一个身材高大动作笨拙的南方人”推开他的舱门，手端蔬菜鸡汤和饼干说，“我知道你很不好受，来点有滋味的。也许对你有帮助。”

这批人中唯一一位非洲美国人，罗兹学者汤姆·威廉姆逊，也是后来出现在克林顿任用名单中的一个，初见之下，对这个热情洋溢的阿肯色年轻人持警惕态度。但当克林顿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他们早在 10 年前就因对当时并不出名的奥瓦尔·福布斯在那次学校危机中采取的行动看法相同而联系在一起时，他很快就打消了戒备。威廉姆逊还为克林顿对“底特律流行歌曲的熟悉程度而叹服”。同船者中也有人对克林顿那么容易就能讨女人喜欢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小地方来的青春小伙，不带任何矫饰的魅力，还有像魔笛手一样运用音乐迷惑人的本事。比尔“能连续不断地吹奏萨克斯管”，威廉姆逊说，“一会儿用真诚的魅力，一会儿又用他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反正是要获得年轻女士们的注意。”

前方等待他们的牛津是世界闻名的研学圣地，距伦敦西北 50 公里，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大学，13 世纪起就见载于史册。1968 年在校的 1 名学生是从 31 所有名望的大学召来的，克林顿所在的大学学院是首次被选中的 3 所学院之一。教学采用的是默顿学院传统的导师制。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同，没有必修课或讲座，没有课堂测验和期中考试，只有一位在整个研修期间负责到底的导师加以指导，提示一些该读的书目和应写的文章。这种教学最终要进入大学考试系统，成绩既不是简单的及格也不是荣誉头衔，不再做进一步的测试，直接授予一个在多个学科被承认的硕士学位。

美国的这批罗兹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发现，在牛津那尊贵的外表后面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相当松散的真实内核。“牛津强调的是能言善辩和海阔天空的议论”，一位罗兹学者说。“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是不受鼓励的。”1 个小时的导师指导课 1 周只有两次，不为升级的论文只读给导师听，期末没有考试，一切要看个别辅导时双方投入的热诚和议论的质量。60 年代末，这之前和以后也没多大差别，熟知牛津这些小秘密的罗兹学者“认真吸取经验者”少，“不可救药的败事者”——至少在学习时新英语方面一事无成者——却屡见不鲜。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带回去的都是中世纪塔楼炮台和绿野仙踪之类的故事，他们每周写给不讲效率的、昏昏欲睡的导师的文章被批上几句不相干的话就算交差。牛津研学的经历只是给自己“抬高一下身价”，等于得到“一张进入美国某个精英阶层的入场券”。也许所有的大机构都一样，条文规定得很齐备，但对那些相沿成习的不妥之处却采取姑息态度。所以，大部分美国人最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学习，以弥补国内学习的不足。这样一来，往往在两年后离开时仍对牛津的底细茫然无知。“你可以想做多少就做多少，那是一种游戏。”60 年代克林顿的牛津同学德尔·马丁说。

导师们无论怎样变换花样，都不出偏重教养的英语预备学校制度形成的大氛围，虽然有令人厌烦之处，但牛津仍对大量求知者有很大吸引力。“刻苦用功不仅是不必要，而且还会受到怀疑”，曾在马利奥尔学院学习的美国人戴维·西格尔在写牛津时说。

“其行为规范……已被半官方地确认为‘不战而胜’。”在这所知名的大学里也许就是为了磨练表面文章和嘴皮子上的功夫，那类让大家掌握实际和持久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几乎没有。

“大部分美国学生，他们在读本科时多是特别勤奋的人，来到这个无需刻苦的地方后都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期，”西格尔回忆说。另有人总结说，美国的这批奖学金获得者都乐于接受这褒贬虚实的一套，确实也没见有人站出来打破对他们正当做神话的一部分加以享用的虚名的迷信，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两年期的学者，很多并不在乎拿不拿毕业证书。只要他们参加“第三年”（实际上就是“两年”后，西格尔解释）的最后考试，总有那么几个体面的过关者，“直接拿到博士学位”。“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也太容易了”，另一位继克林顿之后来到牛津的罗兹学者说。“大家都保持着不揭破谜底的沉默。”

“牛津被评价过高了。在那里学习的美国人基本上没人管”，一位美国留学生说。

“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不较真的根据。”多数人都找到了。克林顿的同学，后来成为希拉里·罗德姆的同事，最终成为共和党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富翁威廉·韦尔德，只记得他的牛津岁月里全是“啤酒加巧克力，没完没了的牌局和酒会，每天下午在绿茵场上的 10 场网球，从没有厌倦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证实未来的总统在牛津接受过对他有特别影响的“指导”或有过什么显著的心智上的收获——连他第一年的读写方面的记录也没有，除了同学们都知道的他对神秘小说和通俗读物的喜爱。“他的论辩能力胜过写作能力”，他头一年的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在 1992 年对伦敦一家报纸含糊地说，“他的文章技巧也许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但他是个废寝忘食的阅读者。”朋友们都还记得 1968 年至 1969 年间他对英式橄榄球的狂热以及他在经常光顾的特夫塔维思小酒馆里说个不停的情景，他也用那些阿肯色的故事和关于越战或其他问题的长篇大论给大学学院的英语聚餐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克林顿“老是显得那么自以为是”，一个当事人说。另外，他也像在乔治敦时一样，成为那种难得一见的能与更妄自尊大的同学相处的人。英国人马钉沃克回忆，“他经常以自豪的口气大谈家乡的西瓜”，在牛津的美国人也像他的本科同学一样，发现他身上许多吸引人的天性。“比尔是在一群贵族绅士中最令我们欣慰的人”，罗宾·拉斐尔说。

在英国的头一年，学术成就平平，但他从没忘记结交各种人，这是一件他一直认真对待的事——那份独一无二的名单和长方形的卡片是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的，就像每天都不马虎的日记一样，从高中到现在一直如此。如果说牛津不能在阿肯色投票或捐资的话，这里却有可为未来实现更大野心提供帮助的有用的关系。“他仔细记下每天碰到的人”，一位作家在记述他们在英国一起度过的一段日子时说。“比尔会在晚上到酒馆里来和我们会合”，布里宁·麦克纳马拉回忆说，“白天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人把他元休止的政治经营活动视为沤异于牛津的外国作派，有人则干脆视他为不加掩

饰的机会主义者。“泄露这一点的是他那双眼睛”，菲利普·霍德森 1992 年对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它们在跟你说话时已在另觅新的目标了。”

当关系逐渐建立起来，重要的姓名也存蓄得差不多以后，现在，他增加一个比以前浓厚得多的兴趣点——女人。

在牛津的两年正好是他 22 到 23 岁的时候，克林顿表现出加里·威尔斯所谓的“一种危险的才能，因为他对所有朋友都是投其所好的，千方百计要让每一个人都高兴。”这对年轻女士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比尔属于我见过的最能迷惑女人的两种人之一”，一位英国朋友说。“你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对自己讲：‘没人会相信他这一套谎话的’，但是，她们相信了。”一段时间的同居者，英国小说家萨拉·梅特兰对风帽式头发烘干机敏感，比尔就安排她到一家美容院去烘干头发。她认为这是“他真诚待人的一个实例”。

也是在牛津这两年，他对女人的品味也有变化，不再是弗吉尼亚所谓“美人坯子”的层次，也就是以他母亲、他父母夜总会的朋友以及他自己的约会对象为代表的那种外表时髦的类型。在一封家书中他偶然提及对一个女人的迷恋，并提醒弗吉尼亚这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有外在吸引力的女人，末了又加上一句可能冒犯她的话，“你不会理解的，母亲。”但在牛津追逐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同时，他还源源不断地给家乡即将成为阿肯色小姐的沙伦·埃文斯寄去情书。就在埃文斯 1969 年 3 月访问牛津时，克林顿还保持着与一位英国女士，塔玛拉·埃克尔斯·威廉姆斯的关系。周围的人都对他能波澜不惊地周旋于所有女人之间由衷叹服。“在同一天内，他先带家乡妞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一个反战集会，把她送上旅游车之后再去塔玛拉那里待一会儿”，一位朋友回忆说。

阿肯色的一个老乡还记得被介绍给埃文斯的情景。“她是真正的美女。他说那就是他爱的那种女人，未来可做他孩子母亲的女人。可我再没见过她。”

他会公开追求，也会私下勾引。另一个朋友记得跟他去参加一个欢迎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的演讲会，客人在演讲时提醒与会者注意：女人的性高潮是性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过度夸大了。“比尔坐在大厅里像个听傻了的乡巴佬”，那位朋友回忆，“南方式的胡子和外套，全身透着南方的乡下气。”演讲结束后他急忙伸出手去要求认识一下。“关于被高估的性高潮”，他拉着南方的长音说道，“格里尔小姐，能不能给南方小伙子一个机会？”整个大厅都回响着他的声音，快把女权主义者的风头压下去了。

在那些风花雪月的背后也有翻脸不认人的无情无义。

除了一些双方认可的短暂的放纵，他的某些混乱的性关系也留下了忠诚与正直的困惑。“大型的闹宴、葡萄酒、大麻以及仓促性行为。那属于一种旋转门式的关系，克林顿追逐着一大帮女人……包括他朋友的女朋友”，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写道，另有见证人记得，“有一段时间里凡是他接触到的女人他都不放过，就这种事而言，对克林顿，还有他的女人，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然而，他到牛津头一年就要结束时，从遥远的温泉城政府办公楼里传来的一个消息把一切都掩盖了。尽管去年 11 月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己允诺结束越战，而且 1969 年 5 月第一支美国部队就要开始撤离，但战斗仍在进行，死亡的军人已逾万，征兵工作还得继续。华盛顿向地方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比尔·克林顿在 2 月里通过了体检，威廉·阿姆斯特朗主席以及他

领导的征兵局在 1969 年春突然做出决定，不能再保存他的档案，即使有罗兹学者的身份和雷蒙德·克林顿的影响。这就是说，他的兵役问题又摆了出来，这次的期限是 1969 年 4 月。幸好有雷蒙德和其他人的加紧活动，日期被再次推延到 l969 年 7 月 28 日——“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学期”，有人这样说。

他们都过于自信了，以为有去年春天的过问，“征兵局会维持已经做出的安排。所以雷蒙德已把给比尔再安排一个预备役职位的事放在了一边，现在连这个选择都没有了。

牛津的朋友建议他设法在美国某个大学弄个预备役名额。

可这条路上已排满了等候的人，而且很可能要放弃牛津的学业，到 1969 年 5 月中旬，离新的宽限期还有两个月，克林顿已掩饰不住感到的压力——“我的情绪从没有这么低过”，他说。离开牛津时，他一边谋划着为逃避越战做最后的一搏，一边也怀疑此一去能否再来。

回到温泉城不久，当他在近乎绝望中亲自去征兵局办公室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发了脾气。在那里，他与做了 21 年征兵工作的老资格行政秘书奥佩尔·埃利斯打了个遭遇战。埃利斯还记得克林顿声称自己学历太高不能去当兵。“他打算报复我，利用他想到的一切关系。”1992 年，克林顿否认他讲过那样的话或进行过任何威胁报复活动，相反，他暗示作为共和党人的埃利斯“有着最糟糕的记忆力”。

反正克林顿是在一气之下离开了政府办公楼的，并且开始采取一系列近乎疯狂的自救行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兵役。

他很快进行了空军体检，很多高标准的检查都通过了，最后因视力不行被刷了下来。

他还手忙脚乱地参加了海军体检，这回问题出在听力上，四个月前的一般应征者体检中这两项都没有不合格。绝望至极，他开始怀着焦虑的心情给朋友们打电话、写信，诉说他的困境。后来，也就是 7 月 28 日期限的前 11 天，他灵机一动到费那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上校家登门拜访，他是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团的指挥官。在 7 月门日晚的两小时谈话中，上校记得，比尔·克林顿只有一个话题：“他非常急于加入”。

被他求到的人里有一位阿肯色老乡，克里夫·杰克逊，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克林顿 1968 年在牛津认识他的，作为共和党人，他曾为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州长竞选班子工作。根据杰克逊后来的讲述，克林顿曾要求他利用华盛顿和小石城执政党的关系“向温泉城的征兵局施压”。虽说志不同道不合，但真正成为对手那是后来的事，杰克逊还是与那年夏天他要为之工作的阿肯色共和党负责人范·拉什取得联系，正巧的是，这位负责人与洛克菲勒州长任命的阿肯色征兵工作负责人威拉德·霍金斯关系密切。

杰克逊安排霍金斯与克林顿和焦虑不安的弗吉尼亚会面，后者已在比尔抵达温泉城之前几周与杰克逊谈过。在与霍金斯面谈时，后来杰克逊透露，比尔·克林顿表示如果 7 月 28 日的征召令能被取消，“他将在今后以其他形式报效国家。”阿肯色预备役军官的秋季录取确实名额已满，但下学期的事还可以安排。他让年轻人到大学预备役军团找他的下级吉恩·霍姆斯指挥官，克林顿说他可以以每小时 500 公里的速度直奔费那特维尔。

杰克逊转述他的同学 7 月 11 日信中的话，比尔“正像热上锅上的蚂蚁一样试图找到一个离开‘当兵’这口热锅的出路。”

作为菲律宾巴丹战役的幸存者，有过 3 年日军战俘营生活经验的尤金·霍姆斯，虽是一身勋荣，但已走到他 32 年军事生涯的末端。外表粗暴而内心慈祥，二战中失去兄弟又把两个儿子送去越南服役；按照同事们的说法，他算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像其他阿肯色人一样，他也为有比尔·克林顿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想加入预备役军团感到高兴。他后来写道，他愿怀着骄傲的心情，“促成一位罗兹学者成为他团队中的一员。”霍姆斯仔细地向克林顿解释他们两人都很清楚的事——他必须被阿肯色大学录取才有资格加入这里的预备役。克林顿说他打算“入法学院”，他告诉霍姆斯他需要一段时间把牛津的事安排妥当，然后才能回到费那特维尔。“我也认为他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回到阿肯色大学”，霍姆斯后来说。

据克林顿自己回忆，他向霍姆斯保证“至少每月和他联系一次”。霍姆斯说他立刻就会着手办理克林顿的正式申请的程序并通知温泉城有关部门他新的缓征期。但他补充一句，在阿肯色大学录用他之前他不能在英国滞留太久。

“我不可能拖 1 年时间”，霍姆斯说他当时向克林顿交待得很明白，“那不合规矩”。

7 月 17 日对费那特维尔成功的访问还不能说解决了一切问题。霍姆斯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第二天”他就开始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温泉城征兵局的人在电话里说，“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很关心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加入预备役的事”，霍姆斯记得还有这样的话，“富布赖特参议员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也需要帮助。”不知道这是不是奥佩尔·埃利斯说的“报复”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永远也无法证实了。但上校本人清楚地感觉到这中间各方面的政治关系。“我曾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他后来肯定地说，“然后我做了必要的安排。”到 7 月底，预备役军团正式发出威廉·杰弗逊。克林顿 1-D 级缓征通知——“成为大学生接受军训的预备役成员”——这是征兵局同时注明的，8 月 7 日是正式的入伍时间，但就是这个期限在最后一刻也被取消了，他到底还是逃避了应服的兵役。

1969 年 8 月 7 日，克林顿签署了一份要求加入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官团的文件，几天之后拿到了合法的文件附本。整个夏天他都用来提申请做测试，这是进法学院所必需的，在 1992 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声称自己是因为学术成就达到了才被法学院“破例”接受的——尽管像他这种学历的人从未得到过这样的特许。他连一件有形的学术成就也摆不出来。

“他为自己做的就是争取更长的缓征期，一直到战争结束”，传记作家查尔斯·艾伦和乔纳森·波蒂斯在写到这次免役时也是直言不讳的。

克林顿又立刻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中，8 月里，他频繁地打电话给牛津的朋友，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他未来工作班子中的成员，就是他在 1992 年就他们之间的对话在《时代》上撰文支持克林顿。“他拿到预备役军官委任状和法学院的录用通知时内心非常不安”，塔尔伯特说。“有些地位没有他这么特殊的小伙子这会儿却在本该由他占据的位置上迎接越共的子弹。”

1969 年 9 月 9 日，在他正式加入预备役军团一个月后写给牛津的同学里克·斯特恩斯的一封信，被塔尔伯特形容为“说话前后矛盾……混乱。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谴责”。他用自嘲的口气谈到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转学阿肯色，怀疑自己同意进费那特维尔的法学院是不是“有抱负的政治家该做的事”。其实，小石城那些将来在商界和政界与他密切合作的人们，当时也正

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在写给斯特恩斯的信中描绘了温泉城那个令人痛苦的夏天，“这里的人除了小孩子以外似乎都在军中服役，大部分在越南。”

克林顿说他恐怕是“平生第一次在逃避什么”。就在与霍姆斯达成协议 1 个月后他还对斯特恩斯说，他现在觉得接受预备役军官团的庇护归根结底是个错误。“我可以说已下决心要回到英国去，我要试一试……没有什么比留在这里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的了”，他对朋友说。“如果不能摆脱这个，还不如上前线一了百了。”

在给斯特恩斯写信 3 天后，他在斯卡利街家中的一个不眠之夜给温泉城征兵局主席写信。克林顿自己在两个月后说，他在信中写道，签署申请加入预备役的文件是“自我妥协的结果”，“比征兵局的决定更可恶。”而事实是，他对收信人这么说，他对预备役军团本身并无兴趣，只是想“逃避肉体可能受到的伤害”。鉴于他自愿放弃预备役和缓征待遇，他希望能“尽快被送到作战部队去”。在这封午夜之信的最后，他诚挚地感谢主席“在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内仍试图给予的帮助”。

克林顿到底还是没有发出这封向征兵局主席表示忏悔和献身国家的满腔热情的信。

“我每天都揣着这封信，直到登上飞往英国的飞机”，再后来他是这样讲的。“我没有发出那封信是因为我看不出……就是真去了越南，除了满足自我惩罚的欲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场外又能有什么呢。”

9 月 20 日，几乎就在那封未寄出的信写成一周后，尼克松总统宣布，1969 年剩下的日子里不再征召新兵，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也不再应征，尼克松警告，如果国会不立刻改变征兵制度，他将用总统令的形式发布。全国各报都用头版头条对国会宣布 1969 年 12 月：日起实行的新的抽签式兵役制表示欢迎。

☆☆☆

在 9 月那些以怨愤为基调的信件和电话交谈的不悦气氛中，克林顿踏上了返回牛津的归途。在华盛顿稍作停留时，他自愿参加了债务延付委员会总部的工作，准备在 10 月中旬召开全国性反战集会，然后在 11 月 15 日组织 100 万人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行。这时的反战运动已不限于学生和要求变革的人参加，更多了一些温和派和年长的富有的美国人。针对虽然还想打下去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尼克松政府，1969 年的延期偿付派已逐渐成为记者们所谓的“主流势力”——照托德·吉特林的话说，“地方上连续不断的示威游行、和平祈祷和请愿运动，造就不少有威信的演讲者和令人同情的媒体形象。”克林顿此前不久才邂逅组织者之一，老资格的活动家戴维·米克斯纳——他称米克斯纳为“我亲密的朋友”，但他们基本上还互不了解——他们暂时在一起工作是为了互相沟通一下国内外的情况。

华盛顿的超时滞留误了牛津的开学时间，尽管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尼克松新的征兵制上，可他仍觉得心里不踏实，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记得，“那年秋天克林顿才在牛津露面，由于对未来几个月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甚至没有找住处。有一段时间他和斯特恩斯和另外几个人合住，“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日子”。

也就是在那个秋天，他利用牛津的假期游历了奥斯陆和挪威各地，在那里他碰上了理查德·麦克索利，乔治敦大学的耶稣会教授、和平活动家，当时他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各个反战团体。克林顿自愿做了麦克索利

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许后他们一起访问了奥斯陆的和平研究院，并与一部分美国柜服兵役者交谈，并与挪威的和平团体和大学生有过接触。“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麦克索利记得离开挪威时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11 月 16 日，参加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前有 500 名英美人士组成的示威活动的第二大，麦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顿，这次是英国各教派集体进行的和平祈祷活动。“比尔·克林顿……走上前来欢迎我”，麦克索利神父写道。“他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0 年后，有人对他的“反战”活动有所怀疑，克林顿对《阿肯色新闻报》说他只是“观察”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不管他给麦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报上怎么说，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参与过“演讲会”之类的活动，有一次还把反对战争政策的美国大使乔治·凯南请来给美国学生讲话。他帮助延付委员会组织了伦敦 10 月 15 日和 11 月 15 日的两次活动，还成为伦敦美国学生召集特别集会的发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调和矛盾。就在他伦敦发言的前一天，英国的反战团体也要在同一地点举行要求美国从印支撤兵的活动。

但比尔·克林顿劝大家不要参加，说“那样做太过激了”。

“他们的那些活动可算是对当局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在追记牛津岁月时写道。“他不属于那种极端狂暴的组织者”，同是罗兹学者的克里斯托弗·基，后来的支持者说。“简·方达去河内还不是一样，没有人说那是对国家的不忠。”事实上，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顿和他的意气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恶来反对战争，他们决不会把今天叫嚷得很凶的那些原则贯彻到他们将来的人生实践中去的，除非它们不碍事，“他们干什么都嫖在一块儿，他们左右逢源，没有任何风险地把抗议活动翻来覆去地玩弄”，说这话的是戴尔·马丁，牛津 1968 年—1970 年间反战运动的领导人，他不但认识克林顿，而且也认识塔尔伯特和他们那一帮人。“他们是些上了保险的人，坦白讲，我不能容忍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他们还要在引发这场战争的社会里为自己谋求一个位置呢。”

在秋天的示威活动期间，克林顿终于找到了固定的住处，很快和塔尔伯特以及另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研究亚洲问题的罗兹学者，年轻有为的弗兰克·阿勒一起搬了进去。

他们合祖的这套旧公寓在莱克福德路 46 号，室内景象犹如一幅牛津生活的漫画——每个人都胡子拉茬，60 年代的唱片集上有一堆一堆的蜡烛泪，克林顿的床垫就直接放在地板上，电暖气很费钱，但不用就抵不住英国的严冬。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临时家庭的人员构成都是很有趣的。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资银行家和重要的共和党人士的儿子，尼尔森·斯特罗布里奇·塔尔伯特三世，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亏了他家乡的征兵局收到克利夫兰一位整形外科专家的信”，有人这样说：“失意、反盛反叛，这样的事和这个年轻人毫无相干。”塔尔伯特一直在那鲁研修俄语，在牛津他正参与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为《时代生活》杂志翻译由中央情报局走私进来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此书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冷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使年轻的斯特罗布本人作为《时代》的记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阿勒，与财团显贵没有任何联系，他有的是

更深刻的东西，他是“那种你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朋友戴维·爱德华兹说，他也是“为我们大家付出代价的人”。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主义钢琴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精通中文，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人长征的论文。他身上还有许多优点——文雅、和善、彬彬有礼。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个“保守的肯尼迪民主党人”，在华盛顿州东部旧派的斯波坎长大。“我们都属于伴着约翰·韦恩的影片长大的一代”，克林顿说，但阿勒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表现出“适度的道德责任感”，弗兰克和比尔是很亲密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关于越南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甚至克林顿引诱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阿勒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却不以为然。就在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就职典礼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征兵局发出一封 3 页长的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加入美国武装部队……我还相信终有一天与此事有关的人们都不再盲从。”在信中他可能还提到克林顿本人与他在事业与道义之间两难选择截然不同的情况——虽然已很难说清他和其他人对阿肯色那里手忙脚乱的交涉和幕后交易知道多少。阿勒哀叹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我们许多不赞同美国军队介入越南政策的人却受到可能危及我们缓征待遇的法案的制约，而且不管政治上和道义上对战争的谴责，仍继续执行征兵条例”。

事实充分说明阿勒说的一点不错。

但是说到底，使阿勒和莱克福德同屋其他人相区别的是勇气而不是眼光。他在家乡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用不着找什么宗教或其他理由，因为他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这场战争。“最后”，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在他发信的那一天，克林顿和因身体不合格而免役的罗伯特·赖克一起为阿勒举行晚会。“那是一场喧闹的聚会”，有人这样形容，”他的蔑视在牛津被传为佳话，对一部分人也算是一个提醒。”他们中最有能力的成员成了抵制官方的人。

阿勒的行动对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个圈内的人的种种权宜之计、他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都是一种反衬。“他们中决无肯冒失去前途之险去抵制什么的人”，亚历山德拉·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别人也许会利用弗兰克去抵制什么，但前提是自己没事。比尔如果抵制什么的话一定会反复掂量，左右权衡。他比别人要更多地考虑后果”，一位认识他们的女士说。“弗兰克才是对抵制战争确实做了些事情的唯一一位罗兹学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险，”同事戴维·萨特多年后对记者说。“猜猜为什么？他做的是没有人在乎的事，”戴维·爱德华兹“刻薄地”对同一位记者说。

有一段时间里，克林顿以为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但他在征兵问题上耍的花招还是与弗兰克·阿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作为一条退路，1992 年他对加里·威尔斯说，他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记者。

“至少我能对时代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他说。但这大可不必。

同年 10 月——有人说是在月中，也有人说是月末——克林顿让温泉城的家人通知征兵局，他希望恢复 1-A 级状态，以便接受 1969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选征制的挑眩兵役局在 10 月 30 日正式将他重新列入 1-A 组；在这期间，他并没有与弗那特维尔的霍姆斯上校联系过。到目前为止，霍姆斯和

预备役军团仍以为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还是要进阿肯色法学院和预备役的。就是在征兵局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虽然参加抽签，他也可能抽到后签，即使抽上，他还可以转而履行他对霍姆斯的承诺，不管有没有 10 月的 1 一 A 期限，他都享有预备役的缓征待遇，即使在实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签面临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后决定——尽快通知霍姆斯。

整个 11 月是紧张的倒记时。良心的不安明显减少甚至消失。塔尔伯特——自称“我的瘸腿……能让我逃脱湄公河三角洲却无法让我避开牛津的墙网球和运动潮——还记得 1969 年感恩节期间克林顿和阿勒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的样子，两个朋友在厨房里给待烤的火鸡涂香料油，一只要涂三四个小时，因为那些关于爱国主义、公民责任和战争的话题总也说不完。

几天之后，阿肯色温泉城的咸廉·杰弗逊·克林顿生日那天，在选征制抽签中抽了个第 311 号——离可能被征的号差一百多位。第二天上午他欢天喜地地给那鲁法学院发出一封下学期的申请信。12 月 3 日，几易其稿后，他给弗那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发出一封解释信。12 月 4 日，弗兰克·阿勒因逃避兵役受到斯波坎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

在室友们的记忆里，阿勒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消息。但莱克福德路没有再举办晚会。

☆☆☆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以及和他情况相同的人都没少给自己家乡的征兵局和政府官员写信。有的还是写给远在他乡但又对当地政坛很有影响的人物，事情的成败要看他们是否认真努力给办。“像这样的信往往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用心写就的，比他们在牛津做的任何事都认真”，一个见证人说。“如果细加观察，会发现这些信写得都很真诚，有些还是愤世嫉俗的”，另一位读到过这类信件的人说。那些将来肯定要走上仕途或经营之道的人——对他们来说，冒失和不守规矩是不受鼓励的——对征兵问题所发的议论，不管是工于心计还是想出风头，多少流露出一些他们的真实想法。“说到底”，戴维·爱德华兹说，“那算是我们第一次对是非的判断。”克林顿致尤金·霍姆斯的信正是这种情况——字里行间，有时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的为人以及今后将会成为怎样一种政治家。

他一开始先向慈父般的上校“道歉”，“我当然记得向你允诺过的每月至少和你联系一次，从现在开始你肯定会看到我履行诺言的，而我必须在这第一封信上多花些工夫。”

“回到英国后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考虑写这封信”，他要感谢霍姆斯“不仅为了在征兵问题给予的帮助，而且更为了那年夏天对我的关怀和友善”，这一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对这位参加过菲律宾战役的老兵说，“你对我们共同信奉的原则所抱的坚定信心，不但使我有很大的认同感，而且也使我对你个人产生极大的尊重。”

他自豪地向弗那特维尔的霍姆斯提及，他曾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过。但有一点他在那年夏天去上校家登门拜访时没有说过，“我做那些工作是为了取得经验和钱，但也是为了能有机会，虽然不多，为抵制那场我所反对的战争做一点事，我有一种自责，因为我强烈地感到我是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而获缓征的”，他对霍姆斯说，“我并没有把这当儿戏，而是认真考虑才

有那种感觉的，当时并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了解越南的情况。”和欧美包括亚洲的越南问题专家比起来，他说这话无疑是不知大高地厚，同是这个人，23 年后对曾经自诩很了解的问题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如果说 1969 年他能给一个他认为并未受过什么教育的军人留下些好印象的话，那也提示出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克林顿式的虚张声势，这种靠耍小聪明或能说会道造成假象也许会在一时一地打动某些缺乏自信的人，但它也掩盖了一种浅薄，一种地方性的狭隘的自以为是，一种对看到。

感到但却未必真正理解的东西的一知半解。

他接着坦白曾“为反战写过文章、发表过口头声明、参加过游行示威”。这使霍姆斯意识到，当初见面时他们的“尊敬也许并非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到 1968 年春以前，他对当兵一直是持“拒斥态度”的，克林顿还提到他在乔治敦时做的一篇学期论文，讨论的就是“拒服兵役”的问题。但是，对 1968 年 3 月温泉城的征兵令以及雷蒙德·克林顿在地方上各界进行的频繁活动却只字未提。

“从工作实践中我认识到，征兵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一个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府有让其公民为他们所反对的战争流血牺牲的权力，因为这场战争可能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并没有马上给国家带来和平和自由。”所以，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征兵倒是合理的，“因为人民的生活从总体来讲处于危险当中。”但“越战不是这种情况”，1950 年至 1953 年间的朝鲜战争也不是，“当时采取的军事行动是适当的，但征兵不是”。

克林顿告诉上校，他对那些拒绝“为他们的国家（某届政府采取的特别政策）的处置不当而去流血牺牲”的人们怀有“极大的同情”。他说他在牛津的两位年轻朋友就是拒服兵役的人，他曾为其中的一个给密西西比征兵局写过一封辩白的信，“那封信是我在牛津期间写过的文字里最值得我自豪的。”他还告诉霍姆斯，“我的室友之一就是位抵制兵役者……现在可能正被起诉……也许再也不能回家了。”没有点名，但他说的是弗兰克·阿勒。“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勇敢最优秀的人。他若被判有罪实在是说不过去。”

下面的话活画出克林顿自己在做不做抵制者问题上的两难心境。“我决定违心接受征兵令的原因是：在这个体制中保住我的政治前途。”接着他描绘了自己准备过怎样一种在政治能力和推动社会快速发展两方面都很有特色的政治生活。“那是一种我认为值得追求的人生”。这时，年轻气盛的比尔·克林顿又加上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大话：“尽管危险和不足在这些年里一直存在，但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就该被定义为腐败。”（社会上也许有腐败，但那不是一回事，如果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接到征兵令时，我为将要去参加一场我反对的战争而心情烦乱，”他接着向霍姆斯解释，但仍不提在那段“心情烦乱”的日子里进行的密谋策划。他去费那特维尔登门拜访霍姆斯是其中关键的一步。“预备役是留给我的一条出路，是一种可能性，让我既能避开越战又能免做抵制者”，他写道。又一次忽略了基本事实——通过改 1-A 级为 1-D 级拖过夏秋两季直到抽签兵役制实行，预备役当然是一条出路，它既可以避开令人厌惧的威胁生命的战场，同时也可使他免担可能毁其政治生命的坏名声。

要么回牛津继续学业要么加入预备役“让前功尽弃”。

“我回到了这里”，他在 12 月寄自牛津的这封信中说，“我只能选择阿肯

色法学院，因为我别无选择。”他也许会“拿出一年时间到某个小学院里教书”，或为“某个社区行动计划”工作，然后再决定是进法学院还是进研究生院，那时再考虑“怎么把已经学到的东西忘掉。”而信写到此还是没触及那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几个月没给霍姆斯写信，为什么根本没有像商定的那样向阿肯色大学提出申请，为什么要回英国等候时机以及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致信温泉城征兵局改变缓征去抽签。

克林顿在写给上校的信中说，他 8 月签了那份申请加入预备役的文件后，立刻就对自己的无原则“产生了疑问”。

他承认对预备役军团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为了免受“肉体上的伤害”，“而且我开始感到我是在欺骗你”，他在信中说，“不是用谎话，因为我并没有撒谎，而是没有把我现在讲的这些都告诉你。我怀疑自己当时的言谈举止己把内心活动透露出来。”这些可以说是与那年八九月间曾向里克·斯特恩斯和斯特罗·塔尔伯特表达的忧虑心情类似的思想活动，从回英国“等机会”到参加抽签前没告诉霍姆斯取消预备役申请,他从这一过程中已看出自己“道义上的脆弱”。

“当时，在你我达成协议，你把我的应征等级 1-D 送达征兵局之后”，克林顿回忆道，“失去自尊和自信的我确实痛苦至极。有一周的时间我吃不香睡不稳，只好拼命读书，直至不知不觉地睡去。”

这种周期性发生危机的模式是他以前经历的磨难的重演，不过是那些反战运动参与者和他的牛津同事——也许除了经常被他的远方来信或电话所扰的斯特恩斯和塔尔伯特——在 1969 年的夏末秋初之前没人向比尔·克林顿点破罢了。

他也向霍姆斯说起那封彻夜不眠写出来但一直带在身上没向征兵局发出的信。“我没发信，因为我看不出即使上了前线，除了满足自我惩罚的欲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场外又能有什么呢”，他写道。“所以我回了英国，看看我这个罗兹学者在第二年还能做些什么。”还是没提尼克松 9 月 20 日宣布免除在校研究生兵役后参加抽签的事。

在结束这封信 12 月 3 日的长信时他说，把这一切都告诉霍姆斯是“因为你一向对我那么好，有权了解我的所思所感”。他最后还想让他曾充分表达出来的，而且也确实使这位阿肯色指挥官高兴的，对军中老前辈的敬仰之情起一点儿作用：“我写这封信是希望我讲的故事能让你切实感觉到，有多少优秀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仍深爱着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某一次令人厌恶的军事行动，对这个国家，你和其他一些好人贡献了你们的岁月和时光，尽了你们最大限度的义务。而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什么是尽义务什么是帮倒忙已不再是一清二楚的事，或许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结局往往是不得人心的。”

像当时许多类似的表态一样，话是深深打动了不同时代、不同知识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但像所有表面文章一样，最终将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当时当地他还羞于承认，这么多年过去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确实逃脱了他所耍花招会带来的最糟的后果，但他本人及他的总统之路仍将为他致霍姆斯信中暴露的伤口付出代价。

他用一个俗套的、近乎冷漠的段落作结束，把他是不是婉拒预备役和不再去阿肯色法学院这个关键问题悬在雾里：“原谅这封信写得这么长。要说的话还大多。还有许多未尽之言。好在来日方长。请代问琼斯上校好。圣

诞快乐。真诚的，比尔·克林顿。”

霍姆斯气愤地撤销了克林顿预备役的录用程序。他没有及时给这个远在英国的阿肯色年轻人回信，但他在多年后还能根据记忆对新闻界谈他当时的感受。“比尔·克林顿能够操纵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位退休的上校对记者说。“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加入预备役军团。他做出了保证然后又食言。”

1992 年 9 月，年老多病的尤金·霍姆斯，虽然在总统竞选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显然是不投比尔·克林顿的票的，经过宣誓作证对此事做了“最后的说明”，他描述了两人在费那特维尔两个小时的谈话内容以及作为预备役下属单位和温泉城征兵局所受的“压力”，指出克林顿“有意欺骗我，以加入预备役为幌子……骗取军方信任……既遮掩他在海外进行的反军方行为，同时也拿虚假的从军意图大做文章。”到现在为止，上校已不是对党派之争和曲解的历史有所醒悟的唯一的一个。“真奇怪，当弗吉尼亚被问及她儿子曾申请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和加入预备役的事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当他从牛津回来准备去耶鲁时我真有点儿糊涂。”

☆☆☆

恐越症缓解之后克林顿在牛津轻松地过了一个学年。

用 12 月至次年 1 月的假期，他短暂访问了莫斯科，这次学生访问后来被共和党竞选对手大加利用。在牛津的一个阴雨天，他和里克·斯特恩斯一起谈诗，克林顿提议去探寻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出生地，他们在一个雨天出发，连搭车带步行，用了几天时间做了一次穿越威尔士的旅行。

1970 年春，他和斯特恩斯乘公共汽车游览了西班牙，读着导游图，亲自踏勘了西班牙内战的战场，斯特恩斯说，这次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大大改观”。“我们两人都感悟到除了简单的对与错之外还有许多更复杂的东西”，斯特恩斯指的显然是佛朗哥对共和国的法西斯统治。对克林顿来说，他的这位旅伴是牛津朋友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里克·斯特恩两年后的一笔赞助金使其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总统竞选班子的权威和当地很有利用价值的政治显贵。

大家对克林顿在牛津的两年里留下过各种各样的记忆，但唯独不大记得他在知识探求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

“我读了差不多 300 本书”，他曾说过，但这只是数量概念，与对思想内容的领会尤关。值得注意的是，像在华盛顿时一样，英国人也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自我训练中的政治家看待，因为“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是政治家化的”，在争论中，将新的观点分析集中，“总能得出……所谓适中的结论”，他的牛津朋友彼得·海斯说。注意到比尔·克林顿在大学学院的餐厅饭桌上神侃不休的效果，道格拉斯·埃肯利认为他对英国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恐怕是那里最受欢迎的美国学生了”。但凡事都有两面，也有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这种广泛的交际的，“这其实更像是‘买哄人心’”一位记者引用同是阿肯色人，后来成为对手的克利夫·杰克逊的话。“克林顿和他同时在英国的那帮人中有不少是粗俗之辈，他们自私自利，让你腻烦”，这就是杰克逊和其他人的结论。

“我们那时经受的内心痛苦简直不堪回首”，提到在牛津度过的那几个月的征兵期时克林顿仍心有余悸。他 1970 年离开牛津，没有学位，去了耶鲁。作为流亡者，弗兰克·阿勒仍滞留欧洲，“忍受了几乎把我吞噬掉的孤独”，

这是别人引述他的原话。他在：1970 年 10 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可不想变成一个老掉牙的老头，念叨着已无人记得的褪了色的理想。”到底谁是那个“拒服兵役”的罗兹学者？

他在这之后的一封信中嘲弄地问道，他指的是大家都很了解的那位相对来说在各方面更有适应能力的室友。“我不敢肯定”，回信者也用阿勒那种揣测中又带嘲讽的语气回答。“你说的那个牛津的家伙难道就是后来的克林顿州长吗？”

阿勒最终还是回了美国，好笑的是，就在他体检不合格的那天也撤销了他逃避兵役的罪名。他和克林顿在加州举行的莱克福德路室友聚会中有一次简单的晤面。但它带来的心灵折磨恐怕要多于重逢的喜悦。1971 年 9 月回到斯波坎，就在他与比尔·克林顿热烈地交换关于义务和命运的看法两年后，弗兰克，阿勒静悄悄地借了朋友公寓的钥匙，那里有一颗即将穿过他脑袋的子弹。

☆☆☆

“比尔·克林顿与情报部门的联系早在牛津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位接触过那些已毁档案的政府官员说。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尖锐看法。未来的总统在英国的最后几个月确实显得有几分神秘，有些难以解释的前后矛盾之处——尽管肯定和否定这两个极端在某件事是否确定发生过这一点上都含糊其词。

除了征兵问题，整个牛津岁月还有在 1992 年竞选时引发争议的问题。共和党人翻查了护照资料，想调查弗吉尼亚可疑的旅行，结果没有找到对克林顿不利的证据。乔治·布什本人在 10 月里曾要求民主党候选人发表一次全国性讲话，告诉他的选民“在外国土地上他参加过多少次反对自己国家的示威游行”，想以此给克林顿 1969 至 1970 年间的莫斯科之行和他在反战集会中所起的作用扣上令他身败名裂的不爱国的罪名。

60 年代，中央情报局搞的臭名昭著的“混乱行动”也是众矢之的，这中间一直有国内外反战活动中不名誉的外来势力的操纵，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学生中招募告密者和煽动者。“把那些学生后面的共产党经费和组织者给我揪出来”，林登·约翰逊在他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周三共进午餐时下过这样的命令。中情局依令而行，通过国内外非法设立的情报网以及欧洲的分支机构把命令传达下去——特别是那些有大量美国学生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以及拒服兵役者聚集的瑞典等国家——主要是雇用美国学生渗透进海外反战运动，实际上就是当特务。

至少有两位情报站负责人和副手承认，他们确实接到过这类命令和指示。对年轻的告密者提供的诱饵除了现金支付报酬，地方征兵局的照顾，甚至将来就业等更广泛的全面协助等等。“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经费和食宿方面的方便（这要看有关部门是否合作）”，一位前中情局官员说。“大部分情况下，情报官要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提供的服务将在今后的日子里作为参考。你应该知道，如果中情局说提供帮助，那一定是在未来的事业方面，功劳和成绩是有适当记载的。罗兹和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将来要成为大人物的，他们知道提供服务会带来的好处。”

中情局的情报站一般都受到这样的告诫，不得干扰东道国情报部门监视反战活动。

在英国，中情局与英国相应部门达成过协议，不在对方版图内进行秘

密活动，白厅的军情五处就坚决反对中情局在英国土地上招募美国公民，也不支持在英国大学里从事谍报活动。根据 1967 年至 1970 年间在职的许多中情局官员的回忆，“混乱行动”曾巧为谋划避开秘密协议，让驻英美国大使馆情报站与牛津剑桥和另外一些大学里的美国学生联系，据一些曾被试探过的人向英国人说，试探遭到“拒绝”，这些人都是反战的，都认为学生有权做口头的抗议。“事实上”，中情局一位高级官员回忆，“我们都是回国去找真正能干的小伙子。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可英国佬一直对这种办法不以为然。”不管怎么样，事情真办起来要严格得多，在联合王国内招募学生告密者有比在那里做谍报工作还要严格的安全措施。“很少有文字的东西留下来，经常销毁文件，有很多保护措施”，一位官员回忆，“由于英国人的敏感，这些小青年都是被当做高级探员对待的。”

官方经与中情局商定后公布的关于比尔·克林顿在牛津的情况说明仍让人听起来一头雾水。一位前任情报官说到这位未来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年轻人时称他为训练有素的“难得人才”，他定期“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如此说来他恐怕出卖过他那些参与和平运动的美国朋友。同样，在与麦克索利神父一起访问瑞典时也出卖过那些抵制兵役的人，再有，1969 年底他利用假期访苏时是在红场对面苏联旅行社的民族饭店下榻的，房费想必是有人替他支付的——乔治·布什若有类似旅行肯定会被描绘成颠覆行动。一个来自温泉城的穷学生能住民族饭店，这在阿肯色人听来也难以置信。小石城一位专栏作家在得知此事后发表评论说，“就是在家乡小镇上食宿条件最好的饭店开房间也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在苏期间他与另外两个美国人不期而遇，一个是弗吉尼亚州的承包商查尔斯·丹尼尔斯，另一个是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他寻找在北越失踪的儿子的农民亨利·福斯。

克林顿是被安排在一般用来接待显要客人的房间，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来访目的和意图。他只是到处逛逛，但总是又累又饿的样子”，阿肯色的记者梅雷迪斯·奥克利引另一位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学生的话说。

另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记得他在兰利总部的“混乱行动”的档案中看到过比尔·克林顿的名字——70 年代中一次不公开的国会调查销毁了一部分档案——用阿肯色代理克林顿案件的律师的话说，以前的告密者通过苦心经营已进入重要的政治班子。“他在那里是有案可查的”，那位前官员说，“并且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另有来自中情局人员的消息说，“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明白吗？即使抽签抽到前号，即使预备役军团的事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告吹”，这位透露消息的人如是说，克林顿成为密探后已在征兵问题上有恃无恐，“因为中情局在必要时可以让他获得缓役，这毫无问题。”

差不多 25 年后，有好几位中情局人士都承认，60 年代未在英国大学里的美国人中有几个被发展的告密者，现在即使没有进入最高层也已爬到相当高的地位。“让我们这样说吧，今天美国政府中的高层人物是从做反战运动的告密者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一位对克林顿本人的作用有所怀疑的前官员这样说。“克林顿属于有正式联系人的告密者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人”，另一位前任办案官员说。“我不能也永远不会告诉你那些人的姓名，但我肯定说出来你肯定认识。”

☆☆☆

到他 1970 年返回美国时，他是怎样的人以及将会成为怎样的人也就更清楚了，关于生活和事业，哪些属添油加醋哪些是欲盖弥彰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后看来，关于越南问题的各种意见，唯独他的那些最没有意义，无论是从对外政策上说还是从决策上说或是从历史上说。他只给人们留下一个不着边际的虚象——文雅、有人缘，乐于取悦别人，聪明而不极端，博闻强记但不哗众取宠或激怒别人，很能与环境协调一致。他后来的对手们并不抨击他，多是抱怨他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很少有人指责年轻的比尔·克林顿是“激进派”。

在征兵问题上，克林顿确实经受了内心的折磨。1968 年与他同去牛津的罗兹学者中，如果不能说是绝大部分的话，很多都享受了不同程度的特权，很多地方的美国学生迫于政治压力都做过相互伤害的事，无非是为了躲避那场战争。华盛顿几个共和党对手，如得克萨斯的菲尔·格拉姆参议员，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在那个时代都做过逃避兵役的事，正如后来的记者说的，“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道义上的歉疚或良心上的自责”，对战争的正确理解就更谈不上了。

克林顿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的确是怀疑那场战争的，所以也就怀疑他们可能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但是，他们对造成那场战争的，以及他们在战后所要继承的美国却没有丝毫的·怀疑。“激进化意味着要树立一种坚定的信仰，即社会结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像越战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种征兆”，60 年代一位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约瑟夫·康林写道。

对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在东南亚服役的人来说，战争决不是什么不干涉政策，它还告诉我们：两大党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是怎样的狭隘和无知，那些中饱私囊的巨额利润是怎样流动的，政府与政策之间，体制和文化上的裂痕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越南问题并没有把克林顿以及他周围同样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即成为他后来工作班子成员的人激进化，更没有使他们对本世纪末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970 年春的入侵柬埔寨激发了又一次反战高潮，使尼克松政府陷入停顿状态。然而，转过年来，征兵明显减少。

美国军队战斗死亡人数从每周 200 人降至 35 人，这一切都与反战呼声增高有关。但托德·吉特林却认为“征兵局权限的衰退与反战活动关系不大”。不管因果关系如何，削减的预算不允许尼克松政府再进行 4 年的血腥战争，死亡的美国人又成倍增长，典型的“越南式”大轰炸已在亚洲造成近百万的伤亡。

如果说当时克林顿在道义和事业上留下深深的创伤还是看不见的，但它们会在后来的血雨腥风中复发。在牛津的饭厅，在莱克福德路，在伦敦各种各样的集会上他说了许多，在致霍姆斯上校的信中严肃地讨论问题，卖弄对某个问题的独特认识，但作为七八十年代初露头角的政治家出现的比尔·克林顿却再没有就那些困扰他青春岁月的深刻的。

决定性的关于战争和平以及政治责任等重大问题表态，尽管他并不乏深入探讨它们的公开场合，包括阿肯色的竞选集会和全国性的论坛。

一旦征兵危机过去，一切就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六　帕克里奇——“她不得不迁就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多萝西·豪厄尔和休·罗德姆是美国的牺牲品，更是大萧条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弗吉尼亚·卡西迪和比尔·布莱思没什么区别。

多萝西·豪厄尔既可以说是有着法国血统的威尔士-苏格兰后裔，也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19 年她出生在芝加哥南的蓝领阶层居住区。父亲是消防队员，母亲有一半加拿大血统，几乎一字不识。后来，随当时的移民潮，举家来到加州南部。在洛杉矶盆地的阳光下，多萝西在有苦有乐的希望中成长。在阿拉姆布拉的高中，她是奖学金的获得者，一位令人羡慕的运动健将和学生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一毕业她就离开了西海岸，像有人说的，她从不“伤感”地回顾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苦难。聪明漂亮、带着迷人的微笑和坚定的独立精神，1937 年，18 岁的多萝西又回到了芝加哥，在哥伦比亚花边公司当秘书，就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位名叫休·罗德姆的聪明、严肃、又有些闷闷不乐的年轻窗帘推销员。

他比她大 7 岁，在一个严厉而又贫穷的英国工人家庭长大，父亲 3 岁时就随全家从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郡的穷乡僻壤迁居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他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到斯克拉顿花边公司打工，后来，他跟一位同样来自英国的移民结了婚，新娘是一位十几岁时就在血汗工厂工作的纺纱工，整个家庭笼罩着英国福音派教徒的墨守陈规和当时令人窒息的共和主义气氛。休是家里 3 个儿子中的一个，又和父亲同名，他想靠橄榄球比赛获得奖学金去宾州主修体育。大萧条时期，他不得不辍学也到花边公司工作，正如一篇文章所提到的，移民的第二代只好“靠捡破烂儿攒零花钱”，不久，他就离家到宾州环境恶劣的煤窑里做工，有时也跑到纽约去找工作。后来，在芝加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领阶层推销员。

他曾与斯克拉顿公司的一个女子订婚，后来又告吹了。不久，他就注意到在办公室里总是面带微笑的多萝西·豪厄尔。他们相恋了五年，朋友们都说：“他们很浪漫”。

休在将近而立之年时，就显出那种节俭而又严厉的丈夫和父亲的本色。多萝西非常沮丧，虽处在大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也享受过一段短暂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可是后来，婚姻把她所渴望的平等和机会都无情地碾碎了，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她骄傲、有雄心，但却与一位“不理想先生”相爱。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她只是个打工妹，既惦记着罗德姆又想再上两天学。

炮声打破了她的上学梦，最后，1942 年，他们结婚了。

二战期间，休·罗德姆已拿到了体育学位，在海军的“吉思·腾尼计划”中负责新兵管理，那是一项以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命名的心理调节和自卫术的训练计划。在海军驻地，像罗德姆这样的教官都应该是严厉、苛刻、而又冷漠的——不动感情，满脸严肃，很少表扬人，很难接近，哪怕最微小的错误也不放过，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使士兵变得强壮勇敢，这正是国门外战争迫近的严酷氛围所要求的。

1945 年过后，罗德姆一家像战后所有人一样满怀希望，期盼多年的战乱之后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埃莱尼·泰勒曾这样描写这万众焦心的情况，“他们渴望在一个安全的国家里得到稳定的工作、住房和婚姻。”就像旅行推销商比尔·布莱思当年梦想享有经营汽车零件的特许权一样，休·罗德姆也准备做自己的服装生意。他开始向旅馆、大公司、航运公司等大宗买主推

销成衣。购买、裁剪、缝纫，他都亲自动手，甚至还帮顾客装窗帘。一般他只雇一个员工——像对待一位懒散的海军新兵那样严格要求，而且常常是暴跳如雷，虽然他也竭力掩饰。一位同行说："他很少帮助人，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中有一种很好的幽默感——人们都不是只以表面来看待他。"

从海军退役后，他和多萝西在芝加哥住了一阵子，那是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公寓，离比尔·布莱思的住处只有几英里。1947 年 1 月，多萝西生了个 8．5 磅重的女孩，她说"这个温顺可爱的小家伙是一个发育很好的新生儿。"多萝西一反常规，给孩子取名"希拉里"，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不同凡响的"姓氏。

三年后，境况改善，休带全家搬离市区，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走下坡路，因为他们来到芝加哥西北郊的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树木丛生，有着一个时髦的名字：帕克里奇。

为应付潮水般涌来的移民，在本来是采石场的地方盖起了木结构的、形状各异的房屋。

随着芝加哥和西北铁路的贯通，古老小镇为交通发达的郊区所取代，顺应地名称也由布里克顿改为帕克里奇。在整洁的小镇中心，小店铺和漂亮坚固的公共建筑鳞次栉比，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奖赏，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这样，一位居民说：我们不用服装道具就可以成为费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人物"，另一位当地居民说，"帕克里奇就是电影里的天堂。"

五六十年代，希拉里就是在这里长大，街上的孩子们不是战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就是从外地涌人的，希拉里家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居民。就在她家搬迁后的 10 年中，芝加哥人口增加了 20%，郊区更是人满为患，帕克里奇的人口几乎增长了 3 倍，已接近 40 万。

帕克里奇离芝加哥闹市区只有 12 英里，但它与整座城市，甚至与芝加哥东那些繁华地带是隔绝的。帕克里奇属于大都市的边缘，在它西南几英里外就是玉米地和苹果园，后来又建成世界上最繁忙的奥黑尔机场。意大利人、波兰人、墨西哥人、阿巴拉契移民、犹太人都各有自己的社区。

和其他郊区一样，帕克里奇也有隐秘和森严的阶级和种族壁垒。更准确地说，这里也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富有的白人新教徒是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相隔离的，这与你有多少不动产、收入的高低、经济特权的大小无关。

大体上讲，这里的居民多属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在他们中间，休·罗德姆虽然有着赚钱的窗饰生意，数年后也购置了崭新卡迪拉克轿车，但他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用他女儿的话说，除了他的缝纫机和窗饰生意，他并不与那些"律师、医生和印第安人首领"来往，20 多年后，她对记者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职业妇女这一说。"在日常生活中，多萝西，罗德姆觉得自己欠缺学历和知识背景，朱迪思·沃纳写道："她对自己如此缺乏自信，以致于很少说话，或只是做他丈夫坚定声音的一个忠实听众。"通常帕克里奇的母亲们都待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一位历史学者写道："在 30 年代和战争时期，独立妇女受到尊重，而现在她们却被看成是一群神经质的怪物。"

希拉里·罗德姆的儿时伙伴，谢丽·黑登回忆说："那是个清一色的白人区，我记得到高年级时整个学校才一个黑人孩子。"他们都经常到砖砌的有尖顶和彩色玻璃的教堂去参加主日学校的活动，长大后他们才意识到彼此是如此相像。有人说："我上大学后才感觉到那里的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模子

里出来的，这对我触动很大。”只有在合并的高中里——那里的学生来自邻近和其它地区，许多人才第一次接触到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来自蓝领家庭的孩子们。

帕克里奇的政治一直跟随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大家都以芝加哥传奇性的保守派人士、报业和广播业大亨罗伯特·R．麦科马克上校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一个政治分析家小组描述道：“这是一个白领地区，在这里《芝加哥论坛报》是精神食粮，孩子们是在对市政当局的‘民主’的恐惧和蔑视中成长的。”在一个因保守而出色的郊区，帕克里奇以其独特的教条主义和严酷，与芝加哥湖北岸的几个更富裕但政治观点却备异的郊区形成鲜明对比，这里严格禁酒，只能去偏僻的小镇才能买到。在地方、州和全国选举中，帕克里奇代表都是些以极右色彩闻名的《论坛报》共和派人物。

作为一个保守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来自穷苦人家的拔尖人物都格外嫉妒，50 年代，这个美丽社区都是极右分子、搞阴谋的约翰·伯奇社（约翰·伯奇仕 l958 年 12 月 9 日由波士顿人韦尔奇创建，以反对共产主义，提倡极端保守主义为宗旨。另有一说称约翰·伯奇系美国空军，1945 年在中国沦陷区苏州附近为游击队所杀，所以，美国的极端反共组织遂以他的名字命名。——译注）的发源地。他们猛烈抨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代理人，就是“共党工具”，他们把民主党看成彻头彻尾的叛国者。在帕克里奇，保守派的势力如此根深蒂固以致 50 年代以来右翼共和党一直占据该区的国会议员席位。哈罗德·科利尔，一家火柴公司前任人事经理和麦科马克上校手下的一个庸才，竟连任六届，直到 1966 年才由州下议院政客和谦恭的理论家亨利·海德接任，继任者又连任十几届，直到 90 年代卷入一桩银行丑闻——，他以“郊区利益的捍卫者”著称，也是国会山上老大党（共和党）右翼“最得力的干将”。

在芝加哥周围与世隔绝的地区——就像阿肯色辖区其他地方一样——家庭内外都被虚伪和阴谋包围着，父母儿童都按照广告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流行形象进行自我塑造，这与大萧条和战后对稳定和安全的渴求形成巨大合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那时深刻的政治现实。在许多方面，与冷战逆流和对外妥协相呼应的是，保守的男校家长制和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意识形态都非常害怕来自内部的反抗，这逐渐成为对付反叛的国家政策——通常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正像阿肯色民谚中告诫要遵循当地社会秩序一样，在帕克里奇，正统观念正就大家共享战后新的富裕和稳定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识——这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味反抗的人少了，关于阶级和财富的旧的基本划分似乎已经消失，美国的社会制度在国内外都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历史学者埃莱尼·泰勒·梅谈到郊区战后的混乱生活时说：“国内遏止政策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扶持起来的，这种文化奖励追随者，放逐反叛者”。

在这样的市郊区，自 50 年代以来也确实出现过危险信号——一种散布不满和虚无的文学正在滋生并影响人们，精神病科医生增加六倍而精神病患者的增加则难以数计，在青年中，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所谓的“代沟正在形成”。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帕克里奇及其他地方，紧闭着的门后，尤其是儿童和妇女开始学会去适应、去忍受——对他们的恶劣处境，甚至用精神

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显然他们很少想去改变深层的生活方式，或者去探究他们的失望和幻火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紧密联系。

美国最有权势的第一夫人就是从这种磨炼和禁锢中过来的——这一过程不免有些痛苦——那也正是一位未来总统当年走出风景如画的霍普和温泉城时所感受到的。

☆☆☆

罗德姆一家住在一座建于战前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二层楼里，这里很幽静，地处埃姆和维斯纳的一角。很快希拉里就有了两个弟弟休·朱尼尔和托尼，因为是唯一的女儿，她有自己的铺有光滑木地板的卧室，还有一个阳台，从那里可以望见四邻。就是在这里，她长成一个聪慧、果敢。

学有所成的女孩，她出自那样一种人文环境，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她母亲回忆当时责备她不敢面对邻居家的坏孩子时说："我们家没有懦夫，你必须勇敢面对他，下次他再打你，你就还击。"罗德姆家的这个小女孩遵照家训，确实这样做了，并以自己的拳头赢得了男孩子们的接受，因有机会与邻居的男孩一起玩而令别的女孩羡慕不已，多萝西不无骄傲他说："男孩子们对希拉里很好，她只是指挥他们，他们也乐意这样。"希拉里也打乒乓球，学音乐和跳芭蕾，组织邻里的"运动会"和其它活动，并和她的两个运动员弟弟比赛，有时也用她维妙维肖的模仿本领逗得大家开心，这一点也被她带人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在尤金·菲尔德小学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初中，她都"一直是老师的宠儿"，放学后，她虔诚地参加女童子军，并且赢得了一条缀满"奖章和闪亮别针的缓带"。玛莎·谢里尔说："很有趣，她走路从不低头。"星期天她又去卫理公会第一联合教堂。尽管有人说她"在接连不断的公共慈善事务中疲于奔命"，可是小希拉里·罗德姆看上去似乎"喜欢这一切"。在帕克里奇，儿童就应该这样成长。

她对随后的儿童时代的反应就不再是公开神话的一部分了，朱迪丝·沃纳写道，在维斯纳 236 号的那座房子里，多萝西·罗德姆成了镇上的传统"家庭妇女"和孩子们的"司机"，她自己说："我所有时间都在开车。""妈妈是鼓励者和帮助者，父亲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做女儿的后来就是这样平和地描述家里的这种"传统的父母分工"。

可是，外面的"消息"常常是严酷的，慈爱的母亲并不能帮助她的孩子们去对待作家尤罗琳·萨斯曼称作的"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时隐时现的存在"——一贯专断严厉的休·罗德姆。休·朱尼尔在他父亲去世后说："一家人融洽无间，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父亲是专爱较劲的那种人，从里到外都是这样。"

在希拉里成为名人以后，关于这个男人的许多回忆以及他的作用的各种说法也就多了起来——但在政治和个人决断上的过度渲染显失公允。但是，基本事实是没有错的。

诺曼·金总结说："休·罗德姆是个铁腕人物，难以接近，喜欢发号施令，虽然今天专制已不再盛行，休那时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父亲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的确很美好，只是他改不了自己的教官习气，他干什么别人就得干什么，别人对他的遵循似乎就是他价值的体现。马莎·谢里尔说，有一年春天，全家去当地公园玩，自始至终就站在那里看别人"投球、投球、再投球"，直到希拉里看会了投出带旋转的球。"后来她成为一个优秀

的游击手和击球员，她的棒球技术已相当高超，和邻居家那些不太懂的小球迷已不可同日而语，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教他们的。一位儿时伙伴说：“她知道童子军的每件事、每个人，并以此为荣。”

她的朋友们都还记得，休·罗德姆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女儿对股票价格的敏感，要求她仔细研究《论坛报》上的股票行情，以便进行“正确的投资”，有时鼓励她，有时则以他一贯的严厉态度责骂她，一切都看她是否“成功”！有人回忆道：“在他们那个小游戏中，赔钱会受到惩罚，她对这一行里的窍门学得很快。”另一个人则说：“对罗德姆先生来说，赚钱太重要了，这是他竭力向女儿灌输的观念之一，如果你赚不到钱，不管你再怎么能干你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希拉里曾用置身事外的很客观的语气称父亲为“现实支票先生”，她说：“有一次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我很需要一双新鞋，我的鞋上有好几个洞了。’他会说：‘你做完了该做的家务了吗？你做这个了吗？你做那个了吗？’”他经常提醒全家人他们现在条件有多么幸运和值得珍惜，而他的父辈们在大萧条时期又是如何如何艰难，有一次，他将孩子们带到宾州的一个旧煤窑，当年他在那里做过短工，那里简直像是恐怖幽灵出没之地，诺曼·金说“孩子们明白了他的意图”。托尼·罗德姆动情地回忆道：“我们可能是全镇上唯一得不到零花钱的孩子了，我们得扫落叶、修草坪、拔草、扫雪，而我们的朋友们那时都去看电影。干完杂活后，你进门说：‘哦，爸爸，我要二三块钱’，他会夹一块土豆放在你的饭盒上，说：‘这就是你的酬劳。’”他怕“宠坏”了孩子们，他的妻子说得更坦率：“他们在家里吃住不花钱，我们也不能不让他们干活就给钱！”

一篇文章里曾提到，一旦做错事，他们“偶尔会挨打或被剥夺某种权利”。邻居和朋友们都把休·朱尼尔看成是他家里的逆种——“就像一个小泼皮、小杂工”当地校长说——可是他的姐姐却是听话温顺的“优秀孩子”。希拉里曾对马里安·伯勒斯说：“我学得很快，很少拂逆父母的意志，他们严格要求我要听从权威，而不只是敬重父母。

父亲的口头禅是‘在学校里做不好，家里也不会做好的’。”

然而，在休·罗德姆海军新兵训练营式的家庭里，就是顺从和成功也未必能受到他一句表扬。当他的骄傲的女儿拿着全 A 的成绩兴冲冲回家时，他只是冷淡地说：“你的功课肯定太简单。”休·朱尼尔回忆说，后来，当她在大学预修课中取得优异成绩时，他会说：“这肯定是个小学院。”儿子们参加橄榄球比赛时，罗德姆瞧不起露天座位和那些家长，自己独自一人带上一把折叠椅坐在场边看球。后来，休·朱尼尔继续在宾州打球，10 回合中有 7 次过人传球以 40 比 0 获得冠军，当他回到维斯纳的家中，见父亲躺在沙发上，准备听那习惯了的责骂，“我对你无话可说”，他对孩子说：“除非你把下场球打好。”

几十年后，全家人和朋友们都试图更加温和地评价老休·罗德姆的动机，一个儿子说：“虽然他那样，可他并不怎么卑微或圆滑……他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还可能做得更好。”希拉里在一次谈话中引用她父亲的话说：“外面的环境是很严酷的，他的鼓励方式也是情势所迫。”然而，这种磨砺造成的深刻伤害，无论用怎样的言辞都是无法掩饰的。亲友中很多人都认为休·罗德姆的教子方式，简直是一种精神虐待，会毁掉儿童，并且带来负作用——在帕克里奇，情形确实如此。这与她未来丈夫在霍普和温泉

城时受到的连续的阵发性的血腥虐待有别，前者是更轻的且有些微妙的压迫行为，罗德姆一家与克林顿一家确实不同，希拉里后来告诉她未来的婆婆说，她家里“几乎每 5 分钟就有一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此话不假，只不过帕克里奇发生的这种从未间断的虐待更为平静，更加隐秘。传记作家朱迪思·沃纳认为，“虽然这样，可是她的精神坚不可摧。”有人不这么认为，一位资深观察家说：“我认为毫无疑问，当时的希拉里精神肯定被击溃了，问题是在她的位置上她是如何恢复的。”

家里人和朋友们习惯了罗德姆怪异的冷峻——这对他们固然有害，但也还能接受。

同样是受害者，她母亲和弟弟们却能理性地意识到希拉里身上正发生的一切，认为她与父亲的这种关系使她个性更强，并培养了她有名的坚韧果断和忍耐力。据家里人说，九岁时她就决心婚后依旧保留少女时的姓名，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比大多数人更坚定，善于处理事务，适应生存。。可是，这些并不能掩盖住其中的冷酷和痛苦，得不到爱护的感觉，离家出走的念头，时而温顺时而尖酸刻薄，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又冷嘲热讽，怒火在难以穿透的防护屋里紧紧地压抑着却又熊熊燃烧——所有这些在她日后独立的却又善于伪装的女性形象中都有所见。简·皮尔斯，自希拉里的童年和少年时起就非常了解她，她说：“她喜欢谈论思想，问问题。一旦谈到她自己，她就闭口不言了。是的，她可能问你问题，但马上又显得心不在焉。”另一位目睹这一切的女士也是这样说的，并且感觉到了希拉里曾受到的伤害。多萝西·罗德姆诚恳地评价她外向、坚强又能长期忍耐的女儿：“也许这正是她为什么如此容易被人接纳的原因。她不得不迁就他。”

一位观察家写道，父母“并没有区别对待她与她的兄弟们”，然而，旧的教育模式依旧存在，经休·罗德姆的许可，希拉里可做保姆、救生员、文体顾问之类的工作，但不得经营布业，虽然她的兄弟常干这方面工作，同时，朋友们都还记得，母亲经常煞费苦心，有意识地激发女儿成才的欲望，虽然成功的标准总是由男人来确定，多萝西曾回忆道：“我常像对待成人一样对希拉里说话。”弗吉尼亚·克林顿也有同样的记忆。这个在帕克里奇长大的女孩将成为她母亲在阿拉姆布拉、在芝加哥市郊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最重要的是，要在充满竞争，以貌取人，由男性统治的外部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其中的某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比结婚成家这类点缀更为重要，这也正是她母亲没有完成的愿望。多萝西后来说：“我决心不再让女儿遭受这样的痛苦，连心里话都不敢说出来。不能因为她是个女孩，就要受到某种限制。”

一位同学回忆道，60 年代初她们的中学是“一个大工厂也是一个专门追名逐利之所。

像他们富有的父母，每个男孩都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而上大学，女孩则为了结婚。

拥有他们那样的人才有的大房子和汽车”。以沉静、严肃而又忙碌的姿态出现怀有同样的期待的希拉里·罗德姆似乎轻易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某些方面，她又有意让自己区别于那些人。在东缅因学校读了 3 年，又在新建的有 4000 多学生的南缅因学校里读了最后一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出色。同时，她也打曲棍球、排球，参加辩论赛、戏剧演出和演唱会。数年后有人曾问起她和朋友们是否逃过课或公开挑战过学校当局，她的一位好友

说：“你别开玩笑了。”

她穿着守旧，经常是公众熟悉的榴裙、小圆领上衣、及膝短袜和平跟鞋，她不注重打扮，甚至从来不化妆或做发型。马莎·谢里尔写道：“她拒绝穿耳孔……从不在浴室吸烟，也不在学校图书馆里的隐蔽处和男孩们厮混，甚至连黑色毛衣套衫也不穿，她根本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她。”同学珍妮·斯诺德格拉斯认为，“正因为这些她才讨人喜欢。”多萝西·罗德姆可没这么确定，她回忆说：“她十五六岁时，别的女孩都已开始化妆、做头发，她却不感兴趣，这有点让我担心。我那时常想：‘为什么她不化点妆呢’。”希拉里当然有时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像 1964 年在一次低年级舞会上，她就身着晚礼服，戴着长长的白手套，施了胭脂，短发也特意修饰了一番，但那时，她的日常穿着都有些奇特，总不太和谐。离开南缅因学校后的 15 年中，她再也没有那样打扮过，直到 80 年代，她作为阿肯色州州长竞选人的妻子，才以一个精心装扮的形象出现，她不事修饰，对男孩子们没有兴趣，除了课外活动外很少对外接触，也几乎从不跟异性约会。她只带着童年伙伴参加“女孩选择舞伴”的舞会，她选了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作为舞伴，但也没有太把他当回事。像对待化妆、服饰一样，在社交活动中她既没时间，也没有兴趣与异性交往。

一位老师说：“她也不会让无话可说的小伙子们主持会议。

她也从不故作矜持、娴静，花时间打扮来吸引别人。”但是也有人认为她与男孩交往中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有某些更微妙的东西，因为对于智力上不如自己的小伙子她总不太耐烦，好像一直在寻找聪明的男孩，然后冷静地与他们竞争，树立自己的主宰地位。

这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要求平等，事实上她是想保持令人尊敬的优越感。她的一位成绩更好的同学鲍勃·斯坦森说：“她坚强，自信、优雅，但又有些冷漠。我总觉得她显得有些可笑。她是个可怕而又强硬的竞争对手，我总希望她会犯点错误。”

某一期校报上有人嘲讽道，就希拉里·黛安·罗德姆那凡人不理的高傲劲儿，她应该去当修女。

☆☆☆

就像对孩子们的要求一成不变一样，罗德姆一家的政治倾向也是一成不变的。一位朋友说：“休一直投共和党的票，不仅投票，而且是全身心投入。”在孩子们还小时他们很少在家谈论政治。有一年夏天，罗德姆家族在宾夕法尼亚。

东北部湖滨聚会，共和党亲属们痛斥民主党人，他们相信约翰·肯尼迪 1960 年之所以能从尼克松手中夺去总统位置，全靠包括梅厄·戴利在内的库克县民主党中坚人物那不光彩的默许。

那时，帕克里奇来了一位温文尔雅、精力充沛的年轻牧师，他改变了希拉里后来的生活，罗德姆一家常去红砖砌成的第一联合卫公理会教堂，那里是 60 年代镇上极右翼势力的堡垒。在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苏联的外来势力的阴谋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周里，负责的教区牧师向信徒写来一一封谨慎安抚的信：“他们总不会在每一块石头缝里都能找到共党分子。”一个牧师后来说：“教堂里，约翰·伯奇分子大多了。”肯尼迪一尼克松大选那年，希拉里·罗德姆 13 岁时，一位年轻教士唐纳德，琼斯来到这里，他年方三十，刚从那鲁大学神学院毕业，以其对职业的热情，给他

那些囿于一隅的年青的卫公理派信徒展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神学院时，他的思想深受保罗·蒂利齐（PaulTillich（1886-1965）德裔美国神学家、哲学家。）的影响，正是他那坚决介入社会，注重救赎的新教主义形成了他在帕克里奇的传教风格。与 60 年代初的社会背景——民权运动、肯尼迪政府的流行风格、年轻的叛逆一代的第一次躁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为一群青少年创办的周四夜校成为令他们有些敬畏的生活大学。琼斯解释说，他的小集体“不只是为了拯救个人，逃避现实，而是真正地寻找上帝，寻找现实生活的深刻意义。”

他租来放映机放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精典电影《四百下》和罗德·塞林的《拳王挽歌》。他用吉他伴奏弹唱鲍勃·迪伦的歌，让孩子们分析歌词。有对毕加索绘画的生动讨论，也有对斯蒂芬·克兰和 E．E．卡明斯作品的赏析，以及关于无神论与基督教的辨析。通过这些活动他试图让学生能“推己及人”——人们还记得他曾说过，他要使他们信念中的“良知和幸福”复苏。琼斯后来说：“我总是将神学与流行文化、艺术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谈，在到帕克里奇之前，我读过很多书，我也想让他们多读一些。”

他们坚持集体静修、游泳和滑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琼斯组织的户外活动，这把他们带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他带他们寻访芝加哥内城，到娱乐中心和其它教室与黑人和拉美裔年轻人见面，甚至包括帮派头目。一度他曾带着《格尔尼卡》的复制品，将它放在贫民窟里的孩子们面前，让他们找出自己的生活与毕加索绘画中表现的西班牙内战时的苦痛和折磨是否相似。

他还记得，这样的活动深深震动了那些人和未受教育者，而对那些生活优裕的人却触动并不大。后来他们还拜访了传奇人物、社会活动家和组织者素尔·阿林斯基（SaulDalidAlinsky（1909 一 1972）美国社会组织者。1938 年始在芝加哥劳工区进行社会组织活动。

1940 年创建工业区域基金会，并组织城市黑人居民。——译注），当时，他已赢得了琼斯的年轻信徒、宗教团体和芝加哥贫穷者的拥戴，这位浮躁、桀傲不驯，而又常常酗酒的阿林斯基经常向权力部门发起挑战。最典型的一次是，他曾组织抗议者们在一家公司总部上演了一出“有屎拉不出”的活动，并迫使芝加哥市议会作出让步，因为他们威胁当局要砸烂奥黑尔机场的所有卫生间。对帕克里奇的少年来说，这是他们见到的又一个奇特人物，不管这一幕如何短暂，这次会面的影响却非常大。若干年后，希拉里·罗德姆在她的一篇大学论文中多次提到阿林斯基和他的活动，而这位粗犷的活动家在她心目中己成了如何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老师。

城里的这些活动对帕克里奇的孩子们来说无异是一种新发现，对最热必此项活动、受震动最大的希拉里更是如此，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起那次参观芝加哥的鲜明印象，“我上中学时就知道人们面对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我自己是多么幸运！”琼斯回忆说：“我想这些孩子们原先从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也从未接触过与他们境遇不同的孩子。”962 年 4 月 15 日，他带着孩子们去芝加哥音乐厅聆听马钉路德·金题为“革命中必须保持警醒”的布道，布道之后，他鼓励孩子们上前去见见这位声名赫赫的民权领袖。

30 年后，琼斯和大部分人早已忘记了这一幕，可希拉里还记忆犹新：琼斯把他们逐一介绍给马钉路德·金，她还与他握了手。有人这样评价金的训导对她的影响：“人们有理由指责她简直把那些话奉之为金科玉律了。”

终于，在一次星期四夜校讨论少女怀孕问题时惹恼了孩子们的父母，引发了人们的争论并迁怒于联合卫理公会。

琼斯向他的上司辩解，试图将这个青年组织办下去。1962 年到 1963 年，他的学生们忙于组织为穷人运送食物。城西的流动农民住在茅草屋里，只能饮用露天水，他们就看护这些农民的孩子。然而，这些慈善活动和努力并没有在精神或情感上触动帕克里奇的权贵或政治生活。琼斯的年轻的卫理公会教徒们共享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后来发生的事令人伤感。谢里·海登说："我们相信假如思想观念变了，社会面貌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希拉里开始在放学后或夏天午后去琼斯在教堂的住所，热切地和他讨论课堂上的新的观念和见解。他则热情接待，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新教神学及蒂利齐、瑟伦·克尔恺那尔、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文章，两人还进行长时间的严肃讨论。年轻的教士说："她很好奇，坦然接受生活，她的求知欲永不满足。"

中学时他曾送她一本 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希拉里在大二时写给琼斯的一封信中说："那时我没有告诉你当你让我读这本书时，我并不爱看，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思想太超前了。现在我已读完第二遍，我才意识到你为什么要让我读它。实际上我现在不会觉得它有些超前。"

教士还向她介绍蒂利齐宗教改革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也探究被许多神学家视为战后社会异化和价值沦丧的表现形式对基督教理想主义的淡化。他记得他们还一起讨论过克尔恺那尔带有理性怀疑主义的"信仰的跳跃"，邦赫费尔关于公众道德和伦理的"无宗教基督教"，尤其是尼布尔关于民众统治中的权力必要性和关于历史、人性的更悲观的冷峻观点。琼斯说："她完全意识到了人们处于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她是一位地道的基督教徒，知道为了社会公益行使必要的权力是合理的。"回顾过去，如果说天下闻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是从那个年轻集体中好提问的小女孩变化而来的，那么成为政治人物的希拉里·罗德姆就是早期宗教活动和阿肯色经历造就而成的。

那时，在琼斯的教堂办公室里，他们在安静的午后进行的讨论与其说是政治指导，还不如说是试探性的发现和发问，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年轻女人的怀疑精神和敏锐感觉的初次觉醒。他知道，本质上她是个谨慎。自制又善于自我保护的女孩，就像她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的看法一样，她的世界观也正在形成。琼斯后来谈到她渐进式的、终生都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时说："她不像某些人在某一个年龄段上对某一件事情着迷，而是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

琼斯给希拉里这班学生养成了随身携带卫公理会祈祷书的习惯，在希拉里·罗德姆一生中，她与琼斯的温暖友爱的私人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这在当时更是弥足珍贵，琼斯不仅思维活泼、善于启发人，而且总是持鼓励和倾听的态度。

用玛莎·谢里尔的话说，那是"一个没有休·罗德姆吼叫的世界"。琼斯说："男孩子们都喜欢她。"当记者对希拉里在中学时是否太缺少社会交往提出质疑时，琼斯总护着他所喜爱的学生，他说："这倒不是因为她卖弄风情，实际上她没有惊人之貌，但相当有魅力。吸引周围人们的是她的个性，是她与人平等相处互相交流的品格。"有人说，这是一位 30 岁教士的更成熟的、更慈爱的描述，而不是 60 年代郊区男孩们通常的态度。

对于唐·琼斯，她愿意提出自己的疑问，说出心里话，对别人则不然。有一次她提出自少年时代起一直困扰她的问题：“我不明白一个人能否心智保守但又胸怀宽大？”在她读完中学之前，琼斯在帕克里奇待了 4 年多后又被派遣到了另一个教区。（后来他又回到那鲁大学读博士学位，并谋取一份不像在第一联合卫公理会时激犯众怒的教职。）在东缅因学校，希拉里被选为年级学生会副主席，但 1964 年春大她在南缅因学校竞选高中学生会主席时失败了，她给琼斯写了封拉杂的“富有哲理”的信，信中谈到她遇到挫折，正在调整自己，这位教士清楚地记得“希拉里痛恨失败”。这只是他们之间通信的开始。她的信通常只有一页，正反面都是满满的。此后 30 年中，她一直写信给他，从帕克里奇到大学、法学院、华盛顿、阿肯色、直至白宫。

1964 年在琼斯离开芝加哥后不久，她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来教士的不满：“他竟然认为我是个激进分子。”她不无夸张地向她的良师益友这样描述，当然，这是一种他们双方都能理解的讽喻。

☆☆☆

1964 年秋，帕克里奇以非同寻常的热情支持保守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来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AnH2O’64”（戈德华特 GOldwater 直译为金水，AuH2O 是金和水的化合式。——译注）的标语满街都是，希拉里·罗德姆作为官方指定的戈德华特小姐参加竞选活动，这令她的父母高兴不已，她头戴草帽，身披缓带参加集会，麻利地向坚决坚持共和党的邻居们拉选票，并且像朱迪思·沃纳所描述的那样，“以一个少女的全部热情，为右翼呐喊助威。”同年秋天，她作为高年级学生代表入选学生会，在南缅因学校的新体育场中精心组织了一场模拟全国大选的活动，表现出了她对政治的热衷。她甚至还在教堂的走廊上策划政治活动。11 月，林登·约翰逊以 1600 多张得票击败了戈德华特，而帕克里奇依旧故我，那些宣传招贴画原封未动，只是在流逝的时光中，在中西部的温暖阳光中慢慢褐色。同年 12 月，希拉里·罗德姆在南缅因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宣传的东西，用检查官办案的语气巨细无遗地描述了她的中学生活，当问及她的理想是什么时，她的回答使人们大吃一惊：“嫁给一位议员，在乔治敦定居。”

1965 年她毕业时，在 1000 多名学生中排第 15 位。大多数家庭富有的同学都准备继续深造，而那些来自穷人家的男孩们命中注定要去越南打仗。有人把他们的这一段的集体生活看成是 60 年代动乱岁月到来之前令人怀恋的一段大好时光。希拉里·罗德姆被认为是最可能获得成功的女孩。班里获得同样殊荣的另一位男孩在 60 年代服毒自杀。

她一直是全国优等生、奖学金的最后角逐者、全国荣誉学会成员和学生会的领导人。

她以坚决果断、富有竞争力和信仰坚定著称。同学们都说她会为自己所坚信的东西大声疾呼，并且站在独特的立场上，调解各种冲突，从未表现出一种反叛的性格。

同她未来的丈夫的经历相像，希拉里·罗德姆中学时代的突出表现一直笼罩在深刻的孤独和被伤害的阴影之下——这一点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说比尔·克林顿的偶像是罗杰·克林顿和弗吉尼亚的话，那么，她的偶像就是饱受熬煎的多萝西·罗德姆和她严酷的丈夫。但与比尔不同的是，她还有一位真心的思想导师，也接触过与帕克里奇和温泉城完全不同的各种思

想和生活方式。这对夫妇在经历上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很多方面是雷蒙德·克林顿伯父与唐。琼斯教士之间的差异。

在她身上抹不掉童年生活的时代和地点的印记。她的朋友萨拉·埃尔曼曾无意中带着嘲讽说："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希拉里是如此保守，有着中西部人的特点，又带有中产阶级的烙印，她的艺术品位是中产阶级的，音乐品位也是如此，她的衣服……她是很质朴、能干、友好的人，她是生长环境的产物。"

遵循南缅因学校两位青年教师的建议，她考虑去东部有名的女子学院读书，像拉德克利夫和史密斯学院。她母亲说"她准备上女子学院"。也确实如此，当她一看到该学校在波士顿城外的田园式校舍——"校园中心的小湖、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室、四周环绕的小城镇"，她就选择了威尔斯利。

1965 年秋天，父母开着家里的卡迪拉克轿车把她送到了马萨诸塞州。说再见的时刻，这位母亲忽然意识到她的女儿实际上一直生活在孤岛般的受到严格约束和责罚的家庭之中。多萝西回忆说，"除了偶尔和几个女伴出去玩玩，希拉里从未离开过家。当我们把她送到目的地后，我跌坐在车后座上，800 多英里的返乡路上，我都一直在哭。"

七　威尔斯利——"明天，当你成气候时"

全美高收费的女子学院中，威尔斯利堪称是高中之高，它是全国受捐助最多的前 20 所私立学校之一。自 1875 年创立后，它就以豪华艺术品和图书的收藏饮誉学术界，战后，更以资金雄厚的科学实验室而著称。即使在 60 年代中期，威尔斯利也基本保持了它几十年来的一贯形象——一所专为上层人家的淑女们开设的严肃、保守、有名的学校。

可以说它是艺术学院，也可以说它是镀金之地，因为该校师生在学识方面的声誉远远不及他们有钱有势的背景更引人注目。

为了能在风景如画的牛津风格的建筑和绿草如茵的环境中深造，威尔斯利的学生们一般要交比上普林斯顿或哈佛更昂贵的学杂费。校园周围是充满乡村风味的洼蚌湖。

整洁华贵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威尔斯利村和威尔斯利山。

虽然校园离波士顿闹市区才 15 英里，但一年级学生不能开车，晚上 9 点之后不能外出，未经父母许可也不可以外出度周末。一位学生说："那时这里的妇女们并不是真的来上学，而是培养她们有文化、有教养。你要记住，虽然威尔斯利有钱又有名，但是它是一所'女子'学院。"

希拉里·罗德姆觉得"学校生活丰富多采，与自己所想象的非常接近"。她后来对阿肯色州的记者马拉·莱弗里特说，"开始三个月都小心翼翼，"虽然当时其他人都认为她是个热心、合格的新生，"很快就加入到校内的共和党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坐着喝茶。"她母亲对一位朋友说："我曾为她担心，但毫无疑问，希拉里适应了威尔斯利，她参加俱乐部，很快就活跃起来。"

她的同班同学克里斯·罗杰斯说："校园里最流行的社交活动就是喝茶……加上一两块糖。"每到周末，威尔斯利的女孩子们都逃离拥挤的校舍，

乘波士顿的区间火车到哈佛广场。希拉里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一行列。第一学期没多久，她就开始与杰夫·希尔兹约会，这是一个安静、勤奋的哈佛低年级学生，将来的打算是进法学院。此后 4 年中，他们常常见面，同学们称之为“建立在长篇大论之上”的精神恋爱。

在希尔兹所在学校的温斯洛普宫经常有舞会、橄榄球赛和各种晚会，参加完这些活动，他们沿着剑桥的查理士湖回到威尔斯利。希尔兹回忆说，开始，她显得很文静，“愿意倾听而不主动说话。”不久，她就不再沉默了。他对一位作家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谈话。她宁愿坐下来谈论时事、政治、思想，也不愿去骑车旅行或看橄榄球赛。”作家盖尔·谢伊说，这位年轻的哈佛学生“爱上了她的认真劲儿”。他俩约会的同时她也常跟别的男孩来往，罗杰斯说他们全跟希尔兹一样，“热衷政治学科，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很听话的那种人，决非张牙舞爪的激进分子。”

她的入学演讲完全站在共和党的立场上大谈现实问题，包括东南亚问题和林登·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1966 年冬，她依次选修了那些各有特色的大学选修课，给人的感觉是她既务实又务虚，内容和样式并重。开始她还是个只知埋头用功的学生，后来，也积极参加各类聚会。她在给唐·琼斯的信中谈到阅读和作文的常规课程时说，“刚开始的 6 周，我很少与人交往，那种不挑不拣的大量阅读根本就消化不了。2 月里的最后两周，这里有颓废的狂欢酒会——颓废到让正直的卫公理派教徒也变得颓废的程度。”她告诉琼斯，3 月里她也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参与了校园内的许多改革活动，4 月，她又做了 30 天嬉皮士，在胳膊上画了朵花。5 月过后，她又重回到熟悉的角色之中。

琼斯认为，从那时起，她一直在寻找他们所谓的与“伤感的自由主义”截然对立的东西；琼斯对作家唐尼·拉德克利夫说：“她在感受到人类的弱点之后，才明白了获得公正的困难性和使用权力的必要性。”群众的缺点和愚昧看上去可以解释政权机构直接使用权力和压迫的必要性。在许多情形下，她都表现得不再像一个新生，对激进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轻蔑。此前不久，她曾带一个黑人学生去威尔斯利卫公理会教堂。

她向琼斯解释她这种举动的意义：“我在考验教堂，也在考验自己。”第二年夏天，芝加哥贫民区爆发骚乱，这使马钉路德·金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声名倍增，希拉里本人对于这些坚定的青年积极分子则不无嘲讽。她对琼斯说：“一个人不赞同该协调委员会对国内动乱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希望改变目前的种族关系现状。”

☆☆☆

1966 年到 1967 年，希拉里正读大学二年级，当时的越战升级、民权运动新的动向已在其他校园里初露端倪。她与其他同学、包括一些后来入校的黑人女生（当年人学的有 10 人）一起，鼓动黑人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邀请民权领袖到白人女学生的集会上宣讲种族团结在道义上的重要性。简·皮尔斯说：“我们大家都不愿谈那个问题。”

后来，希拉里作为一名学生议员，成为 60 年代校园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她们抗议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夜间熄灯和鸣钟制，要求减少课业负担，支持不留级制度，甚至要求废黜威尔斯利百年来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

对校方和女生来说，这种活动并不是一种羞辱，而是温和有序的改革活动，远不能与全国其他校园内暴力充斥的动乱同日而语，但在风平浪静的威尔斯利校园，她的举动就显得格外大胆，就像当年唐·琼斯带着他的学生们去芝加哥市内的禁地去参观一样。

60 年代的学潮只是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温和改革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她的改革旨在改变不再适用的条条框框，对最基本的权力结构则没有任何威胁。

玛莎·谢里尔认为，她在大学时代的活动是“希拉里式的反抗，有序、理智、公正。”她专注自身事业的成功，而按最简单的实用主义解释，成功就是事业本身。简·皮尔斯说，与其他学生积极分子相比，“我敢说她很少生气，生气易怒是受挫的结果，是没有效率的表现，而希拉里总是高效率。”

大学低年级时，她就是学生组织的领袖，看上去严肃认真，但不带书卷气。在学生与校方日趋增多的摩擦中，她是一个调和者，她曾主持过校内的一次会议，会上关于种族隔离的看法模棱两可，被黑人学生称为威尔斯利的“隐秘的御用政治”。后来，她又成为黑人女生社团与校方之间的调和人。克里斯·罗杰斯说：“她有一种在不同学生团体间起沟通作用的才能……她力图使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她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角色并非常珍惜，玛莎·谢里尔说：“希拉里不会对任何一次会议说‘不’，让那些繁文褥节见鬼去吧，她总会从天而降的。”

一些人开始对她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表示不解。对她钦慕而友善的杰夫·希尔兹觉得她“属于渴望参与并对别人有影响但又不确切地知道怎样去做的那类人。”除了她对校内事务的管理能力和积极参与之外，朋友们注意到她在大学里最后两年的变化：她越来越多地参加威尔斯利以外的社会活动，政治观念很快从共和党的变成民主党的。忙碌之余，她自愿去波士顿破落的罗克伯里贫民区教黑人孩子们读书，后来又到一家新办报社帮忙。作为一个青年共和党人，她喜欢强有力的复仇者，像共和党谦卑的尼尔森、洛克菲勒或纽约州代表约翰·林，而不是更保守的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1967 年到 1968 年，随着反越战情绪高涨，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支持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挑战林登·约翰逊。

她在威尔斯利的同舍好友约翰娜·布兰林还记得 1968 年 4 月 4 日希拉里听到马钉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害时的情形：“她走进来，呼地一声关上门，书包扔到了墙上。”布兰森说：“她完全被惊恐所控制，心神不宁。”当 80 个城市的年轻黑人暴动时，当哥伦比亚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们准备起义时，希拉里和一部分黑人女生戴着黑纱，参加了波士顿的一次肃穆的纪念游行。她们还计划在校内游行，但遇到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威胁。一位当地的年轻牧师回忆说：“如果我们做了，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金被害后，校园内气氛非常紧张。她是号召学生罢课。

举行民权问题讨论的组织者之一。当一位教授责备他们不应该放弃“周末的享受”时，她是第一个在校刊上及时反驳，锋芒毕露地迎击公开的批评的人。她写道：“我将放弃周六晚约会的时光……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有个人良知当然好，但必须表达出来。”她显得非常率直。连续几周，她都为一次精心组织的学生会主席竞选而忙碌，她与两位对手观点相同，赞成威尔斯利应当更多地让学生来管理，校方的决策要有班集体代表的参加。但她跟别人一样，“不知如何在权力结构中实施这些变革。”正因为如此《威尔斯利

新闻》拒绝支持希拉里·罗德姆和其他人。竟选胜利后，她对自己受欢迎被认可的程度感到惊讶，虽然她已为学生机构辛苦工作了 3 年，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从大学低年级升入高年级的几个月中，选举胜利只是她一连串引人注目事件的开始。

1968 年 6 月初——那时克林顿刚从乔治敦毕业，心情沮丧之极——她正按照威尔斯利实习计划来到满目疮痍的华盛顿。（当时华盛顿刚刚爆发过黑人暴动。——译注）300 个申请人中她是被选中的 30 人之一，参加由威斯康星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后来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主持的一个协助共和党议员工作的活动。连续 8 周，她都为来自帕克里奇的保守派哈罗德·科利尔处理日常工作。实习计划给她一个为莱尔德及其他人研究起草收益分配法案的机会，她也认识了几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右翼人士，他们在后来的里根政府里都表现不俗。

像往常一样，这次对华盛顿的初次造访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处理什么事都要果断、机智、高效。她赞成莱尔德对付共和党的"收益分配"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将联邦政府对资金和项目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各州。表面上，这似乎是削减了联邦政府控制能力，将决策权转交给税收自支的地方各州。但是国会山和州立法机构及法院的一贯做法是：残酷的政治阴谋总是为说教味的理论所掩盖。

许多人都知道，夸大其辞的"分配计划"只能使资金从一州流转到另一州，最后进入更狭隘保守、腐化的地方政权的腰包。而地方政府反过来又指责这些最初政策和计划拨款所带来的后果。沮丧的受到法院训诫的林登 约翰逊对他的助手说："天啊，有谁知道，那些执行收益政策的家伙总是在自己捞足后才开始实施政策的。"

实习计划结束后，她离开华盛顿，去迈阿密参加共和党大会。在那里，她为尼尔森·洛克菲勒工作，阻止理查德·尼克松竟选总统，尽管这一计划当时已经失败。就像她那年冬春在民主党初选中帮助尤金·麦卡锡造势，她为洛克菲勒工作是因为她深深折服于他要结束越战的誓言以及在社会、城市等问题上的新颖见解。当然，她在华盛顿的工作与在迈阿密的截然不同：她所帮助的那些给她以深刻印象的国会山的人，以及作为一个共和党实习助手努力完成的议案，都是属于理查德·尼克松、属于共和党的，而这些恰恰是洛克菲勒和民主党强烈反对的。希拉里·罗德姆在 1968 年整个夏天的政治活动只是小试锋芒，她一会儿专注共和党会议，一会儿又关心民主党的动向，与其说是信念坚定，倒不如说她还在游移、侦察。

那年夏天回帕克里奇后，剩下的假期里她都与老朋友们在水池边无精打采聊天，在家里和父母进行激烈的政治争论。如果说在威尔斯利她显得很谦虚，只是个调解人的话，那么，她在帕克里奇表现出的政治观点的变化却十分突出。朱迪思·沃纳说："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焦点总是政治。"8 月底，她与一位邻居贝齐·约翰逊，乘火车去芝加哥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分裂的民主党大会。

在芝加哥圆形剧场内，作为戴利市长中坚力量的保守派和总统候选人的休伯特·汉弗莱，镇压了利用麦卡锡初选失利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闹事的最后一帮反战者。离康拉德·希尔顿饭店不远的几个街区，发生了富有象征性的事。因为本周头几天这里曾发生流血冲突，学生示威者不停地高喊"法

西斯猪秽”和“不，我们不走”，芝加哥警察则狂吼：“杀了这帮闹事分子！打死狗杂种！”在一个闷热的周三晚上，一群随便聚合在一起的人们被催泪弹驱赶，在饭店附近游荡。一位记者匆匆记下：“他们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紧接着，没有任何警示，值勤警察突然挥舞起警棍来。包括当时在温泉城的年轻的比尔·克林顿，震惊的电视观众都目睹了在后来的一个调查节目中被称做“警察暴动”的这一幕，整个新闻界的震怒很快流传开来。汤姆·威克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事实是，我们的孩子们在街上被芝加哥警察打得头破血流。”

贝齐·约翰逊回忆说：“我们看到同龄人挨打受辱，而这一切都是警察所为，希拉里和我面面相觑。在帕克里奇我们都有美好的童年，这一幕对我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

骚动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受害者依旧不断受到数落。戴利市长称他们是“危害大众的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组成的暴力团体”。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在会议上和街头都对镇压发表评论说：“我想我们不应该再说戴利市长做错了什么事，他也确实没做错。”仅在几周内，民意测验就显示许多公众都同意戴利和汉弗莱的看法。校园内的抗议活动依旧继续，但整个国家似乎越来越混乱和不安，怨声载道淹没了对是非对错的分辨。大多数新闻机构在广播报道了芝加哥的血腥场面和暴力行为之后，也放弃了一开始所持的愤怒立场，只是如实地报道公众日益冷漠下来的情绪。

作为一代人里有不同看法的人，希拉里·罗德姆既从政治角度也感同身受地目睹了社会残酷的一面，正如贝齐·约翰逊所回忆的，她深感震惊，在许多方面开始躲避疏离。

她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在参加完其他院校的几个类似会议之后，又回到威尔斯利组织关于战争的时事讨论。秋天以后，当许多学生还在抵制选举时，希拉里好像已经摆脱了希尔顿饭店前的尖叫声和年轻人的幻灭感，她常常离开威尔斯利，开车驶进新罕布什尔和西马萨诸塞，开始热心地散发宣传品，并为一直持中庸态度的休伯特·汉弗莱的电话热线服务，而汉弗莱依然以“快乐战士”的姿态充当华盛顿战争政策的啦啦队长。

☆☆☆

在威尔斯利的最后一年，希拉里·罗德姆的公众形象很有光彩，个人生活却不宁静。

她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继续扮演校园协调者的角色，克里斯·罗杰斯和其他人都认为她在各方面都非常“投入”。她喜欢变革，但从不走极端，认为现状压抑人而且无用但她从不被现状激怒。杰夫·希尔兹说：“她是个真正的主流人物……而不是一个反传统者……甚至在思想上，她也开始摒弃激进主义。因为即使她做出完全自由主义的姿态，那也只是在一个相当保守的范围之内。”

她曾主持过宿舍里和餐厅里的小型沙龙。汉弗莱的竞选合作者、曾任国务卿的迪恩·艾奇逊的孙女埃莉诺·艾奇逊说：“至少她不轻福”艾奇逊觉得她的这位朋友并没有通常的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很多学生“被父母命令干成这个或干成那个，因缺乏热情和自信而感到痛苦，而希拉里则没有这种问题。”大学四年级不久，她和杰夫·希尔兹的关系就告吹了。一个同学说：“据推测，她并未跟他上过床。”撇开成功的外表，希拉里在威尔斯利的日子比她所说的艰难得多。她母亲谈起她当年在总统竞选中受到的人身攻击

时，对朱迪思·沃纳说："比起希拉里青少年时代受过的磨难……1992 年竞选中遇到的困难看上去只是一场轻松的舞蹈。"这样看来，她的大学时代很可能更艰难一些。

多萝西·罗德姆说："她在威尔斯特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光。"

在大学里，不再有人像唐·琼斯那样喜欢她了。教师中，帕齐·桑普森认为她非常"认真"，儿童心理学给她 A+的成绩，希拉里显然很珍视这一分数。教授宪法、致力于民权和自由政治的年轻教师阿兰·谢克特认为希拉里是"我在威尔斯利任教 7 年见到的最好的学生"。正是在谢克特帮助下，她完成了她的高年级论文，内容是关于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社区行动计划。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预示她和未来丈夫将来的政治观念。这项庞大的反贫困计划产生于 60 年代中期，是约翰逊早年春风得意时的杰作，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信念：美国战后的发展应该始终如一，为了实现美国民主，对财富和权力必须实行重要的再分配，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他们这一假想时说："贫困将被消除，每个人都不再痛苦。"民主党人能"不改变现行制度而实现大同世界"。

然而，这一计划自一开始就显露出它的致命弱点。

1964 新的烟税条例本可以提供重要的 10 亿美元，用于三四千万穷人的一项直接的、较少政治色彩的就业计划。但在烟草界游说者的压力下，约翰逊和民主党议会领导却废除了这一条例,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向国会山对"社区行动"的常规拨款，旨在促进经济实力和城市贫民及郊区贫困地区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在两年后，1966 年中间，这些努力全泡汤了——不仅仅是由于东南亚战争使大量的储备资源流失，引起资金和人们注意力的锐减，而且还因为这些努力受到国内民主党执政派的攻击，也受到被剥夺者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主张的威胁。州长和市长们、国会议员和立法者们纷纷向副总统汉弗莱游说，汉弗莱又反过来警告约翰逊，而后者则因战争的不断升级也难以做出什么重大的相应行动。

历史学者罗伯特·A．莱文写道："穷人们被组织起来反对当权者，当然，毫无疑问，当权者不喜欢看到这一点。"两党很快地就有一些不满的中产阶级加盟——他们的地位正因为越战所带来的财政和社会灾难而受到威胁——然而后来，他们发现，与其指责下层民众和非白人不如去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究竟如何。

在希拉里·罗德姆在威尔斯利所写的论文中随处可见这种变革与反抗的生动事例，她的论文既像文学作品，有时又像苍白的官方文字，细致地描述了不同的事件并作出评价。1969 年春天，她认为即将结束的"社区行动"计划一直是"富有建设性的"，穷人们现在需要"更广泛"、"更持久"的东西，一位读过她论文的人还记得她的论文结论。

但她适可而止，不再分析导致这些计划流产的真正的政治原因，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更有广泛代表性的美国政治权力必然带来的一些东西。

在论文中，她还提到了索尔·阿林斯基，自从在琼斯的青年团体中认识他之后，她曾在波士顿听过他演讲，大学四年级时返回威尔斯利之前，她还去芝加哥拜访了他。他改变贫困现状的办法——他自己称之为"一种对美国精神的拷问"——已经完善化，成为一种精确易懂的理论。穷人之为穷人

是因为他们缺少权力，必须将他们真正组织起来索取权力。希拉里·罗德姆敏锐地看到了阿林斯基及其方法的局限性，“组织穷人参加社团行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短期利益，但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谢克特教授记得她论文的结论就是这样。“你们需要更多更多的东西。需要领导、计划、宪法条文。”虽然她从未明确“更多”是指什么，但在某种意义上，她的观点是对后来一个时代的恰当评判。后来，阿林斯基和他在全国各地的信徒们为穷人和受剥削者赢得了数百次的小胜利，但他们只能看到，贫困和剥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挤进市议会，或者让这里那里的公司董事会难堪，并不能真正解决联邦政府的腐败和 80 年代最重要的国家财富资源的再分配问题。一味强调阿林斯基的地方主义和组织技巧恰恰忽视了他招致更多的批评的另一方面：权力的分配问题。就像她赞扬社区行动计划一样，她对芝加哥老派人士的丧失信心并不代表她潜在的政治观点有什么改变。

谢克特和其他三位老师给她的论文打了 A 的成绩，导师觉得她同自己一样，是 60 年代初的“实用自由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曾自称“工具自由主义者：即让政府去满足社会的尚未满足的需要，并且去帮助那些没有被包容在这一体制中的人们。”他在给那鲁法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他对“希拉里和她的未来充满信心，她具备能为美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知识、禀赋和性格。”她在威尔斯利的论文，当然不是这种贡献的一部分。毕业后不久，像她丈夫一样，深陷在政治漩涡中，她通知学校不要公开她的毕业论文，甚至连对阿林斯基方法的批评和对“领导”地位的模糊追求都会成为她将来事业的障碍。

25 年后，一位她的追随者解释说：“希拉里不容忍自己以 60 年代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出现。”

朋友们还记得最后几个月，她都在找“工作”。班里的许多人只是想着结婚和家庭，马宁·卡辛道夫说：但“威尔斯利盛行的女权主义……使希拉里决定从事法律工作。”在与一位傲慢的、有着鲜明的性别歧视观念的哈佛法律系教授有过接触之后，她就决定去耶鲁深造。她的一位哈佛的朋友说：“她当时试图决定是明年再来还是即刻加入与我们关系最紧张的竞争对手行列。”当这位朋友把她介绍给老师们时，有人回答说：“首先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紧张的对手，其次，我们根本不要女生。”

这次选择促成了她与索尔·阿林斯基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毕业时的一次特别采访中，她对《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她曾试图以阿林斯基为榜样，“在组织方面做点事”。她认为，他试图通过社会动荡来进行变革的观点，正如他注重中产阶级的敏感的政治观点一样，是“一个好点子”。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正是“她在帕克里奇时置身其中的人们”，然而，当阿林斯基在那年春天要她当一个组织者时，她拒绝了，她说她准备去耶鲁。他说“好吧，但那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则回答说：“我不这么看，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后来，她理想化的目标又一再受到考验，而她所选择的生活中也不断出现惊奇。杰夫·希尔兹认为：“她去法学院不是因为她想成为一个律师。”谢克特补充说：“她不是想去赚钱或当个公司的法律顾问，她只想……去影响社会的进程。”她自己则声称：“我对公司法律事务并无兴趣，人生苦短，我不能为某个大公司去赚钱。”希尔兹认为她对未来的工作并没有明确认识，

虽然她总是表现得相当独立。“她当时并没有牢固树立要人主某个重要部门的雄心壮志。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想找一个政治家维系自己的一生——我相信如果当时有人提出这一点，她肯定会否定的。”

有谢克特的鼎力相助，在班里的竞选中最后取胜后，希拉里成为威尔斯利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学生。谨慎的校方要求发言必须恰当地反映1969届的“学生民意”。

典礼筹委会一成立，学生们的建议纷至沓来，要求她对战争、金和肯尼迪的被刺、洛杉矶暴乱、校园内的示威抗议等发表坦诚的看法，更多地评述他们最近几年来经历的社会动荡。最后，筹委会傲慢地拒绝将发言稿交由校长终审。

母亲和她的两个兄弟都待在帕克里奇，休·罗德姆开车去波士顿聆听女儿的演讲。

仪式一开始，先是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作一番泛泛的演讲，这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是唯一的一位有着非洲血统的美国参议员，他的演讲只字未提战争及当时的混乱状况。

紧接着，希拉里·罗德姆在即兴发言中谴责了这位参议员，正如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他对社会现状表现得无动于衷。”在听众紧张的喘息声中，她大声斥责布鲁克呆头呆脑的表现。谢克特说：“她直接谴责他，并不用如果、而且、可是这些字眼。”希拉里自己说：“我发现自己又遇到了类似情形，我必须反击。”埃莉诺·艾奇逊则认为：“这只是希拉里标新立异的开始，但其他人，包括许多做母亲的，认为这只是一种粗鲁做法。”

她这才开始读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内容包括一位同学的诗：“现在的挑战是把政治当做艺术来运作，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不是对社会重建而是对人类的再造感兴趣……你我首先是自由的，不是充当光荣的十字军去拯救世界，而是要竭尽所能，发挥或展示那些能使美梦成真的艺术技巧。”

她谈到1968到1969年的动荡时局时说：“权力和责任集于一身不可偏废的问题一直是校园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统一、信任、尊敬”陷入了危机。她告诉他们：学生们正努力去“理解我们感觉到的混乱事物”。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正在探究一个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世界，并且试图在一种不确定性中进行创造。演讲刚几分钟，似乎已失去了部分听众。一篇文章写道：“她讲话时，底下有小声的咕哝和耳语声。”她接着说：“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什么。我们觉得现在占主导地位、只讲竞争的，包括大学里的可悲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所欣赏的。我们正寻找更直接、更让人鼓舞的，更深入的生活。因此我们对体制机构、学校、宗教和政府的怀疑，仍将继续。”几句字斟句酌的话，流露出对战后繁荣中自相矛盾的诸多不满：“这就是该有的一切吗？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吗？”她的演讲抛开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只是谈抽象的理论，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什么大胆的尝试。

“凡有抵制或异议都体现出不加掩饰的归于统一的企图，这种企图是与我们的人类天性相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自己似乎也陷入了自相矛盾：“在一个我们感受到的社会环境中——现在我们能谈论现实，而且我有时愿意讨论那些，真实的、不真实的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可是你会感到：这常常是在可能发生的灾难和想象中的人类需要之间摇摆。”演讲到这里时，有人挪桌子，小声耳语，甚至不停地在过道进进出出。

结束语中，她试图真诚地调和对旧秩序的不满：“在许多新左派学生抗

议活动中始终有一股奇异的保守派潜流，我觉得这很费解，因为它沿袭了许多旧的特点去实现原初的想法。”但是，对于这种想法，她悬而不论，以一种近乎国家主义的口号嘎然结束：“这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国经验，它是如此伟大的一种尝试。如果人类社会的经验不能在这个国家有所作为，那么，在这个时代，在别的地方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她的同年级同学和她们的家长给予了持久、热烈的掌声。当然，不言而喻，演讲也激怒了许多人。24 年后，她称这次演讲为“通篇激烈的言辞。”当时威尔斯利校方也对此大为不满，在她对布鲁克的谴责中，只是顺便提及“越南”一词，这一点也并未出现在她向校方提交的演讲提纲中，在 1975 年官方的学校编年史中，对该校的第一位毕业典礼上的学生发言人也没有记载。她当时所说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倒是表现了出来，那时她们一代人中的许多只是对“权力与责任”的现实做了很简单化的理解。几年后，一位记者写道，如果她在哈佛作演讲，只会把听众都赶走。事实确乎如此，在几英里之外的布兰代斯大学发生的类似场面更是 1969 年阶级状态的反映而且更有预见性，毕业典礼上的学生发言人谈到“我们社会的经济界实权人物”的规则……“是向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投入”。代表毕业生发言的贾斯廷·西蒙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你支持越战，请付钱吧。

你别想税务代理人会保证你不必交太多税金。”

她演讲的梗概刊登在《生活》杂志上，作为毕业典礼上学生演讲集的一篇，并附有她第一张有全国影响的照片，一位严肃的圆脸少女，一头长发，厚厚的无边眼镜后面是一双敏锐的眼睛，手指伸开的双手向面前探出。在同一面上，还有未来的白宫助手，艾拉·玛格瑞纳，后来曾参与希拉里的医疗保险改革，并告诫同学们说：“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们失眠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让错事继续在社会上发生，而且还但然接受现状。”旁边还有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的篇幅，这位副总统曾抨击“啜位的，软弱的权力结构”居然容忍这个时代的“暴力反抗”。这等于是特别对罗德姆和玛格瑞纳说，你们应该接受“合理”的社会现状，抛弃那些“不成熟”的异议。这是阿格纽在因丑闻离职前在告诫他们：“明天，当你们成气候时，问问你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从威尔斯利毕业时，希拉里·罗德姆已是一个内心矛盾的、戒备的。自我封闭的女人。几十年后人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时，甚至是最富同情心的记者们也会对她当时直线思维方式感到不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她当时是那么“理性、克制”,似乎没有什么“痛苦……恐惧……和梦想”。弗兰克·马拉菲奥特认为，“朋友们和家里人并不认为她是这样一类人：有创造力和变革精神、感情丰富、有同情心和敏锐的直觉、喜欢怀旧、耽于享乐。”最后，他总结说，她看起来似乎“很难为别人了解，甚至她本人可能对自己也不太清楚”。

毕业演讲结束后，她离开了人群，包括她父亲，只身来到洼蚌湖，脱下毕业礼眼，穿上泳衣跃入水中。照理说湖中是禁止学生游泳的，可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尽情享受反叛的快乐了。正当她在湖中畅游时，一位校方安全警卫正好路过，他拿走了她的东西，包括那副厚眼镜。

1992 在威尔斯利的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她说起了这个故事。她说“当时我瞎得像个蝙蝠，不得不摸索着回到宿舍。”听众大笑。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无论是事实还是象征意义上，她度过大学生涯的

这一辉煌时刻就像以前或此后一样——尽其所能但却是孤军奋战。

八　耶鲁之一——“她视权力胜过魅力”

1969 年夏天，比尔·克林顿还在温泉城为逃避兵役而忐忑不安时，希拉里·罗德姆又开始了她毕业后马不停蹄的单骑闯荡。为了躲避帕克里奇湿热的夏天，她决定去阿拉斯加谋取一份工作——她选择搭免费车去的举动令全家人和朋友大为吃惊。在那里，她在一家罐头厂找了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解雇了，因为她认真地对老板说，他们提供给食品商店的鱼罐头好像已经腐烂。她对一位朋友说：“那些鱼都变黑了，已开始腐烂。可是我想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朋友们都觉得她从西北回来后，带回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显得很有自信。同年秋天，当克林顿带着他缓期服兵役的证明回到牛津等待机会时，她已自信地跨入耶鲁校内，成为法学院有数的几位女性之一。

人们还记得她当时的样子：法兰绒衬衫、厚镜片和朴素的衣着。简朴得就像入学通知——或校方告示——所要求的，“有点让人惊讶”，盖尔·希伊后来描述说。她很快投入到反战的罢课活动中，还组织了校园游说活动，最终迫使校方在法学院女厕所里配备了月经棉。塔米·怀尼特回忆起这一幕时充满温情，联想起当时女友们的笑语欢声。

但同学们更深刻的印象来自她的“勤奋努力、严肃认真”，甚至独来独往。希拉里经历过父亲休·罗德姆的严格管束，所以还定时去大学生体育馆练健身操。

从一开始，她一如既往地把精力和热情放在学术上。

有一段时间，她参与了《那鲁法学社会学评论》这份短命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有意发出与校方正统观点相左的激烈言辞，代表了对法学院传统观念的积极挑战，里面常刊登一些反对政府压制的、代表黑豹党人和其他一些人意见的慷慨激昂的文章，她回忆说：“当时对于法学院教育的真正目的，我们很困惑，满怀热情去论争，对于将来是不是得到法学学位就能找到好工作也是意见不一。”

第一年她几乎没跟男孩子约会过。有人认为，她显得很孤单，尽管她的性格外向，而且有时她还公开表示对异性和聚会的冷漠。一位好友评论说：“作为一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朴素，决不出风头，只是有时带几分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色彩。让我回想从前的话，不管她表面如何，像希望得到其他东西一样她也希望得到异性的注目。”内心深处对自我和对异性的感受是一回事，但在公共场合则是另一回事了。她母亲说：“我觉得那几年她遇到的挑战太多了。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与男人是平等的。可那时没有什么人能接受这一观念。”但这不只是一个两性差异的问题。22 岁时，她已不愿而且也掩饰不了这样一种直截了当而又近乎苛刻的区别对待：哪些人吸引她，值得她注意和善待，而哪些人不值得。她的朋友艾·伯幸说：“她既能但言无碍又能尖酸刻薄，但对她所喜欢和信任的人则充满温情。”另一位男性朋友则补充说：“换言之，希拉里既可宛若天仙也能恶如魔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然而，她还是给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在威尔斯利一样，她参加了一些针对校方的抗议集会，其中包括 1969 年到 1970 年纽黑文对黑豹党的调查。当时，在那鲁法学学者托马斯，埃默森的指导下，她组织了一批批学生去法院旁听。像以前一样，她很快投入其中但不久奇怪地抽身出来。她中肯客观地总结别人，特别是学生们的缺少艺术性但不乏说服力的演讲，这位戴着厚镜片、举止严肃的女人很快受到欢迎，成为校内一位讲效率的调停人，是持不同政见学生与深感不安的校方之间的最佳沟通者——尽管她很自信，但有人说，她从未站在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立场上。一位同学对记者说：“她是如此野心勃勃……那时就已懂得关系的重要性。她开始与校方和老师们而不是学生们培养良好关系。”

然而，和在威尔斯利不同的是，她的角色给那些关注她钓学生和老师留下的印象并不一样，1994 年一位同学对布昏克说：“许多年来她一直掩饰着她的野心。但在耶鲁法学院时，她不再隐藏她急于要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渴望。”她沟另一同学则说：“那时有许多争取民权、关于外交政策及其他问题的集会，她总呐喊奔走其中，却从未受过处罚。我想她谈的最多的是在性别和工作机会方面，虽然所有这些看上去超出了她自身的能力。她真正的事业是她希拉里自己。”肯尼迪时代就是华盛顿政坛元老的那鲁法学教授伯克·马歇尔认为，“她非常聪明、勤奋、有吸引力，但是，在她的政治策略上和其他人一样，缺乏想象力。”后来他称她为“普通的民主党人。”

《生活》杂志刊出了她在威尔斯利的演说之后，她应邀参加了女选民联合会组织的一个叫做“未来年轻领导人”的会议。该会议是两党促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一，他们从各校的激进分子中选出六十位学生领袖。这成为希拉里·罗德姆与华盛顿微妙联系的开端——一位观察家称这些集会中鱼龙混杂的学生政治新贵们为“现政权的候选人”，正是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议会工作人员和对她未来丈夫的政治崛起将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选民登记代理人弗农·乔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23 年后，他成为大公司的游说者，并主持了比尔·克林顿的权力交接仪式。

然而，更为突出的是，集会邀请她在联合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联系 1970 年春天的入侵柬埔寨、百所大学抗议活动，她发表了演讲，在她从帕克里奇到白宫的政治生涯中，这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次演讲。言辞中充满主显节的宗教意味、挫败感和时代印记，当时尼克松的统治日益衰微、战争留下的阴影四处可见，战争结束遥遥无期。

她在会上对听众说：“刚刚过去的这十年，以追求高尚开始，却以崇尚平庸结束。”她请求与会者“为制止希望破灭的恶性循环出一把力”。这是时代的要求。她接着说：“我们对社会进行谴责的面扩大了，原先我们拥护民权，现在我们鼓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组；原先我们公开南方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却在抨击工厂和公司里的工作质量；原先我们攻击剥削现象，而现在我们在批评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她指责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她们并非缺乏能力，只要她们回答她们不应回避的问题：“你该拥有什么样的底牌？该如何运用你的表决权？我们能让公司支配我们多长时间？难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所有这些机构对人民负责的时候了吗？”

接下来的发言全是冷嘲热讽，仿佛是 1970 年的希拉里嘲讽 20 年之后的希拉里·克林顿——这位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既不再抨击剥削劳工，也不批评该州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而是把持着腐败的期货市场和南非种族主义

分子的公司的高利润股票。作为几个大公司董事会的法律顾问，她早已不再鼓吹什么“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组了。”朝秦暮楚已成为她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这进一步预示出今后她的爱情和事业。这次演讲虽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它清楚地显现出她如何从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变成已成为的这种人的发展过程。不管怎样，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知道这两者的区别的。

与妇联会的接触为她的政治生涯打开了一条新路，集会上她认识的人中就有罗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彼德·埃德尔曼，他的妻子，儿童权利保护律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说，希拉里一下子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鲁一位保证人的支持下，希拉里向华盛顿研究项目署申请到了一个职位，她先是在工程部做过短时间工作，不久，就经埃德尔曼夫妇推荐在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的移民劳工委员会中找到一个肥缺，研究弗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由于不卫生而瘟疫流行的移民区的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

为右翼代表人物哈罗德·科利尔工作过两年之后，她现在又作为蒙代尔工作班子的一员一头扎进实地调查和文字归档——这也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项副产品——的事务堆中去了，共事的人里有人说她“显然是个自由派”。在唐·琼斯的卫公理会青年组织时她早已了解了一些移民家庭，但现在她所看到的还是把她吓得够呛。她对朋友和同事说，这段经历“令她震惊”。1970 年 7 月底委员会就移民区的恶劣生活条件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对可口可乐子公司新招计时女工一事进行质询。7 月 24 日当可口可乐公司总裁 J.保罗·奥斯汀到议会听证会作证时，希拉里在走廊里截住了他。包括蒙代尔的职员在内的旁观者看到希拉里一反常态，满怀激愤地责问他，后来一位公司律师说，“她失去了往日的镇静，而且确实是个人物，咄咄逼人，毫不让步。”许多人都记得当时的情形，她对惊惶的总裁愤怒地说：“我们要揍你，揍你！”

奥斯汀生硬地向委员会保证，要提高移民职工的待遇。

但听证会后却对此事不了了之，工人的工作条件也没有多人改变。在华盛顿金钱万能的环境中，揭露黑暗和进行改革都颇具讽刺意味，结果都是破碎的胞皂泡。1984 年当蒙代尔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时，可口可乐的顾问充当他的资深智囊团，而许多农业综合企业给予巨大资助，这些企业正是 1970 年听证会上曾被曝光的，他们从移民身上榨取了巨大利润。

可口可乐及其总裁奥斯汀并非这丑闻中的唯一涉嫌者。在听证会上，希拉里·罗德姆和听众还听到了被称为“世界上工作条件最恶劣、最不人道的”得克萨斯移民区的情况，在那里，工人及其家属为前议员、百万富翁庄园主劳埃德·本特森卖命。1970 年本特森竞选参议员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在银行、保险和移民劳工身上攫取的巨大财富。

1992 年，克林顿执政时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听证会后不久，希拉里又回到了耶鲁。她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对后来几个月揭露出的移民劳工的惨状非常气愤。但这股热情持续时间不长。7 年后，在一份广为人知的个人简历上，希拉里列举了她从威尔斯利大学时代开始从事的主要活动时，抹去了她在议会中从事移民劳工研究的这段经历，更没有提在华盛顿与奥尔汀的短兵相接和在妇联会上的有预见性的演说。

1970 年秋天，法学院的新生们又开始聚集在纽黑文。

其中有一个絮絮叨叨的男生显得格外出众，他来自阿肯色州，留着猫上埃尔维斯的络腮胡，大谈一个叫霍普的地方的西瓜是如何鲜甜可口。

在 l992 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段故事总是被提到，所以希拉里·罗德姆和比尔·克林顿在法学院图书馆里的首次见面几乎已成为一段政坛名人的美谈佳话。当时一位同学劝他去复习艰涩的法律书时，他却在长长的阅览室里宣盯着希拉里看。最后，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生硬地说："好吧，如果你还要盯着我不放，那我也要反过来瞪你，还不如现在就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呢？"玛莎·谢里尔后来写道，"这简直就是爱情电影中的一个情节。"用克林顿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一反常态，哑口无言"，站在那里苦苦想着自己姓什么。

无论是根据私下的流传还是后来公开的资料，这一故事的浪漫情调还有许多没有揭示出来，这个朴素、用功、总是一脸严肃的年轻女人确实引起了校园中这个引人注目的高大、英竣爱说笑的南方小伙子的注意。他呢，多少年来一直像吹嘘霍普西瓜一样推销自己，今天终于碰到了一个识货的买主。后来他们坦诚地描述当时情形时说，两人都是不经意地坠入爱河——至少在他们的体验中那是一种新奇。她说："他不怕我。"他则对一位记者说："我看着她，告诉她，她看上去很有趣，有深度。"

在图书馆见面之前，他曾试图接近她，但都未成功。盖尔·希伊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悄悄地跟踪她。克林顿则对一位传记作者说："那时，我刚跟一个女孩吹了。"毫无疑问，希拉里是他长长的女友队伍中的最新的一个。她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在比尔·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在耶鲁与好几个男生约会过。"许多人还记得，在她的生活中，正如唐尼·拉德克利夫所说的，男人们"时进时出，更换不停。"但是在克林顿之前就与她很熟的一位男生认为，她不会经常跟某个人在一起——或者保持一种亲密关系，一开始她对克林顿也是这样。他说："她当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友，但他对于她来说却是最好的，在以后发生的一切中，这一点比别的都重要。"

☆☆☆

那年秋天，威廉·科尔曼三世进入了法学院，他是尼克松内阁中一位有钱有势的部长的儿子，也是 125 名学生中的 10 名非洲美国人之一。当时他特别注意到了那位"友善的有着南方口音和大使般圆圆笑脸的青年人……来到'黑人餐桌'旁就坐。"当时，科尔曼和他的黑人同学在法学院就餐时，都是与白人分开的。不久，比尔·克林顿却加入到他们中间，他也鼓励别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坐在一起，他的谈吐欢快活泼、富有感染力。

科尔曼说："他有讲故事的天赋、最简单的事到他嘴里也变成了有情节有寓意的好故事。"

对于法学院的那些课程，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严肃认真。平易的性格使他常常是轻轻松松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对待功课。耶鲁的朋友还记得克林顿第一学年就加入了"反课程"组织，这是一个学生自发的团体，试图撇开特定课程去学习，他也认真地撰写、修改学期论文。同学中没人怀疑他在用软绵绵的书法写出的文章中透露出的是聪明、敏捷和善辩。同在别处一样，他比起实际案例分析要来得更实在、更有个性——快乐、温和，有吸引力、甚至也很真诚。

在纽黑文的 3 年中，科尔曼和其他同学都感觉得到他"对正经功课随随便便"的态度，很少听讲座或去探讨那些重要的案例和宪法、法律原理，只是一个劲儿看侦探小说和探险小说。一位同学尖刻地说："他根本没花什么时间去研究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美国最高法院 1803

年首次宣布一项国会通过的法令违宪。——译注）他们只记得他习惯于临时抱佛脚。学期结束前三周，比尔·克林顿向朋友们借了几本笔记，闭门苦读。同学们说，他最后的考试结果还“相当不错”。

在耶鲁时，他从未掩饰过急切谋取政治位置的野心，他的同伴和老师也从未对此表示异议或劝阻。布克·马歇尔对一位作者说“他是个好学生，非常聪明，但我从不认为比尔·克林顿会是一个好的专职律师。他瞄准的显然是总统候选人。”一位耶鲁同学说：克林顿确实是个人物，“他在 24 岁时就已明确了政治家的身份。”像在乔治敦一样，他孩子气般的爱唠叨使人觉得他并不工于心计，也不会怀疑或讨厌他。一位同学评论说：“在法学院，没有人会声称‘我要当一个惹事生非的人’，而他的所作所为却有点像这样。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克林顿看上去一点也不狡诈。”他家乡的落后甚至被用来解释他为什么在法学院如此敷衍塞责。威廉姆·科尔曼觉得“他的野心……是合乎情理的，”“政治实践比学术地位更重要”，计划又是那么实际，而“在阿肯色那么一个环境平和的小州里”克林顿确实大有被推选出来的机会。盖尔·希伊总结大多数人的看法时说：“对克林顿来说，法学院只是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的地方。”

当然，在他慷慨大方的外表下还有一些更内在的东西，令他们不太适应——因为这里有一个他们不愿承认的假设：政治和高官需要资历和声望而不仅仅是严肃的知识和学识，未来的州长需要圆滑、灵敏，需要临时抱佛脚期末也能考出好成绩这种本事。一位教授谈到这位未来总统对耶鲁课程的态度时说：“这不仅说明比尔·克林顿是何人，也表明这所学校究竟如何。”克林顿早就发现，那些“追名逐利者”与电视上总是在奋斗、艰难而又劳累的法学学生捍卫正义的形象并不相符。后来一位失望的教授说：“我们必须正视它。我就曾为华尔街经纪人和其他奸滑的律师讲授过选举的技巧。”另一位在耶鲁法学院学习并工作过的教授说：“很少有人严肃认真，大多数人都敷衍了事，课程就这样，所以他们都学得不错，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它像一个加工厂，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场所，而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所商贸学院。”

1970 年秋，学期刚开始几周，克林顿就搬到长岛海峡，距纽黑文南 25 英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里。他与科尔曼和罗兹学者道格拉斯·埃肯利和道格拉斯·波格住在一起，后者来自中西部的一个工人家庭。这所房子马上成了热闹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克林顿的同学们都还记得他对年轻女士的偏爱和渴望以及暴饮暴食的恶习。一位室友打趣说：他在兹兹作响四处飞溅的沸油中煎炸各类食物，然后在一系列“从平底锅到盘子到嘴里”的连续动作中狼吞虎咽。

波格是这个圈子里为数不多的 60 年代激进分子中的一个，他认为，同室的这位来自温泉城的新朋友“对待每个人都有一种得体的礼貌，能使他们畅所欲言”。当克林顿和科尔曼以及其他非洲裔同学畅谈时，他就谴责阿肯色的奥瓦尔·福伯斯那样的种族主义政客；在跟埃肯利在一起时，他就大谈南方文学，和波格大声争论对外政策，科尔曼说，讨论最多的还是“体制内部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中他从不树敌，他们一致认为，而且毫不怀疑“他的政治观——就像他早已与这一体系达成一致，他也会微笑着接受唐·波格所要反对的各种折衷方案。

在耶鲁，克林顿时常脱课，就像他经常不在他们海滨寓所一样，忙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或者去做一些临时兼职。

他虽然在耶鲁有奖学金户头，而且温泉城那里还有弗吉尼亚源源不断的充足的资助，但他还得挣钱应付巨大的开支。

他曾在社区大学教过书，当过当地一位政务委员的助手，并协助纽黑文的一位律师做案件调查，调查工作为他提供了了解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罪恶的机会。他后来说："我走进那些屋子里，人们正在那里注射毒品，我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下次他接触到的吸毒场面就大不相同了，那是十几年后在小石城投机家和他的政治赞助者们组织的可卡因聚会上。）当时他是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城里的打工经历将是这位未来总统真正接触下层贫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后来，他再也没有在贫穷的街区工作过，或者住在贫民区及附近，接触到阿肯色城镇乡村的真实情况——除了他当候选人或执政者时，精心安排了保护的那些巡回访问。

尽管如此，克林顿的主要工作还是政治活动。在耶鲁时，他曾为康涅狄格州的一位议员和一位市长竞选人工作过。但是他更重要的经历和关系还是来自他与联邦官员的接触中。从牛津回来后，他利用里茨，即著名的里克·斯持恩斯的关系，参加了 1970 年夏天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一项目是华盛顿游说者支持哈蒂菲尔德·麦哥文提出的修正案，意在削减对越战的财政拨款。在那里，他遇到未来的民主党政治顾问和支持者卡尔·瓦格纳和安东尼·波德斯塔，后者在康涅狄格州的约瑟夫·P．达菲牧师的竞选参议员活动中曾给克林顿做了引见。达菲是一个反战分子，也是前议员尤金·麦卡锡的支持者，在初选中他击败了陈腐的民主党机器，大选中则历尽坎坷。一方面，达菲要面对丑闻不绝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他曾一度退出大选后来又作为独立人士重新加入竞选；另一方面，达菲还得对付财力雄厚的共和党议员洛厄尔·韦克，他是斯奎帕药业财团的继承人。

当同学们忙于购买法律书籍、认真记着笔记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正为达菲在康涅狄格州选区组织第三议会选举，这一选区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意大利人工业区，是从纽黑文不恰当地划分出来的一个城镇区。这一地区的主要种族，甚至径渭分明的蓝领白领阶层都非常痛恨耶鲁，害怕大学附近的地盘虽小但声势很大的黑人居民，虽然他们只占该区人口的 2%。这一选区名义上是民主党的，它在议会中的代表都是右翼民主党人，在根本问题上是与尼克松的白宫政权高度一致的。

在该选区过去第三党国会反战势力的基础上，克林顿利用最先进的电讯手段和挨家游说的学生志愿者，将第三选区动员起来。在每一处他都大加宣扬达菲充满智慧的反战言论，同时避免触及更微妙、根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尽管有克林顿的巨大努力，但达菲与民主党中坚人物多德闹翻，最终在全州输给了韦克。这位法学院学生在阿肯色的耕耘后来有了收获：达菲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执委会的主席和克林顿执政时的官员；而达菲竞选组织的负责人，后成为他妻子的安·韦克斯勒则成为华盛顿引人注目的政治顾问、大公司的游说者和克林顿的支持者。

1992 年一个被称为新民主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克林顿 80 年代在阿肯色州的经历，它由二战后不久古老的商业化了的南方民主党蜕变而成的。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追溯到 1970 年康涅狄格州的第三选区，当时困惑的中产阶级痛斥"激进分子"或仇视少数民族，为保守派所支配，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毫不懈怠地投民主党的票。

☆☆☆

以前曾有人问她是否体验过她在威尔斯利毕业典礼演讲中盼望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希拉里·罗德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在与比尔·克林顿相爱时。”一位朋友说，“她视权力胜过魅力，她看到了克林顿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我想正是这一点令克林顿难以拒绝。”在气质、思想和风格诸方面，他们似乎是那一代男女中的理想配偶。她传统的“男性气质”、活力和忍耐正好与他带有“女性气质”的温和、多情和敏感相匹配。她的传记作者朱迪思·沃纳写道：“这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至少，也是他们身上的野心的融合。

多年来了解他们的人说：“她不仅知道他急于想当总统，也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她如愿以偿。”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她未来的打算，另一位好友对康尼·布鲁克说：“而且她总是发现她能够同他一起分享政治权力——而不只是当选”20 多年后，盖尔·希伊谈到他们在图书馆那次著名的见面时说：“他们一直相互注视着，情感里混合着兴奋和焦虑。”

1971 年秋，希拉里。罗德姆成了海滨宿舍的常客，对于他们既是情侣又是盟友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之间越来越不只是一对情人，更像一对搭档，罗德姆常帮他补习功课，在耶鲁的出庭律师联合会上组织的法庭辩论赛中，他们俩是最难对付的一组。

在她的约束下，他们准备得极为细致。朋友们回忆说，她整理案件材料，由散漫的克林顿去对付那些心怀敌意的证人们，可最后，他们还是输了。20 年后克林顿对一记者说：“我那大非常不痛快”。显然，他们共同分担失败。

他总是放纵自己，事后又后悔，不愿面对她的判断——像她那样的直言不讳正是他难以接受的。每个人都能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有着热烈的爱情，但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有潜在的矛盾，后来演变成了痛苦艰辛的政治婚姻——而且事实比这样的概括更复杂。显然地，这场 20 世纪政坛上最具影响的爱情故事，是两个对国家统治有着难以估量影响的人一手造成的。在 1992 年的竞选手册中一位朋友谈到他们在海滨宿舍的生活时说：“我现在还记得当比尔大谈他的理想主义时，希拉里对他幽默而又疼爱的批评。”另一位朋友则更为坦率地说起希拉里当时的反应，她说：“哦，天啊，比尔，别说了，我们早就听过了。”

她在法学院的第四学年，从 1971 年到 1972 年，他们在校园附近的一所旧房子里开始同居，作为一对夫妇，他们吸引了许多人参加那里的社交活动，就像当年在海滨宿舍时那样，这里包括后来的顾问和部下罗伯特·赖克。在外人看来，克林顿还是那个故事大王。1971 年秋，他的上进心似乎有所懈担 11 月 17 日，他写信给阿肯色州的朋友询问白宫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对于他们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一个非保守人士把一个准激进女人弄得兴奋不已，而这个女人因在白宫与林登·约翰逊睡过觉，于是，就学会了即使在做爱时也把和平的旗帜系在腰间的习惯。”然而在谈论别人的政治野心时他严肃地评论说：“如果你有灵感，那就继续努力吧！我在奋斗中遇到大多的挫折，也许哪一天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让这个痛苦的世界擦身而过。”他在那鲁法学院信笺纸上又打上这样一句：“做你想做的事吧，但一定得小心。”

圣诞节的假期里，比尔·克林顿去了一趟帕克里奇，多萝西·罗德姆承认那确实是一次“冷淡的接待”。这位母亲谈到她打开门，迎接这位第一

个为 25 岁的希拉里而来的年轻人时说：“我知道，他来是要带走我的女儿。”他与他们待了“整整一星期”。罗德姆一家忍受着比尔睡在她兄弟的房间里和“他待在那里”的难受滋味。但不久，多萝西就被比尔·克林顿吸引住了，因为他鼓励她去上大学，他愿意和她谈论她感兴趣的上学这一话题，而且她也得到了向往已久的但在郊区舒适生活中从未得到的尊敬。

他们不停地谈论政治。她回忆说：“总是同一个话题。”

多萝西问这位高大、英俊的律师说：“你要回阿肯色实现你的理想，那我的女儿怎么办？”由于自己曾受到大多的限制，这位母亲希望女儿能得到更多更多，才提出这样的问题。

克林顿早已宣布了他的家庭计划。阿肯色的一位老朋友说：“很久前他就告诉人们，他不要漂亮的王后，而要娶班上最聪明的女孩。”另一位朋友则说：“你们要记住，比尔的生长环境中，女人们都热衷于打扮，涂抹许多化妆品，所以他并不想娶那种女人。”1971 年与母亲短暂见面之后，他在离开小石城机场时，突然对弗吉尼亚大声说：“妈妈，我希望你答应我娶希拉里，我非她不娶。”

在去纽黑文的旅行途中，弗吉尼亚遇见了希拉里，在 1972 年比尔带她去温泉城之前，这是她们以后许多遭遇战中的第一次——这位年轻女子看上去非常朴素，而且“不拘小节”，这位母亲回忆说。弗吉尼亚还记得，比尔曾带回家“那么多来自各地的漂亮女孩”，带她们去他常去的地方，然后去湖上划船，而眼前的这个女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弗吉尼亚和 16 岁的小罗杰虽不太喜欢，但对她并未表现出不礼貌。当希拉里走出房间去卸行李时，比尔把他们拉到一边，目光逼视，愤怒地斥责他们，弗吉尼亚写道：“就像我母亲当年那样。”然后，他对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厌倦那些漂亮姑娘，我要娶一个能谈得来的人。”

他的责备压制了他母亲当时的敌意，弗吉尼亚后来承认，这只是“我们面前漫漫长路”的开始。那次见面后，她觉得希拉里“安静、冷冰冰，反应迟钝，使人不快”。她的判断是对的。罗德姆家的一位朋友说：“从她踏进这个家庭的门槛时，她母亲就显得很紧张，觉得受到了轻视。她对阿肯色州不感兴趣，对未来的婆婆和脏兮兮的小叔子也不太在意。”

后来，对于这种第一次会面就产生的并且从未中断的厌恶，她们各有自己的解释。

在比尔·克林顿看来，这是被称为阿肯色州典型的母亲和芝加哥郊区的儿媳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不知道是因为弗吉尼亚后来坦诚道出她对希拉里聪慧的嫉妒，还是因为这两位强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上隐含着相同之处，弗吉尼亚曾记得比尔有一次对她说：“好，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和希拉里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那么，你们就是不喜欢你们自己。”

九　耶鲁之二——“她从不靠他来证明自己”

1971 年秋天，康涅狄格州的达菲要求他以前的竞选阵营加入到缅因州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总统竞选阵营中去。

埃德蒙·马斯基是汉弗莱 1968 年的竞选伙伴，现在则是 1972 年的主

要竞选者。安·韦克斯勒回忆说："我们已争取到了每个人，除了比尔。他只是平静而坚定地说，他拥护麦戈文。"

乔治·麦戈文对谨慎、琐细的马斯基非常反感，因为麦戈文早就是华盛顿执政者的奴仆，也是他们的主要资助者，不仅代表了对结束战争的不懈努力，还代表了一种更开放。

代议制的政府形象。这位南达科他州的最真诚的参议员吸引了一大批对华盛顿游说者和骑墙派的民主党核心的潜在反对者，而这些游说者和骑墙派为马斯基和大手大脚的汉弗莱工作。虽然许多麦戈文的党羽最后还是受到华盛顿的铜臭味的熏陶，但 20 年后，自 1972 年以来的两派间的严格分野在克林顿当局中还是昭然若揭。一旦麦戈文派在白宫和各部门有了一官半职，那么在内阁和克林顿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中的高级顾问中就有许多原先是马斯基或汉弗莱的支持者。他们中有人说："很难说，哪派是最后的赢家。"

在见到达菲几周前，克林顿在财政紧缩计划中已接触过卡尔·瓦格纳、安东尼·波德斯塔和里克·斯特恩斯（后者是第一批麦戈文竞选组织的雇员），他们要在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位麦戈文的前顾问说："克林顿 20 多岁时，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在总统大选中指挥全国，当然阿肯色州也就不在话下了。嗯，他不会回绝这样的好机会，尽管我们都知道他内心深处可能愿意选择马斯基这类人的。"

一年后，1972 年秋天，麦戈文赢得了与尼克松竞选的提名，参议员的助手萨拉·埃尔曼一早就开车来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要在麦哥文去参加阿拉木的一个集会时与这位候选人会合。埃尔曼惊讶地发现，已有人早早来到机场，急切地等候飞机，她记得那是"一位穿着亚麻上衣的高高的年轻人，站在弦楼脚下"。另一助手对她说，那是比尔·克林顿。他是德克萨斯州竞选活动的协调人之一，准备跟麦戈文讨论时事和政治形势。与这位穿着白上衣的年轻人谈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自言自语说："这个小家伙真是个人物。"

在圣安东尼奥时是克林顿那一时期政治生活的巅峰。

他和希拉里自愿为民主党做选民登记工作，光是 1972 年一年，他们就在那鲁校园外花去大量时间，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时，他们曾在奥斯汀和泰勒·布兰奇合租一套公寓，布兰奇也是拥护麦戈文的志愿者，后来写过马钉路德·金的传记。

后来，希拉里·罗德姆对《阿肯色时代》杂志说，当在肮脏、炎热的圣安东尼奥的西班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并进行游说时，她发现人们"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原本相信"政治是一种变革的过程——你参与了，就能影响结果。可是在得克萨斯，她感到的是麻木、冷漠和恐惧。她非常惊讶："他们竟然是些不愿登记和投票的'美国公民'"。

克林顿受州民主党组织的礼请而成为麦戈文的支持者，他的经历与希拉里不同，后者压根就是坚定的铁杆捍卫者。麦戈文的身后是得克萨斯的自由派。可是，当竞选组织竭力去安抚本特森和其他保守派时，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得很高兴。同其他州一样，这一举措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除了一些不足道的进展——为集会做准备，让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对少数民族选区适当照顾。但当布兰奇在面对"危机时刻问题的严重性与我们平时必须做出决定的愚蠢"形成的对照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布兰奇回忆，比尔·克林顿"热爱这些活动"，他从这派到那派，从这

批听众到另一批听众，巧妙圆滑地向每个人致意，告诉他们爱听的东西。在布兰奇看来，“在县一级政客和激进分子中，他显得游刃有余。”希拉里则记得在 1972 年他“总是不停地在说”：“看，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吸引了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人们。”但是在自由派寡头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得克萨斯州，他只是举办了一些临时性竟选集会而不是在思想上皈依麦戈文。

这段工作结束后，克林顿结识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地方私人侦探，来自得克萨斯州阿尔派恩的奥涅·伊丽莎白·赖特，她是个酷爱抽烟的组织者，是 60 年代得克萨斯大学的积极分子，而且是该州青年民主党最年轻的主席。后来，在小石城她被称为“执行者”，孤傲、忠诚而又能处理危机，贝齐·赖特（贝齐·赖特（BetseyWright）是奥涅·伊丽莎白·赖特（OnieElizabathwright）的昵称。——译注）后来成为克林顿的心腹顾问，并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州府总管工作了近十年。在 1992 年的竟选中，她被任命管理他最隐秘的阿肯色州档案，并且整理材料以反击当地的批评家们。再后来，虽然只是个行政班子外的游说者，但她实际上成为一个处理危机的政府官员，专门处理有关总统的桃色事件和其他阿肯色州的丑闻。可是 1972 年，她还只是得克萨斯州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对与布兰奇住在一起的这对特别的年轻夫妇满怀敬畏。她说：“在这以前，我从未像那样抛头露面过。我是说，他们在得克萨斯州打发整个学期，从不去听课——然后他们又回到耶鲁，赶期末考试。他们真让人胆战心惊。”

1972 年秋天，贝齐·赖特和其他人显然不知道希拉里·罗德姆已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并自己在为学校做独立的研究工作，而此时克林顿还在上四年级，常常逃课，然后在考前恶补。赖特，这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年轻律师拥有领导新一代妇女的政治家的能力，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比起克林顿来，罗德姆显然更有潜力。

罗德姆似乎很少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对政治也不太投入。

布兰奇说：“当他的目标已那样明确时，她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来得克萨斯之前，克林顿曾在康涅狄格州为麦戈文工作过，在那里，他从全国性大选中第一次获得进入阿肯色政坛的资格。1972 年 6 月初，麦戈文已确定被提名，克林顿来到了小石城，要在先于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民主党州会议上修筑他的政治篱笆，最重要的是，做一次自我亮相。只要从耶鲁一回到家中，他就到议会大厦，凭藉雷蒙德·克林顿在温泉城的一些老关系，如阿肯色州政府发言人雷·史密斯，被介绍给立法要员和地方政客们。现在，仅仅离他的 26 岁生日只有几周时，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以同样的身份与阿肯色资深民主党政客打起交道——同样重要的是——以一种他们期待已久的慷慨大度形象与当地媒体接触。在他所喜欢的候选人中，他既要争取人们去支持麦戈文，又不能冒犯阿肯色显赫的国会议员威尔伯·米尔斯。《阿肯色新闻报》特别指出：“他在阿肯色政坛中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他谈到与米尔斯、戴尔·邦珀斯州长和其他人的友谊时说：“我到阿肯色来主要是为了要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

在一次主要谈及他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的特别经历的采访中，克林顿指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的政治经验与尤金·麦卡锡或者博比·肯尼迪没有什么关系，倒是来自土生土长的一些著名的阿肯色政客那里，像弗兰克·霍克特和富布赖特议员。尽管南方对麦戈文心存疑虑，但土生土长的比尔·克林顿愿意跟每个人合作，而不会在乎他们的观念如何。

在州会议的走廊上，克林顿显得尤为咄咄逼人，他声称知悉各种选举的内幕，并试图给代表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站在麦戈文一边，在米尔斯的代表们弃权之后，他们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麦戈文的票，斯蒂芬·史密斯，当时最年轻的一代州议员——年前比尔曾在州议会大厦见过他——拒绝了克林顿的巴结，在代表选举中取胜，不过他很快成了克林顿的好友，后来又成为他的助手。

接下来的事情对人前人后的克林顿都是一个小小的警示：表面成功的形象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972 年夏天在阿肯色的麦戈文竞选班子中，克林顿一直小心地避开了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尼克松在整个地方的种族主义呼吁、共和党对阿肯色至关重要的消除贫困计划的改革，以及当年 5 月美国对越南地毯式轰炸并炸毁了海防港之后战争继续升级，还有几周前的“水门事件”，那已经被证明与白宫有关。《新闻报》满怀同情注视着这个“在棘手的情况下如履薄冰”的年轻人，并称他为“一个好政治家”。

当时，希拉里第一次与克林顿一道来到阿肯色，她并不在乎要抛头露面。当他四处寻访他在温泉城的那些老朋友，包括以前的女友们时，希拉里却在家闭门读书。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一位前女友说：“在比尔·克林顿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位女人不想总和他泡在一起，可是她却有自己的兴趣所在，而且从不靠他来证明自己。”

☆☆☆

那年 7 月在迈阿密大会前夜，克林顿对一位阿肯色记者说：“在麦戈文总部，最奇特的事是那里没有追求自我表现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不管他如何优秀——都只是集体中的一员”。他这么说，尽量淡化自己在迈阿密的幕后表现。通过斯特恩斯和竞选组织中的其他上层人士的关系，克林顿将自己定位为阿肯色代表团中被提名人的唯一协调人。在州协调员们“几近沸腾的屋子里”，他的小桌和对讲机跟前总是挤满了人，候选人的活动宣传车就停在会场外——这里是各显神通的地方，什么样的本事你都可以使出来。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比尔·克林顿和他代表的州格外引人注目。

麦戈文的一个助手说：“他将成为阿肯色州的一个大人物，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没有人能像克林顿那样熟悉阿肯色。”一位工作人员听到过这样的嘱咐：“你只能通过比尔来为阿肯色工作。”如果有人冒犯了克林顿所持的权威，那你面对的就不再是平常灿烂的微笑，而是暴跳如雷，一位同事说：“哪怕是最细微的过错，他都大为光火。”

可是克林顿有里克·斯特恩斯这样的人来给他“打圆潮，给他做些“善后工作”。

一位竞选组织的协调员说：“我当时就在离他几英尺的电话机房工作，可我却不能同阿肯色州的代表布朗尼·莱德贝特或其他人讨论我正做的其他工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不平。”另一位麦戈文的助手——他的桌子离克林顿仅几步之遥——说：“你不可能有机会，比尔·克林顿要当阿肯色州州长或更大的官，每个人都开始明白这是他一生的抱负所在，他简直着魔了。”

与此同时，在会议上，人们有一种感觉，温泉城的比尔·克林顿已成为代表团与会议之间的沟通者和代言人。阿肯色州的代表们——很多都对克林顿的事业有决定性影响——都看出他的大气象：他的影响力已上升到全国范围。

斯蒂芬·史密斯说：“这个 25 岁的耶鲁学生在党内名流和权贵之间的

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密斯当时和其他人一样，还不了解克林顿的内在性格，在迈阿密被克林顿征服的代表中，还有一位来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律师、富布赖特的前助手，37 岁的詹姆斯·布莱尔，他与克林顿夫妇的亲密关系和他的建议不仅在克林顿的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而且对希拉里·罗德姆的自我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11 月，在水门事件指控者和参议员调查员第一次作证前大约 6 个月，理查德·尼古松以近 1800 万张选票大获全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优势票数。当克林顿和罗德姆在得克萨斯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并初见成效时，尼克松已以领先 100 万票或者说领先 30%的得票率的骄人战绩击败了麦戈文。大选后的第二天，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聚会上，麦戈文竞选组织者负责人之一、精疲力尽的弗兰克·蒙柯威茨语惊四座，让垂头丧气的失败者们心头又升起了希望。

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揭露出大选期间被掩盖的水门事件的真相。人们将发现自己选出来的是个骗子。这一切太丑恶了，人们将不愿回顾 1972 年发生的事情。”

不管尼克松是否下台，正像寓言中说的，灾难过后，往往是两败俱伤。首先是麦戈文的竞选组织代表了一种美国政治中的强烈的激进主义。其次，同样地选民们反过来也表现出巨大的向新政回归的保守潮流。H．西奥多·怀特称之为“在公开控制、平衡私有财富和集团影响时减缓权力的膨胀”。

这种简单想象力的背后，是麦戈文在阵营里的千差万别，从南达科他州的温和的领袖到下层人士，他们对战争的一致反对的态度掩盖了在平等、权力等基本问题上认识的深刻差异。一位高级助手说：“他们的政治基础是战争，在竞选活动中，根本不谈及其他话题。正是汉弗莱和一些民主党人在初选中攻击麦戈文，然后又攻击尼克松，称他们为激进派，麦戈文阵营中除了战争的话题没有别的。”几年后另一位竞选组织中的老兵说：“操纵竞选组织的像加里·哈特或里克·斯特恩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 60 年代的反抗者或者是真正的改革者，他们只是雅皮士、意在掌权的实习政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同样地，在关于国家趋于保守的鼓噪中，美国政府和政治正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政策，并主张介入。与此同时，公众痛斥政府“干涉”帮助少数民族和平民的计划。

1972 年大选本身就是一条分界线，其中巨额金钱滚滚进入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尽管后来在政治资金中有所谓的水门改革，但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毫不足奇，正是尼克松——福特政权及相应的 1973 年——1976 年的国会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矗 80 年代有庞大的五角大楼财政预算，后来，各大公司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从联邦财政中攫取利益。

正如在那次聚会上弗兰克·蒙柯威茨对同伴所说的：“没人想了解这些”。

正当民主党人迅速向右翼靠拢，竭力丑化他们痛恨的 1972 年的候选人时，比尔·克林顿也紧跟潮流。在他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克林顿严肃地对专栏作家戴维德·布鲁德说：“对大多数美国选民来说，令人头痛的倒不是（麦戈文）对战争的自由派态度，而是整个运动是不稳定的，是非理性的。这一竞选组织和这个人没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国内的大多数组织都是这样。”

为了谋取官职，克林顿再也没有提起他在阿肯色时与麦戈文非同一般的关系。像当时的一些民主党人一样，他在 1972 年后，对自己的政治观点表示痛悔，这些民主党人也开始用理查德·尼克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且发现事实地的如此，虽然麦戈文的几个前助手都找到了相同的归宿——蒙柯威茨自己则当上了薪水丰厚的华盛顿游说者——可是其它人却靠边站，一位在迈阿密的会议期间曾与他共司工作的人士说："那些愿意与 1972 年以后接管的政权妥办的人自然都成功了，克林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另一位则回忆说："克林顿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意义。但是他既不是后来自称的那种自由派，也不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新派。我想，他表面是自由派，本质上是马斯基的信徒。"

1972 年一位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士说："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比起后来要自由得多。在阿肯色时，他学会了如何隐藏，当一个私下里的自由派，而且长时间都是这样，你不得不疑惑他究竟'站在哪边'，从麦戈文那里，克林顿学到了什么？这很明显——在人格取向上你能有自己的好恶，可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尤其是在那次大选之后，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了。"

☆☆☆

他们又回到了纽黑文，依旧住在一起。在回阿肯色参加第一次政治竞选之前，他得拿到他的法律学位，她则要完成研究，而这项研究正是为了他在耶鲁的最后一年两个人能待在一起而安排的。

不管希拉里对比尔·克林顿的爱如何让人感动，她在 1972 年—1973 年的研究工作可不只是一项轻松任务。在耶鲁法学院、医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项目中，她被要求去调查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儿童权利的保护情况。她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威尔斯利时她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在蒙代尔委员会工作时她所目睹的移民儿童的悲惨境遇更加强了她的信念，而且在耶鲁她还研究过婚姻家庭法。研究计划中她写成了三篇文章，1973 年到 1979 年相继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和《耶鲁法学期刊》上，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儿童权利：一份当代报告》。

这是她以关心儿童问题为长久职业的开始。

不像她后来的演说或讲授，她在耶鲁时的写作并没有因比尔·克林顿的选举而受到影响，因此，这些文章是作为很少见的材料独立保存下来，从中可以窥见那时希拉里·罗德姆深信不疑的是，有那么一天，她将和克林顿一起带领人们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社会。

在 60 年代末政界和知识界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关心儿童权利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并帮助了她的研究。她曾一度作为耶鲁法学院约瑟夫·戈尔茨但教授的助手，戈尔茨但和安娜·弗罗伊德、阿尔伯特·索尼特编撰的论文集《关于儿童的最高利益》和社会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的《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当时的名著，希拉里当时也参加凯尼斯顿的研究课题。

自 70 年代以来希拉里·罗德姆的文章大多只是一些关于法学的线条性提纲，在许多人看来也不过尔尔。她不再倡导当时某些人支持的儿童权利的恢复，而只是主张法庭应该停止以前的做法，即除非已满 18 岁或 21 岁，法庭会自动视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能力者，取而代之的是，法官和其它仲裁者应根据具体个案来确定孩子们是否有能力对他们的父母作出某种特别的明确表态，至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如此。她写道："我认为这种对家庭问题的介入应该加以限制，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将造成深远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她的这种观念似乎只能成为这一领域的脚注，而绝不是出自一位未来第一夫人的手笔。

文章后面附有一些具体而生动的事例——诸如流产、医疗、居住区和选择学校的之类的问题，这些对一个儿童来说，通常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必备条件。在 1971—1972 年间，她在当地的联邦法律援助项目工作，这是一项为穷人和纽黑文法律援助协会设置的计划，也是针对康涅狄格州盛行的官僚作风导致儿童扶养问题被忽视而创立的一个组织，在那里，希拉里亲眼目睹了虐待和剥夺儿童权利的惨状。她经常在财政会议上讲述她的所见所闻，这样，给她的前任雇主和爱做表面文章的儿童保护者、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留下了一个喜欢批评别人的印象。纽黑文的一位同事说：蒙代尔“对她常常感到头痛”。

同她在移民劳工委员会工作和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一样,这一次的工作经历又向她展示了另一个美国形象。后来,在希拉里·罗德姆的法律实践和对国家政策的参与中，批评家们不解地发现，里面很少有对人类现实的关注。一个人写道：“这些文章太抽象了，不能令人满意。”在文章中“正常的家庭不是建立在情感、限制和牺牲之上的组织，而是一个劲要求自由的单独权利承受者的任意组合。文章中并未指出孩子们究竟需要什么，而且他们的需要又是如何五花八门”。另外一些人，像玛格丽特·奥布赖恩·斯坦菲尔斯，在《公共福利》周刊上写道，她文章的要点暴露了她“历史和社会学上的幼稚”。当然，斯坦菲尔斯和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我们知道帕克里奇和希拉里·罗德姆暴虐的父亲在这位 70 年代的年轻女律师心头投下的阴影，以致于她时常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专制”。并已把倡导儿童权利视为“一场与家长制长期斗争中的重要步骤”。

著名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拉希认为她只是 20 世纪初最热诚的改革者们的一种并大创见的传声筒。他说，她关于儿童法律权利能力的论断“等于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要求保护个体的自主性”。正像拉希描述他们圆滑的纲领时所指出的那样,“只是试图去帮助”这个革新时代的“儿童救助者”,而不涉及混乱的国家权力机制如何诱发了许多不幸家庭中的虐待儿童事件。

然而，在罗德姆耶鲁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并非是其中的心理学或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见解。在她关于“无权利能力的”家庭的洋述背后，是少年犯法庭和最热心社会计划不可能涉及到的巨大社会现实。如果家庭正在解体，如果在邻居、学校和机构里发生了惊人的财政赤字，那么这场灾难就应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根源——追溯到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为特别财团服务，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

美国的儿童状况正是这种价值、这种权力和特权安排最明显的结果，他们只是政权市场规则下最大的牺牲品。

在这一市场中，当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度日维艰时，大公司巨头们正中饱私囊，大肆搜刮；当公共日常保健和医疗保险及高等义务教育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干预时，巨大的官方援助和免税政策却大行其道。正是孩子们成了商业化和物质消费狂潮中最大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美国儿童早晚会亲身领受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教训——在“真实世界”的金钱和权力面前——盛行和持久的东西中，再没有什么比政治和政府更不严肃的了。

70 年代中叶罗德姆写道：“只有在这个国家中执行一个统一的家庭政策，那样我们为孩子们做什么才是有效的，才能使他们免受伤害。”在某种

意义上说，她心里也明白，要保护儿童，必须深入到造成恶果的更大的社会体制中、维护私人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和各州首府及华盛顿复杂虚假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她在威尔斯利研究贫困问题时，她已经多少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政治，事实确乎如此，她所忽视的这一社会体制仍将使她的建议成了治标不治本的“灵丹妙药”。

☆☆☆

1973 年春天，他们在纽黑文的最后一周里，多萝西·罗德姆无需解释的疑问困扰着他们：“我女儿怎么办？”好几个人都还记得克林顿对跟他一起生活的强烈自主意识的女人充满了爱意，急切地想拥有她。他对每个人都大谈希拉里如何是一个“明星”，一位朋友说“好像他已拥有了她”。对她来说，要为自立而斗争的话，现在在雄心与爱情之间面临着新的难题。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并非易事。她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从某个地方来……他知道他想去那里要做什么。”如果她跟他去阿肯色的话，她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似乎很模糊。他显然希望她喜欢并适应那个地方。她第一次来小石城时，克林顿去机场接她，去温泉城只有 50 英里，他开车竟用了八个小时，一路上像个孩子似的对她大献殷勤，向她描述淡绿色小山中的每一个景观、胜地和路边餐馆。

他告诉他的朋友布朗尼·莱德贝特——小石城的一位像她一样热衷于家庭问题的积极分子，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棒。”她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工作”，最好是在她熟悉的儿童权利保护领域。而在阿肯色这种工作太少了，对一位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的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事实上，70 年代初，阿肯色人正开始了解到公共利益法的重要性。那里，只有初期的消费者运动和社区行动，有效约束当地政府的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做，初步的捍卫民权、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运动刚刚对该州的统治者发起挑战。从事这一工作的律师和积极分子们站在低收入的贫民一边，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选民所不理解，还遭到地方政权和社会精英们的排挤和嘲讽。跟小石城权力结构中的权贵、律师和政客们相比，他们只是些孤军作战的散兵游勇。

一位熟悉两派的关注公共利益的律师认为，“这是一项帮助人们创立新生活的工作，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也可以帮助你自己或使你丈夫当上州长。”另一位谈到公共利益对阿肯色权力的挑战时说：“在那些名单和提纲上不会出现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样的名字的。”

这一对在当地公共利益法方面做出的让步大还是迁就克林顿的政治野心时做出的牺牲大，以及多大程度是她个人的选择，已很难说清楚。虽然朋友们相信，这一充满思想斗争的决定既是她也是他做出的。在她的职业独立和政治责任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

布朗尼·莱德贝特后来对一位作家说：“显然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计划如何这样做，而且我认为，在她的独立问题上，根据他俩的私人关系，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对这一点很开放——但有可能是她感到自己有些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很清楚，那正是他的一贯目标。这样一种关系比许多人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5 月，没有参加毕业生和著名法律事务所的供需见面会，他们离开了耶鲁。正如他对自己一贯期许的那样，比尔·克林顿只想回去。他在费那特维

尔停留了一下，在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申请一份教职，从前他曾对霍姆斯上校说过他会进入该校学习的，现在他拿出了他在牛津和耶鲁的文凭，并且以他明快的坦诚赢得了校长的信任。克林顿对他说：“你或许想要我在这里教上一年，因为我什么都可以教，而且不会在意是什么工作，我也不会在乎聘用期，你什么时候想撵我走都可以。”

利用以前华盛顿的关系以及她研究课题的赞助人的帮助，罗德姆又重新与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起工作，不过现在又成了埃德尔曼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律师，这是一个大公司资助的华盛顿方面的团体组织，旨在保护穷人、少数民族和残疾儿童，曾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争论。虽然 1973 年夏天她也参加了小石城的律师资格考试，但在她的朋友们看来，这也是一个自然、明智的选择。

一位在考场上巧遇的威尔斯利的朋友艾伦·布兰特利惊奇地问她：“你到这来干什么？”她解释说，在华盛顿的工作要求她务必通过某个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她就随便“选择了阿肯色州”，布兰特利记得她是这么说的。

在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还不满半年，她就被约翰·多尔招募去了。这位国会司法委员会首席顾问，因为在 1974 年要求弹劾理查德·尼克松而发迹。多尔是一名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加入司法部，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任职，在投靠肯尼迪在纽约的贝德福德——斯图维尚建筑公司之前，负责严重侵犯民权事件的调查，他属于那种逐渐退出舞台的类型，是旧共和党中的温和、正直、廉洁党员，其才智力各派所敬重。为了招募一个职员，他叫来了他在司法部的老同事，耶鲁的伯克·马歇尔，他则给多尔推荐了两个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对后者，马歇尔评价说：“非常聪明、思维清晰，有组织才能。”克林顿当时早就全身心投入到他的国会竞选中，自然拒绝了这一机会，但很快就推荐了他的女友。多尔不动声色他说：“我尽量叫她来吧。”

1974 年 1 月中旬，希拉里·罗德姆开始和从事调查的新同事们一起工作，在 60 名调查者、职员和秘书中，有 44 人是律师，在其中她的职务最低。其中的大多数律师，不管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是多尔从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公司法律圈里挑来的。弗雷特·阿特舒勒是一位来自西部的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律师，不久就和这位来自保护儿童基金会的年轻女人成为朋友，他说：“我们都被认为是激进派，我想我们都是雇主作为政治姿态的体现而被雇来的。”在她的其他年轻同事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与她关系很好的威廉·韦尔德，后来他成了马萨诸塞州的共和派州长。一位多尔的职员说：“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头牌法律事务所那样的机构，可以说是专门对付心狠手辣的尼克松先生的。”

调查组的职员们后来又搬进有些破旧的旧议会旅馆里，它坐落在雷伯恩议会办公大楼的对面。这份工作也意味着暗地里的性别歧视，如果说还不是很公开的话，阿特舒勒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国会山就是一个搞性别歧视的地方。”罗德姆是专职人员中仅有的三个妇女中的一位。由于容易受到批评和歧视，她常常显得好斗，但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她也小心翼翼，不抛头露面。后来一位年长的男性同事说：“她对问题很敏感，但从未大喊大叫。”

在这种环境中，希拉里·罗德姆第一次感受到的政府气氛，是为一些肮脏的秘密所包围，并且要严格保守秘密。多尔将职员们的房间又改造成装

上栅栏和铁丝网、严格看护的堡垒，严防任何外泄。他坚持职员间应该一丝不苟，超越党派偏见，对媒体和公众保持缄默，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在司法委员会上抱怨说：“我们做得太隐秘了，以致于对尼克松的指控一直在暗地里进行，他或许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

按她事后的讲述，她曾被指派去听尼克松那些声名狼藉的磁带录音，并听过一盘被称为“精品”的带子，里面记录了这位苦恼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谈话，以及对自己真实意思嗑嗑巴巴的解释。然而，年轻的律师们是很少有这样的特权的。保守的多尔主要依靠文件和其他人的证词，而不大相信计算机或其他电子“小把戏”。一位观察者写道，里面煞费苦心编辑了 50 万张可称做“交叉档案系统”的文件，“精确地记录了他的一生。”可是在严格的职员等级制度中，哪怕是高级律师们也不能接触到司法委员会的机密材料，这一重要角色只被赋予给首席顾问和他的最高助手。

同样地，她只能在其他男性律师手下协助工作，监管调查程序，处理一些传票、证件移交，充当白宫的辩护律师的角色。这些程序性工作使她只能处于边缘，不能像某些人那样，能接触到水门事件中关于滥用权力这样的激动人心的证据材料。但是，尽管有多尔的严格保密制度，职员们还是经常谈论这一丑闻，而且不管她的职责如何，罗德姆还是有她独一无二的优势。

那个春天和夏天，他们都忘我工作，顾及不了生活。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她居住在离国会大厦不远的一个朋友家中，独自一人，生活很简朴。多尔自己则睡在一间破旧的地下公寓里，离国会旅馆隔了一个街区。唐尼·拉德克利夫写道，她和比尔“经常电话联系”。一度克林顿曾计划去华盛顿一趟，而希拉里对一位已开始涉足政界的高级律师伯纳德·努斯鲍姆说，她希望他能见见她的“男朋友”，努斯鲍姆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的途中她非常自信地说：“他真的很不错，他将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努斯鲍姆觉得“这有些像疯话，我们当时在调查组压力很大，而现在这里竟有人告诉我她男朋友将成为总统。”第二天，他们两人相互道歉，而此后数年努斯鲍姆一直和希拉里·罗德姆保持联系，并一直帮助她处理法律事务，最后，还做了一段短暂的、运气不佳的白宫顾问。

到 1974 年仲夏，多尔的卡片工作已近尾声。委员会仔细研读了大量活页材料，他们称之为“资料提纲”，涉及到了水门事件中的所有作恶者。尽管受到国会司法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指责和嘲讽，并受到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和利昂·贾沃斯基的公开非难，但正是约翰·多尔的调查最终不断地涉及到了理查德·尼克松。这项工作最终招致了议员表决提出弹劾，要求总统在证据确凿的参议院审查之前辞职。

尽管多尔已尽了全力，但更大的更可怕的滥用政治权力是在尼克松下台之后才为公众所了解，即便如此，还是得到杰拉尔德·福特的赦免。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真正的弹劾来除掉一位腐化的总统，这种政治进程只会关起腐败之门，而不能清除它。水门事件所暴露出的肮脏的金钱政治，和一些更无耻的政治手段，在这一时代浮光掠影般的改革中，只会在 90 年代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地方继续下去。

对于这位为多尔工作的年轻妇女来说，有一点特别具有讽刺性。20 年后，希拉里·罗德姆作为第一夫人，将会目睹到这一幕。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一位著名的老政治家，在国会上受到共和党领导的欢迎和民主党人的爱戴。1994 年春天尼克松去世后，希拉里的丈夫代表整个国家，对他表示称

赞和敬意。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举行的奢华葬礼仪式上，他们将会听到水门事件中未受审判的共谋犯被奉为一个英雄和国务活动家。这一切看起来好像调查团那本严肃的“材料提纲”从未出现过。

☆☆☆

随着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下台，希拉里·罗德姆决定去阿肯色加入比尔·克林顿的队伍。弗雷特·阿特舒勒谈到她的这次行程时说：“这并非她的意愿所在，也不是她开始想做的那些事。”有人认为她或许回到保护儿童基金会工作，也有人猜测她将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开始奋斗。

卡罗琳·埃利斯说，一部分人对她在阿肯色的政治优势看好，可是“她这边也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会成为他的一个附属物。”埃利斯对朱迪思·沃纳说：“我那时的反应是，她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基础，在阿肯色，即使她有才能也很难干出点什么名堂来。”

就如同他当年推销自己一样，克林顿为她的第一份工作到处打通关节，把她推荐给了阿肯色大学法学院。他们谈起这一段故事时说，夏天之前他就把希拉里介绍给校长，8 月里她跟学校联系上了，并得到一份“合适”的教职。可是与此同时，她又跟威廉姆斯和康纳利著名的华盛顿游说和政治组织接触，那里的合伙人史蒂文·乌明已准备雇用她。

乌明记得希拉里·罗德姆“在 1974 年那个夏天快要结束时，已了解了华盛顿政坛的大致情形。她知道在这里事情如何运作，国会山的路数也已摸清。”

后来，她在调查组时的同事弗雷德·阿特舒勒和其他人都看出她在去阿肯色教书一事上犹豫不决。他后来说：“这工作不适合她，她的期望更高，我想那一阵子她很为难。”他曾向唐尼·拉德克利夫描述过那“令人伤感的”一幕：在多尔职员们的最后一次聚餐上，他们所有人看上去都各自找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阿特舒勒去洛杉矶的一个公益机构，而他们都认为希拉里的前途就像费那特维尔的那一潭死水。另一个人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想她最终的目标是白宫，她不会提及最终的复仇，而且她也拼命工作，达到这两个目标。”

他们的朋友萨拉·埃尔曼开车送她从华盛顿去阿肯色，一路上都在试图劝说她，车子刚离开华盛顿几英里，埃尔曼就问她：“你干吗为了这个小伙子，舍弃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走得还不远，你还可以改变主意。”当时她们两个站在蒙蒂索罗，18 年后，正是在这里，希拉里·罗德姆和她丈夫开始进驻华盛顿就职。

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六，她们驱车开进了费那特维尔，那天正举行阿肯色对得克萨斯的足球赛。她们先前往克林顿的竞选组织总部，那是雷蒙德伯父名下邻近学校的一座破旧的平房。一个志愿者正在数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卡片和便条。克林顿经常这样做，把它们扔在桌子上，让别人去整理。有人回忆，当时希拉里·罗德姆“目瞪口呆，发现克林顿的总部里如此乱哄哄，没有纪律”。当然这不是最糟的。这两位刚从华盛顿来的女人还能听到球场传来阵阵尖叫：“噢罗罗罗、噢罗罗罗、猪，猪，猪”，这是阿肯色主场啦啦队的队歌“叫猪歌”。

最后埃尔曼问她：“上帝啊，希拉里，你疯了吗？在这里你怎么活下去？”

“我爱他”，她回答说。

第二大，埃尔曼就看到这位决心己定的朋友正有条不紊地管理竞选办公室工作。埃尔曼听了比尔的一段竞选演说后突然觉得希拉里·罗德姆的牺牲似乎是有道理的了，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显得很合乎情理。这位麦戈文的前助手说：“我知道，他将成为我国总统，而且我再也不怀疑她的判断力了。”

十　费那特维尔——“志在必得”

离开耶鲁，比尔·克林顿开始经营他在阿肯色的日子。

这才是事业和人生目标的开始，这已不仅仅是获胜，而是要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

留着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着随随便便的他，除了略显懒散外，大体上还算得上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有为的法学院讲师。学生们对他的热情有一种“说不清的好感”，像有人说的那样，尽管能看出他“并不是多么全身心地投入备课和教学”。他们还得学会忍受他对期终考试成绩的久拖不决，有时要等个把月才能张榜。1974 年五一劳动节，在一次高尔夫球比赛中，他的一个学生扔下球杆激动地狂呼大叫着跑过球嘲向一位刚被比尔·克林顿宣布为学年第一名的同学报喜”。他在学生中培养了不少未来的政治支持者和部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改弦更张，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忠心耿耿。他这个阶段发展的某些关系到后来的白宫期间才产生影响。

就任法学院伊始他就请富布赖特为他铺平从政之路。

参议员给州议员小鲁迪·莫尔和费那特维尔的另外一些人打了电话，预告了这些曾在他手下实习的新人的登常有人回忆，克林顿几乎毫不费事就建立了自己的小圈子，向每一位新朋友大讲他的计划，并且“满怀深情地”谈到希拉里·罗德姆。莫尔记得，这对夫妇几乎立刻成为奥扎克社区的知名人士——先是他本人，然后是他们俩——这跟“他们在此前做的大量铺垫工作”有关。亮相没多久，克林顿已开始无所顾及地谈论他所要做的大事，他醒目的能力、蛊惑力和热情把人们心头的疑虑一扫而空。“剩下的问题只是树立一个合适的目标”，莫尔说，谁都看得出，克林顿已不再需要在较低的位置上实习，而且，像“是瞄准地方政要还是谋求某个司法界职务”这样的彷徨也不再成为问题。

在 1973 年至 1974 年的阿肯色政坛，有影响的年轻民主党政治家还真不少，而且个个都很棒，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戴尔·邦珀斯州长年仅 48 岁，刚刚完成被莫尔称为“取得了巨大改革成就”的两届任期。正准备挑战、1974 年富布赖特参议员位置，足智多谋的邦珀斯已在私下里被当做潜在的总统或副总统提名人广泛提及。觊觎可能空出的州长位置的是 39 岁的戴维·普赖尔，已在国会中任三届议员，因勇敢地调查病弱老人被虐待案而名闻全国，1972 年竞选参议员时以微弱差距败给号称地位难以动摇的约翰·麦克莱伦，最后，还有被誉为阿肯色政坛神童的吉姆·盖伊·塔克，1972 年，27 岁时任小石城检查官，两年后，被选为州首席检查官，1973 年夏，他们都成了比尔·克林顿的拦路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他们的各奔东西或相对降温，将成为他异军突起的关键因素。

“安排办公地点没用太多时间”，莫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前面有难以超越的民主党精英人物，他决定避实就虚先做点什么，于是他很快选择了一个显示口才的竞选活动，挑战共和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米特在阿肯色第三区的第四个任期。比起阿肯色州北部、西北部，包括史密斯堡以及两个最大城镇费那特维尔和温泉城，这个以白人为主、乡区面积较大、蓝领阶层聚居的区被观察家称做“阿肯色最易摇摆的地方”，唯一的一个议员席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是两党争夺的焦点。这几个由所谓山民共和主义思想控制的县，自内战以来就是共和党的地盘，其他地方是被民主党一党把持的，这次竞选对克林顿来说难度不校作为富有的木材公司老板在第三区并没有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哈默施米特才在趁 1966 年反对约翰逊运动高涨时意外击败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开始自己的任期。他的和蔼可亲犹如教皇保罗，在议会中决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类型，每个私人的请求他都尽量满足，州里或区里定的事他总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在争权夺利的场所也难见他上窜下跳，投票时也不讲情面地以选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他在议会中永远是站在极端保守的立场上的。对节水法案、本地为患黑肺病矿工设立医疗保险、农场移民劳工的社会经济权利、把选举权年龄降为 18 岁、结束越战等等，他一律反对。相反，对公共停车场计时收费、警察“不敲门”进入私宅、反对希拉里·罗德姆和其他人搞的社区行动计划等等，他却倾注极大热情。在国会山，他成了另一位共和党新人，休斯敦石油富翁乔治·布什的密友。在 60 年代末，他俩经常乘布什的快艇沿波特马克河疾驶而下，激起高高的浪峰同时，偶尔也开两句玩笑，说年轻的乔治总有一天要当总统的。

哈默施米特的经营范围包括原木、家禽饲养、商业，他的买卖主要集中在阿肯色西北部。有人说，他属于那种“民主共和两党都喜欢的”类型，这恐怕是由于他广开财源的缘故。“即便是在 1974 年那样的情景”，一位政治观察家写道，“我们的‘保罗教皇’……仍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公益机构。”

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势力，克林顿已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一下水门事件的未平余波；一位观察家说，“他早已成竹在胸，尼克松就能帮他扳倒哈默施米特。”有组织有计划地，克林顿的班子有条不紊地开始运转起来。鲁迪·莫尔陪同他在第三区逐个拜会主要的民主党人士。北方的那些乡村领袖因与哈默施米特有生意往来而对拜访者不冷不热，而那些“城市元老”，据莫尔回忆，“又因他太年轻，思想太活跃而不喜欢他。”但还是有一些老关系可以利用。周末，他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温泉城一位儿时伙伴的家中，让她至少负担两个县的协调工作。他把那些已用旧的四乘六见方的卡片摊在厨房的桌子上，每张都记载着自高中以来每位同学以至熟人的情况。一位朋友说，“我相信，那些卡片到现在他还留着呢。”

他很快发现还需要更多普通党员的姓名，这个问题在他与·卡尔·韦洛克成为朋友后立刻就解决了，这位阿肯色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曾为一位未能被哈默施米特拉下马的民主党议员工作过。1973 年秋的一个夜晚，坐在韦洛克在费那特维尔的家中壁炉前的地板上，克林顿表示他背水一战的决心后，老人爬上楼梯，取来了前任议员用过的已落满灰尘的卡片资料。比尔的反应可以说是感激涕零。“到那时为止，除了他母亲，还没有人鼓励过他”，韦洛克记得他曾这么说。

“我竞争这一议席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再找不出另外的人”，克林顿喜欢这么对记者说，而实际上，被提名的还有另外三位民主党人。如果说他的这次

政治亮相是非主动的，那是很难服人的。“他在普波县的野餐会上露面……我们历来是以它作为竞选活动的开始”，一位民主党人士回忆说，“他一张嘴，每个人就都清楚了。”

莫尔和其他克林顿的追随者都以为，他们这位年轻的竞选人缺少“一位能给他提供大笔资金的大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他并没有求助第三区那些经费筹措人、政坛元老、政府官员以及后来才赞助他的那些长期捐款人。

不过，1973 年至 1974 年的政治活动资金，他确实是从自己的大亨那里筹来的，最开始，克林顿的钱来自一些更新的。

更年轻的银行家和律师，其中有的赞助者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如前共和党州长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的继女。还有大量捐款来自阿肯色州外，包括纽约银行家 E．戴维·爱德华兹的 1000 美元，有的来自牛津、耶鲁、麦戈文组织中的朋友，比如在得克萨斯时同住一室的泰勒·布兰奇，甚至还有署名希拉里·D．罗德姆的 4oo 美元，所在部门栏填的是“儿童保护基金会律师”。

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笔个人贷款是 1974 年 2 月来自温泉城第一个国家银行的 1 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贫穷的阿肯色普通家庭的年收入。这真是一场及时雨。他在这种“关键时刻”总有雷蒙德伯父“为他在银行间奔走”，一位亲戚说。“雷蒙德总是在给他最需要的帮助，这一点毫无疑问”，家庭中另一位成员说。“没有他，比利根本拿不到那笔贷款。”

在儿子说要参选时，弗吉尼亚就在斯卡利街的家里召开过一个会议。与会者除了雷蒙德伯父这位“退休的投资者”，还有温泉城的“药店店主”加贝·克劳福德，那个在密室里登记赌注的人，罗杰·克林顿形影不离的酒友，会上，雷蒙德表示免费提供几间老房子做竞选总部，克劳福德捐了一架私人飞机。“他们过去都曾对他有所支持，”做母亲的在写到这些过去与这个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又将对比尔迈出仕途第一步有所贡献的人们时说，“现在，他们要让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19 科年 3 月末，初选两月前，温泉城银行贷给比尔·克林顿的钱要超过与他最接近的民主党参选人七倍。那么多申请个人贷款的，属他得到的最多，但这还只是开始，这种决定性的支持要延续到他的总统竞选而且，支持他的还不只是银行和温泉城的三亲六故。

他还去找了老朋友文森特·福斯特，这位在戴维森和范德比尔特受过教育，两年前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正准备正式加入小石城最有声望的罗斯法律事务所。福斯特与克林顿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变得日益复杂，最终以 20 年后一个夜间从白宫打来的电话而悲惨地结束。可是，在 1973 年，他确实是以最真诚的少年伙伴情谊欢迎克林顿的到来。

福斯特对他挑战哈默施米特很吃惊。“我怀疑那个决定”，他对记者说过。“可当时那已是箭在弦上的事了。”像以往一样，他准备站在朋友一边。不久，在几年前见过这位罗兹学者的资深合伙人的默许下，比尔·克林顿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吃特吃的大户——靠罗斯事务所的良好声誉，他开始在该事务所代理的工商界精英中挑选他的赞助人。一位当时供职于事务所的律师回忆，“他们起了他们应起的作用，然后就轮到了其他一些人。”

5 月中，初选前两周，他已募集到了 36000 美元，不但超过了本党竞争者，而且也超出不紧不慢自以为是的哈默施米特。他为初选筹措的款项已达

到 5　　美元。和其他选区比，这也许只是个小数目，而且对全州范围的竞选旅行来说，也的确太少。而在当时当地，钱是最大的决定因素。即便在第三区那样的绿色山区也得靠它买到至关重要的优势。

在初选的 5 月 28 日，克林顿得票 44%，领先其他三位比他名气大的竞争者，这里面还包括一位参议员和市长。

决胜投票时他又以 77%超出，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竞选者。

克林顿在筹钱方面很顺手，似乎不用费他什么事。助手们回忆，他对那些掏钱给他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而他自己，那股从容不迫的劲头，不管是在小镇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小石城豪华气派的套间中，一直保持不变。全国性的劳工组织——钢铁工人联合会、机械工人协会以及另外一些机构——也都慷慨相助。钱虽然大部分来自商界、银行、保险业以及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律师们，但他们从选区得到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大大弥补了金钱的损耗。“钱从有钱人那里到了这里就不一样了”，一位民主党人说。“那个与哈默施米特斗法的白衣骑士在奥扎克初选得手后已是有了更高目标的干大事的人。”

克林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先是乘 1970 产型小型飞机。

然后又上一辆设有躺椅的雪佛兰轿车，沿高速公路穿越北部的山林和峡谷。他以其充沛的精力，尤其是夜间不休息，令工作班子中的人叹服不已。一开始他只是偶尔用一下克劳福德的飞机，宁愿开车，可以随意停留，但在竞选紧张的最后两个月他经常飞，尽量扩大活动范围。他会在工作人员的手电光和车灯指引下降落，只为了多和几个人握手。

“我们要和这些人谈话，还在营业的商店我们都应该进去走走”，帕蒂·克里纳记得他是这样要求的。

他的胡子剃了，头发也剪短了，“但鬓角还有”，卡尔·韦洛克记得，这样的一张脸在同事们看来“不单是难给人信任感，而且还有些招人讨厌了”，尤其是在偏僻的乡村。为赢得本地人的好感，他什么时候都不忘提一提自己所受的教育：从玛丽小姐幼儿园开始，一切大家想知道的他都可以直言相告。韦洛克，莫尔和其他人都看出这一点，在药店，在街头，在理发店，在小餐馆。”我说服比尔，每三个选民中他得争取到两个支持他，”韦洛克说，“只要他一对一地与他们谈话。”

然而，像许多喜欢虚套的政治家一样，他也会笼而统之地谈一谈社区计划。本地区的贫穷是华盛顿的责任，但如果有什么实惠的东西那肯定是议会努力的结果。克林顿谈到教育应该得到联邦政府更多的援助，但必须“由本地政府来控制”，国家健康保险是应该“对每个人有益”的，还应该有能防止水门丑闻发生的政治改革。他对人们说，他赞成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提高教师水平，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征收超额利润税，对随着阿拉伯石油禁运而猛烈抬高油气价格的石油公司进行严格管理，以免引起新的愤怒。

“当我听到这位 28 岁的法学院教师在保守的‘扶轮国际号社’讲话时谈到滥用权力的危险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一位报道竞选的记者说。“他说要警惕跨国公司时赢得了扶轮国际成员们的鼓掌欢迎。”他的话得到喝彩，那是因为阿肯色人历来就是这么看问题，包括扶轮国际成员中的小企业主，这些

选民视外国势力和华尔街为非人格化的东西，他们把失望都倾注在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政治家身上，而不是面对近在眼前的问题。

克林顿从这些听众身上也觉察到一些东西，不安稳的 1974 年，美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从战后的兴旺开始走向衰退，在尼克松被迫辞职期间，某种似乎可以称做平民主义的东西，成了两党制的一个新花样。“我们的首都成了某些人称兄道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场所，而纳税人维系的国家却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需求不闻不问”，当时的一位批评家给克林顿提供了不少谈资，“今大要找一个靠自己的独立见解为我们解惑排难的政治家领袖实在不易——不管是在国会、官僚机构、游说集团、大商业财团和大劳工组织。”说这话的是罗纳德·里根。

这位年轻的民主党国会竞争者敏锐地觉察出阿肯色西北部的老百姓对公共机构缺乏信心，认为它们可有可无。

“他把将国会建成办实事的团体为己任，这个团体应把全部力量倾注于为民造福，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机构，只要是造福于民就是好的”，《巴克斯特公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这样说。而他本人在一次党的秋季会议上说，“我们所喜爱的好政府也经常被一些私人的和自私的目的所利用。我们所说的滥用权力者是指那些忘记了人民的人。”说到国会本身，他主张进行改革，党的领导人对国会中的代表应合理安排、适度增减。

占据一个席位就应代表党的整体利益。

但政治现实却是“权力的集中”和“私人的自私目的”的膨胀，它们在他的改革记事本和宣言中没有任何改变——国会里仍然是金钱开道，州长某至总统的政治、兴旺的游说大军以及他在麦戈文竞选班子中亲眼所见的锱铢必较的职业性党务活动，概莫能外。

就像希拉里·罗德姆悲悯美国儿童的惨况，他也开始煞有介事地探讨什么样的才算是“好政府”，而对那些更值得汲取的失败教训，更深刻的危机，被他视而不见地撇在一边。

夏秋过后，在哈默施米特指责他“欠成熟”并“有激进的左翼倾向”的猛烈攻击下，克林顿一再发表反击声明，但他用的是适合当地口味的代码性语言，这是本地区一种旧有傲慢——谈外交政策要从本土利益出发，憎恶官僚体制，说到犯罪和刑罚也是用早已过时的同态复仇的尺度来衡量。

“我们首先要满足美国自身的需求。就是施舍也应先轮到自家人”，他在 9 月全州党代表大会说这番话也是针对华盛顿的“挥霍无度和机构臃肿。这些政府中的掮客见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让理查德·尼克松颇费脑筋但真处理起来却很棘手的共同犯罪问题也被他大谈特谈。

钱这个字眼在竞选班子中是个凶兆，像这种不吉利的意思要用一种多音混杂的华丽音色来表达，既有平民主义思想又有革新派货色，出于自身需要进行的蛊惑宣传是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已成为克林顿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的独特标志。

☆☆☆

在这头一次的竞选期间，家庭内部爆发了一场危机。

在他从耶鲁返回之前就因希拉里未能同来而与母亲发生过一连串不愉快的磨擦。

“我没有对她表示出热情来那是很自然的……她没有赢得我的尊敬。”她 1972 年的冷淡接待无疑加重了希拉里的退缩，尽管无法弄清程度如何。“假

如希拉里反复考虑过在阿肯色创业”，当地一位熟人说，“那她会再去看弗吉尼亚和罗杰以及他生长的地方。”上高中和大学时很少发生的事现在倒经常起来——与母亲吵嘴，这除了让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们想起他继父的暴怒没有别的。争吵的目击者感觉到，他对待母亲的态度也会用来对其他亲人，比如说对待他妻子，爱，用愤怒来强调，接下来是痛悔不已，再用甜言蜜语重归旧好。

一般来讲，爱面子的弗吉尼亚是不向别人低头的。固执而又高傲的她对儿子认定的那位对她本人和她的阿肯色都不大看重的年轻女士本无和好的意愿，但由于害怕失去儿子，她平生第一次要道歉了。根据她的讲述，那大她从霍普开车回家时决定写，一封谦卑的致歉信。她说她的意思是“与她停战”。可那位年轻女士没有回信，后来的 20 年里她们谁也没有再提那封信，弗吉尼亚至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她说。

1969 年她嫁给了她的理发师杰夫·德怀尔，第一次使她的长子失望。德怀尔曾经涉嫌投资诈骗，所以，弗吉尼亚说，比尔开始时“担心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个讲究衣着。

爱开玩笑的理发师同时也是一个聪明、开朗、招人喜欢的男人——对年少的罗杰慈爱宽厚，对弗吉尼亚更是温柔无比——比尔慢慢也就接受了他。“一切由你吧，母亲”，当她在罗杰·克林顿刚死几个月就宣布要嫁给她的理发师时，他在从牛津打回家的电话里表了这么个态。1974 年，比尔曾把杰夫也拉进竞选班子。德怀尔在感觉到妻子与儿子的情人关系紧张时，曾友好地打电话给坐阵总部的希拉里，表达了他的安抚之意。

1974 年 8 月，德怀尔突然死于糖尿病并发症，41 岁的弗吉尼亚失去了她第三个丈夫。

克林顿放下手中的工作，写了一篇感人的悼文，声称在这位刚刚故去的人身上，人们看到了正直和忘我等优秀品质，他的一生使自己受益也惠及他人，“有过错也有美德，磨难和挫折使他心愿未了。”之后，希拉里也发来温情的短简，算是对做母亲的那封致歉信的迟复。“我从未见过比你更大度更坚强的女性。你对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一种鼓舞”，她写道。“一封意蕴无限的信”，弗吉尼亚回忆说。

这位母亲很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她把罗斯·克兰和其他邻居以及朋友都动员起来，自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工作中去，楔而不舍地打那些募捐电话，还发展新的志愿者，在她那辆褐色的别克车上印上“克林顿进国会”的标语，在接下来 18 年的 8 次竞选中，她想出了许多宣传手段和工具，比如钮扣、窗帘、帽子，她不声不响地联络雷蒙德·克林顿功口贝·克劳福德和其他一些人，让他们联合起来支持比尔，她还从温泉城那些密室中挣来的钱为儿子买了一身合体的皱纱套装和办公设备。就在杰夫·德怀尔葬礼结束的那个上午，把骨灰撒在死者喜爱的湖水中后，她立刻回到克林顿的竞选总部，“我仍然一如既往”，她说。

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保存着比尔·克林顿在第一次竞选中穿旧的一双 13 码黑鞋。

☆☆☆

在众多追随者中不乏富有献身精神的，甚至也有愚忠的类型。竞选班子设在温泉城阿灵顿饭店的办事处被来访者称做“非贵宾套间”，里面局促得转不开身，工作人员同时接待好几个死乞白赖的采访记者。“我们希望那

将是一篇好文章。贵报为我们争取了不少选民”，有的记者还记得有一位干练的年轻雇员总是重复这句话。那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全是热情，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同情记者，替记者着想，提供有益的建议，这与 18 年后新闻界在他的总统竞选中感受到的大不相同。克林顿的手下对政治对手持敌意，视有倾向性的批评家和中立者为假想敌，所以记者要采访他们的大本营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

志愿者大多是妇女，有的是出于政治观点有的则完全是应候选人的个人感召而来。

有人形容他们是一群“从前的校园政治家、搀和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反正都是些能和克林顿踩在一个点儿上的人。”迈克尔·格拉斯彭尼为费那特维尔唯一的一家报纸《葡萄藤》撰文指出：“那都是些怪人，他们能在雨天站在高中足球场上分发竞选手册。”但是，在与候选人以及他的竞选人员相处一段之后，格拉斯彭尼在这些人身上看出某些奴性，这也许是克林顿的候选人身份造成的，如果不是这种身份所要求的话。“工作人员都受了这种影响，像是同时吃了同一种药，众口一词，都是一个腔调”，他在 1974 年 9 月写道，“这种不实在的作风造就了一批盲目崇拜者。志愿者都为情势所迫失去了自我，压低声音说话时也总把志在必得的候选人名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比尔认为……’‘比尔觉得……’‘比尔决定……’我感觉就像是在忏悔室里，要不就是在一年级的背诵课上，所有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个频率。”

希拉里·罗德姆很快接手了总部的工作。为表示对这对儿年轻人的支持，也为了亲眼验证一下女儿的选择对不对，她全家人也都从帕克里奇赶来，临时加入竞选工作，共和党人体·罗德姆负责安装电话，她弟弟兴高采烈地上街刷标语挂横幅。

初选早期暴露出的问题现在显形了。“他的运筹决断往往是出于本能，多少还带几分狂躁，这使他很难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一位观察者指出。但自发性的民间组织“效率大会全国委员会”浮光掠影地考察了这位能说会道的候选人和他的几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助手们之后，对他们的战斗作风赞赏不已，宣布比尔·克林顿的班子是“当今在基层工作的最有效率的集体”。委员会的赞扬被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开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为帮助这个前途无量的新人，委员会立刻向阿肯色派来专业顾问，但这位顾问像派他来的委员会一样，起不了什么实质作用。“竞选班子最主要的战略战术的制定者是比尔·克林顿”，说这话的是戴维·马修斯，未来的阿肯色议员，1974 年的鼓动者之一。

角逐的最后两周，结局已初露端倪——克林顿温和的改良主义似乎敌不过在任者在他自己选区多年经营的本钱，尽管有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辞职。“教皇似的恩威大有要挫败克林顿全身心努力的势头。”“我再也不要听到说哈默施米特的好话！”随着揭晓日期的临近，克林顿对他的助手吼叫着。这次发脾气有点儿像五年前在温泉城征兵局办公室里的那一次，但是，这样的失态大多是在私下里。哈默施米特的不愠不火的风度掩盖了他政治上的弱点，除了开始时攻击克林顿“激进”，他没对年轻的挑战者过多置评。

共和党阵营散布的关于比尔·克林顿的流言蜚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969 年一位越战老兵从阿肯色大学学生联合会拿了一个床垫架在柳树杈上宿营，以此抗议战争升级，几天后被捕。共和党人散布的谣言说那个爬树的

激进分子压根就是比尔·克林顿，这个张冠李戴的笑话在阿肯色政坛流传了好久。而且，比尔·克林顿至今未婚也成了人们嘀咕的话题，一个二十七八的俊小伙早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了，这个疑问在阿肯色西北的城镇乡村进一步扩大。

“他们甚至关起门来说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本地一位听到过这类传言的编辑说。

如果说共和党人是瞎编乱造的话，那么阿肯色的新闻界和另外一些人对克林顿逃兵役搞阴谋以及参与反战运动并为麦戈文竞选工作等事实的揭露是要断送他的前程的。

正是惧于这一点，克林顿对战争以及 1972 年竞选活动的事能不说就不说。但关上门后，他显然为共和党要揭他的老底而烦躁不安，一位见过他与另一位志愿者谈论此事的助手回忆说，他为这事“确实有些担心”。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掩盖并销毁记录。

1974 年 6 月至 7 月间，克林顿向一位支持者保罗·弗雷坦露了写信给霍姆斯上校的事，据弗雷本人 20 年后说，他当时对年轻的候选人讲，如果信落到哈默施米特手里“他可就完了”。当时，上校已退休。像 5 年前一样，年迈的上校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包括富布赖特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雷蒙德伯父和他的朋友也使劲搀和，而且还加上他的前助手，一位阿肯色大学的行管人员，他现在已与克林顿打得火热。

“他们对老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让他交出原信”，雷蒙德·克林顿的一个朋友说。夏末，霍姆斯打电话给大学预备役军团未受衔的指挥官埃德·霍华德，告诉他，据霍华德后来转述，“要把克林顿的原信撤档。”对这一请求他不敢做主，于是请示了上级指挥官盖伊·塔特怀勒并向堪萨斯赖斯堡的司令部备案，塔特怀勒的命令是把复印件给霍姆斯，扣住克林顿的原信。霍华德记得，霍姆斯的家人很快到学校来拿走了那封信。另有一种说法是，学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很快将信交到克林顿手上。至于这封在莱克福德路费尽心神写出的信是原件还是复印件显然没人注意，每个人，包括神经紧张的候选人本身，都认为“万事大吉”了，弗雷就是这么看的，正像当时面临同样问题的另外一个人说的，“战争的阴影也该过去了。”

在霍华德打电话请示的同一大，塔特怀勒又打电话给霍华德，指示他把克林顿的原信以及其他有关反战人员的类似文件，以稳妥的方式寄到赖斯堡来。塔特怀勒告诉霍华德，他“烧掉了那堆档案”，因为军方不准备保存在征兵问题上捣乱的人的材料，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他不想让记者把它们“用于政治目的”，他们两位预备役军官以及被困扰的霍姆斯——更不用说比尔·克林顿——都不知道另有一份复印件在霍姆斯的副手克林顿·琼斯上校手里，1969 年的事，他也和霍姆斯一样震惊，但他的存在却被忽略了。

☆☆☆

选举揭晓夜，他们都焦虑不安地聚在雷蒙德伯父在费那特维尔的家中。当传来克林顿在奥扎克地区的乡下要赢得哈默施米特控制的 21 个县中的 13 个的消息时，开始有欢呼和拥抱。但到夜深时，希拉里开始急躁起来，打电话给其他地区，那里的消息慢得奇怪。

塞巴斯蒂安县和哈默施米特早先控制的地盘，票数统计结果比预计的晚了几个小时。结果到底还是出来了，共和党的优势显然大些，越是哈默施

米特苦心经营的地方越是如此。

这个结果似乎是在报复克林顿开始时的领先。克林顿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败下阵来，哈默施米特以 51．5%的得票重新坐稳原来的宝座，以险胜开始了他第三个十年的任期。

“那些选票就‘丢’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毫不怀疑它们是被偷去的”，克林顿手下一个县级协调员事后说。“据我所知的确如此”，1993 年时另一位协调员仍持此说。哈默施米特的优势在史密斯堡这样的地方体现出来毫不足奇，奇怪的是像克林顿的家乡加兰县的回票结果，特别是那里第一次使用投票计算机。“在加兰县设 19 台计票机是不适当的”，一位监票人事后承认，“我不知哈默施米特本人牵扯与否或者到底是谁的责任”，另一位阿肯色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判断，“但计票结果肯定有失真之处”,这倒也决定了比尔·克林顿的道路，或许他注定要前往小石城，在阿肯色这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去磨炼，暂时不到华盛顿显要的席位上报到，而是被 1977 年本地一次欺诈行为耍弄一下，也许是未来的总统绕不过去的一段弯路。

鲁迪·莫尔还记得克林顿那天夜里在费那特维尔的表现，“我想他为自己的失败感到了真正的震惊。我们大多数人都惊异于比分如此接近。”尽管记者和小道消息关于选票有诈的事说了很长时间，但挑战方毕竟是失败了。克林顿本人还算大度，有时还说些自我贬低的话。在选举结束后几周举行的新闻协会的招待会上，他哀叹在任议员有明显的特权上的优势，而且有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但却对可疑的选票未置一词。他表示现在“可以为民主党做任何需要他做的工作”，这是《阿肯色民主党人》的报道，人们对他的谦虚和恭敬很有好感。

每个人都认为他获胜是理所当然的。“克林顿的这次选举结果使我迷惑不解。他的胜局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不久就将人主州府”，阿肯色新闻联合会的比尔·西蒙斯说。“他已被政界精英内定为州长或参议员”，阿特·英格利希认为，这就是说，连阿肯色大学的学者也已看好克林顿的政治前程。

后来，关于克林顿的失利又有新的说法——比如说他怎么栽在最后一笔不干净的捐款上，结果还欠下 45000 美元的债务，194 的《新闻周刊》上有文章说，他是在政治基金上与共和党对手较量才败下阵来的。反正有一点是事实——这也是政治家与他们的基金提供者在竞选中最应吸取的教训——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资金运用上没打赢人家。

事情过后——不算明面上和私下里的馈赠，如加贝·克劳福德的飞机以及雷蒙德伯父的房产和其他——克林顿一共积聚了 181000 美元，这是阿肯色竞选史上最大的数目，仅次于他的是哈默施米特的 97000 美元。在 1974 年的竞选中，包括其他获胜的民主党议员，他作为挑战者，无论是从募集到的还是花销掉的钱来说，都是别人的一倍以上。

这些钱由戴尔·邦珀斯和党内负责财务的人安排在全州范围的州长竞选中去。后来，在竞选州长和总统时，他仍然从同样的来源找到更多的钱。

☆☆☆

比尔和希拉里那年秋天和冬天是一起在费那特维尔度过的，为做给外人看，他们分别租公寓。她别处的朋友会对她仍滞留在阿肯色“感到不解”，她说。而事实是有很多女人包围着克林顿，有旧日的女友，有竞选班子里的女人，她们对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关系感到奇怪。“他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很有女人缘的比尔，会选择……博学而邋遢的希拉里。”

选举过后她离开了一段时间，直到 1975 年 1 月才回到该学院。竞选的事情刚过去，克林顿又拿出当时的干劲来向希拉里展开求婚攻势，让他那些政治上的朋友在家里安排活动，邀请她参加，用殷勤和温暖包围她，用文化活动吸引她。“比尔恳求我们让她感到来费那特维尔的好处”，卡尔·韦洛克回忆说。“他就怕她感到对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由于克林顿本人用她在约翰·多尔工作班子里干过这一背景做了许多宣传，这使她的到来在地处偏僻的法学院成为某种“盛事”。朱迪丝·沃纳根据记忆形容她，“嬉皮士风格的衣着，北方口音，并不威严，但却震住了她的学生们。”

她在课堂外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成为阿肯色大学法律后援会临时机构的业务指导，以臭名昭著的特克斯卡纳和卡明斯和补赎悔罪做法为鉴，创立新的居住人权利计划这个计划在别的州已很普及，但在极需执行它的阿肯色却还不为人知。她初上法庭时对阿肯色法官仍使用“女律师”这样的字眼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大学里，她向校董事会施压，让他们在寻找新校长时把妇女考虑在内，热情帮助新同事，比如鼓励政治学老师就平等权利修正案与菲利斯·施拉夫利争辩。

在每个重要关头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或事提醒她，这是“他的州和他的政治未来”，一位同事回忆。在参与一项监狱计划时，罗德姆与人合作写了一份不带感情色彩的辩护状，结果为一个关在死囚牢里的死刑犯上诉成功。后来当她的丈夫成为州长并进一步觊觎总统宝座时，她却坚定地支持死刑，并帮助他加速转变立场，因为当时正是他们在政治上爬升的关键时刻。还有她的法律后援会临时机构，一年内大概能代理 300 个没能力聘请律师的客户，她也用“相当精力安抚律师协会”，像一个学生回忆的，“有时也在压力下把一些最后能支付费用的客户案件交给当地律师接手”，这个临时机构更像是“一个同仁好友的工作介绍所”，一位参与者这样说。这时，那位受到过她的帮助与施拉夫利打嘴仗的同事，黛安娜·戴弗斯·金凯德，很快成为吉姆·布莱尔的第二个妻子，而吉姆·布莱尔早在 1972 年代表大会期间对在“沸腾的办公室”里的克林顿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现在作为律师代理泰森食用鸡公司的利益，他的其他客户也都是当地或某一地区有钱有势的人，这两对儿夫妻经常在一起，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布莱尔逐渐成为民主党的显要，是比尔·克林顿最有影响力的顾问和赞助者。除了妇女权利和公民自由，还有阿肯色权力塔尖代表的更大利益，正是这股势力决定着克林顿的未来。

1975 年初，希拉里·罗德姆被阿肯色海军征募办公室叫去，据她事后追忆，那里的人问她“是加入作战部队还是加入预备役”。对那些了解她童年的人来说，对休·罗德姆的女儿考虑入伍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这既不是海军陆战队的吸引力也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责任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她在回避随着春天的临近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都快成一个笑谈了。“你太老了，你自己还不知道，而你是个女人”，一位女性征募人员对这位 27 岁的法律工作者说。“也许打仗的地方需要你。”

☆☆☆

1975 年夏她从乡下出发看望了芝加哥和中西部的朋友，然后去了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像她对盖尔·希伊说的，希望能发现“一些我认为更

激动人心更富挑战性的事来干，而不是摆在我面前的那些烦心事”。后来有人认为这次旅行是她在寻找新的机会，另有人认为那只是决定做出以后出去散散心。

在与一对儿关系非常密切的夫妇谈话时，她曾痛苦地坦言心中的苦闷，那就是比尔·克林顿即使是在向她拼命求婚时也和其他女人搅在一起，这是阿肯色众人皆知的事情。

1974 年国会竞选期间，也就是在她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只要有可能就和他睡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克林顿还曾向别人吹嘘过自己的情场得意。“我遇见一个年轻女人，是阿肯色重要政治人物的女儿，有人告诉我，她是比尔·克林顿的未婚妻”，一位当事人回忆。“克林顿当然是骗了她。他当时和希拉里住在一起。”尽管这样，希拉里对她的朋友说她爱他，相信他，愿意冒险试试他们的关系。对爱情和婚姻她也得给自己一再打气，就像做别的事情一样，比如辞去预备役的勇气，“我知道他是什么机会都不放过的人”，那对夫妇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他干的事，但我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两个人彼此需要互相适应。这就是爱。也可以说是一种协议”，一个朋友事后说。

“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她没能得到协议中定的她应该得到的东西。”“这真是个讽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本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但却挑选这么一个男人托付终生。”还有人相信，他们之间一直就存在严重的失衡。“什么事都偏向比尔，他的身份、地位和目标，即便是在阿肯色”，在法学院就熟识他们的人说。“在希拉里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女人最平常的心态。她需要有所归属。”而大多数朋友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她的选择并非出于特殊的原因或理由，而是各种动机搅和在一起的结果——“希拉里式的混合”，有人这样说。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心灵受过伤害的小姑娘很早就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作为潜力很大的女中豪杰，在别人看来，现在与自己的心达成了一个浮士德似的协议——出于爱、野心、失望、希望，甚至还出于某种有保留的愤世嫉俗。

几星期后她又回到费耶特维尔。“我只知道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她 1992 年对一位作家说，多少也流露出做出自我牺牲的感觉：“比尔的献身公共生活的愿望要比我做些有益的事情的愿望特殊一些。”在她出门期间克林顿在费耶特维尔的加利福尼亚街石墙后面买下一间刷了油漆的砖石结构的小房子，她曾表示过对这所房子的兴趣。

现在，他从机场把她接到这里，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多萝西·罗德姆总是直言不讳。

“那是个又小又窄的小房子，值不了几个钱。我想里面只有两个房间”，她对《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说。

在他们决定结婚的初秋前几天，她母亲飞来费耶特维尔。他们这时正在进行内部粉刷和整理。几乎到了最后一分钟多萝西才带她的女儿去迪拉德百货商店买一身传统的结婚礼服。希拉里“根本没有想这些事”，一位朋友说，“她确实有与精明强干正相反的另一方面，迷糊懵懂，的确是这样。”

弗吉尼亚也从温泉城开车来了，婚礼的那天早晨她正与几个朋友一同在假日饭店吃早餐，这时比尔走过来，说要和她谈点事情。餐桌上立刻静了下来。“希拉里要保留她的姓”，他说。他开始解释自己不在乎，而且在乎也没有用。

她母亲流下了眼泪，同桌的女人极力克制着才没有哭。“那真是一个打击”，弗吉尼亚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那想必也是从芝加哥学来的新东西。”19 岁的罗杰·克林顿反应也很激烈，这也许因为他和这位新嫂子的距离太大。

10 月 11 日，牧师在粉刷一新的小屋里为他们主持了简单的仪式，到场的人仅限于家庭成员。多萝西·罗德姆百感交集的心情事后才表示出来：“看着这两个有着高学历的高材生站在那里，在阿肯色，在那间最简朴的小屋里，他们的本事会把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奢侈带来，因为他梦想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真动人。”

接下来是在州民主党主席莫里斯·亨利宽畅的家中举办招待会。“来了好几百客人……从第三区的四面八方起来”，安·亨利回忆，在那个温暖的周六之夜，室内和院子里挤满了人。晚会成了最隆重的政治盛事，不但是在本区，就是在全州范围内，也算是规模最大的。摘了眼镜，烫了头发的罗德姆让很多人都认不出来了。出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既是婚礼也是集会——这表明比尔·克林顿还要出山。

也就是在这期间有人抓拍了那张照片，她因站在台阶上而高出她的新郎一头，微笑地看着那个将与她荣辱与共的男人。

客人中有阿肯色总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已决定在 1976 年与丑闻不断的威尔伯·米尔斯争夺议长席位，他邀请比尔·克林顿参加进来，并且暗示他空出来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这又是一个在党内爬升的机会。当希拉里出外旅行期间，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这个工作要投入大量精力”，塔克记得他提醒过克林顿。他还对记者说过，克林顿看问题很准，“他有那种从法律角度判断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能力。”

克林顿以竞选临近为由想不度蜜月了。但多萝西·罗德姆送给新人两张飞往墨西哥阿尔科普尔的机票，而且罗德姆一家也去（特别说明也包括弗吉尼亚和罗杰，所以才叫做家庭‘旅行团’）。“我们过得非常愉快”，这是休·罗德姆对女儿的婚姻给予的唯一的一次公开评价。新婚夫妇秋天从墨西哥回来时就开始计划总检察长 5 月份的民主党初眩希拉里·罗德姆对朋友们说，她一定要保留娘家姓，这是早在做小姑娘时就定下的事。

她要做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人”，她对安·亨利和其他几个人都说过，不是通常那种“奉献型”的政治配偶。当戴维·普赖尔州长的妻子，芭芭拉，因为在那年秋天做了一个异国情调的发型而招人嘲笑并导致夫妻于 1975 年底分居时，希拉里出于义愤，在克林顿支持者的晚餐会上以满头卷发对芭芭拉·普赖尔表示“声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原则性的事情”，她们中间的一个对唐尼·拉德克利夫说。她们当时都赞成她，这使她深感欣慰。这位曾在女选民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权力集中共同负责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地以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来表达她的好恶。

“希拉里早就给自己定了规矩”，威尔斯利时的室友简·皮尔斯说，“我认为她是强迫自己不去回头看”。